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卓继辉	陈伙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伙金
	卓继辉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70 期 2020 年第 5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卓继辉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方 艾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 (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福州十二时辰

P7



东牙巷萨家往事

P29

八闽第一垦



世味流年

4 林丽钦

福州十二时辰

闽都世家

7 萨本敦

东牙巷萨家往事

16 文 净

从绿筠书屋到双榕书室

岁月写真

22 蔡 林

碧琳园与蔡氏少年

29 吴安钦

八闽第一垦

八闽文脉

36 卢美松

赵宋宗子在闽都

42 林思翔

郑思肖与谢翱

46 应嘉仁

凤出丹山熠生辉

史池钩深

49 汪征鲁

谢泌的宽与严

——宋代福州知州系列谭

双塔视野

55 丰 日

福州茶港话兴衰

Contents

P46



凤出丹山熠生辉

P55



福州茶港话兴衰

P75

古碑重光 乌石盛事



- 61 黄 伟
- 67 方炎炎
- 71 胡映泉

- 克洛岱尔笔下的福州
- 白马桥忆旧
- 东莒岛上的大埔石刻

在线读城

- 75 方 杰 / 林 强

- 古碑重光 乌石盛事

福地山水

- 79 张兆浩
- 82 张良远
- 85 黄河清

- 有大乌石和八角井的地方
- 金光笼罩的前洋
- 青山着意化为云

茶话食语

- 90 萧石子
- 93 半 夏
- 95 李善旺

- 家有红糟
- 飞鱼和草
- 趣忆“猪姆奶”

- 封面 方 艾
- 封二 刘 璜
- 封三 徐启源
- 封底 王文乐

- 福州西湖桂斋
- 凤凰于飞
- 沈葆楨题闽江仰止亭
- 寿山薄意

福州十二时辰

林丽钦

“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有时细雨微烟罩，便是天然水墨图。”美如墨画的“三山古越都”在宋人赞词中穿越千年历史长河，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的每一个时辰中缓慢向前，经历数不清的斗转星移、日出日落，回旋激荡轮转到今天，编织着属于福州的绝美诗篇。

卯时·日出（5:00-7:00）：一道熹微晨光在东方泛起，划开交缠朦胧的晨昏，从每一道紧闭的窗帘缝里钻进去。一片摊开的坊巷古厝和这座城里的上百座公园以及密密层层的高楼一起在晨光中开始呼吸吐纳。朝气沿着海丝之路从远处吹来，清爽平阔的千里闽江跳跃着金色浮沉的水光，

偶有白色飞鸟闪动翅膀轻巧掠过。

辰时·食时（7:00-9:00）：街巷旁的早餐摊热闹起来，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里弥漫。热气腾腾的锅边、肉燕、鱼丸让人食指大动，配上虾酥、芋粿，是许多福州人的最爱。路旁的羊蹄甲满绽枝头，夹道的粉嫩云烟簇拥着川流不息的人潮车阵匆匆前行。城市在滚动的车轮、杂沓的脚步中喧嚣鼎沸起来。

巳时·隅中（9:00-11:00）：忽明忽暗、时强时弱的光影，映衬着城市前行的节奏，车窗外的世界瞬间向后闪退，车内的人们快速奔向未来。奔驰的动车路过新榕千顷，路过繁华富庶，舒张



通畅着城市的脉络，轻易把“天”变成“分钟”。水费、电费、办证等烦琐细小的杂事被移动支付、刷脸办事的数字智慧收到手机闪动的屏幕上，在手指轻轻划动中悄然解决。旭日的阳光打在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激情耀眼的光芒，每个橱窗里的运筹帷幄、杀伐决断反复上演。

午时·日中(11:00-13:00):日中宜放松绷紧的心弦，呼朋引类品尝精致细腻的闽都美食，大家山南海北聊些大味至淡的家长里短拉拢感情。加入高汤以文火慢煨而成的佛跳墙，外酥内嫩的荔枝肉，酱香浓郁的南煎肝，酸甜爽脆的爆炒酸脆，油而不腻的醉排骨，软糯绵密的夕时芋泥，甜蜜清香的桂花酒酿小丸子，佐以老友旧事，名家掌故，愈是入口难忘，回味无穷。

未时·日昃(13:00-15:00):静谧的午后时光，可以观景品茶下棋休憩，也适宜走街串巷，在青瓦白墙间亲切感受闽都古韵千年不绝的传承。沿着八一七路，从镇海楼到烟台山，白塔乌塔、朱紫坊、上下杭……福州的历史文脉放射着璀璨绚

丽的光芒，每一处都让人驻足流连。你可以在“一部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现代史”的老街看严复故居的墙木镂刻沧桑，看南迁的容颜在生活的凡间闪动。也可以在曾经百舸争流的上下杭感受时光魔法，徜徉于经风沐雨的老建筑和老建筑里的传奇轶事。

申时·哺时(15:00-17:00):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人在申时约老友品茗话仙，斟上一盏清香入脾的茉莉花茶，通透醇厚的茶汤让人齿颊生香，心旷神怡。或在“地蕴金汤”的福州城找一池温热的温泉洗脱凡尘。一池热气蒸腾的金汤，泡暖了身体和心肠，泡出了温良平和与安逸自足。身暖通体舒泰，心暖天地如春。走出澡堂身轻意闲，心神俱定。

酉时·日入(17:00-19:00):日影西斜，粉红色的云霞在天上铺展开来，云岚开始互扯，拉出不断变幻的暖色。家家户户亮起橘黄的灯盏，忙碌的母亲开始操持一家的饭汤饮食，酝酿生活的琐碎和甜蜜。家里的一粥一饭牵引着疲惫的脚



步、滚滚的车轮回归。父亲轻声说着古老的故事给孩子最美的幸福。爷爷牵着奶奶的手从海拔只有86米的乌山下来，这条路他们一起走了40年。

戌时·黄昏（19:00-21:00）：天黑了，路灯自动亮起。星星出现在离高楼很近的天空，月亮也爬了上来。镇海楼上熏风轻扫，三三两两的市民结伴登高纳凉。山下万家灯火，高楼毗邻，二三饮者在某个大厦谈笑觥筹。孩子在公园里奔跑嬉闹。水榭戏台上的评话艺人一手握抚尺，一手持纸扇，用福州方言演绎着经久不衰的故事，纸扇配合着夸张的表情在空中上下挥动，讲到高潮处就咿咿呀呀唱将起来。有时会有闽剧表演，水汽氤氲中灯火辉映，高唱不歇。客人们只管饮茶小憩，听台上唱爱恨别离，演忠奸良善。

亥时·人定（21:00-23:00）：微风徐徐，一

枚淡白的月亮高挂天幕。金融街的霓虹、江滨的灯光秀，汇聚成城市的光影，在静夜里尽展妩媚。被郁达夫称为“中国的莱茵河”的闽江露出温情脉脉的笑窝。文艺盛宴上回旋流转的身影和节奏澎湃的音乐都已轻轻散去，剩下欢愉的余响仍在夜空飘荡。世界暗了下来，三山的棱线在繁星闪耀的天幕下起伏。亮一盏灯光，读一本书，在夜阑人静品味温煦的“小确幸”。

子时·夜半（23:00-1:00）：鼓山上，萤火虫与星光交相辉映，星辰从城市上空走过，世界从荡漾归于平静。但另一些人的夜生活刚刚开始。各处的酒吧和路边的大排档支撑着一群不肯入眠的人在今明两天的临界点试探徘徊。星星般的灯火在静谧城市里闪烁，夜行的车流带着光晕划过。

丑时·鸡鸣（1:00-3:00）：晨昏隐晦、万物唯静。黑暗以鬼魅的流动速度细微地包围了全城。强烈的睡意在城市里缭绕浮起。天空像一汪不见底的深潭笼罩了人间熟睡的呼吸。昼伏夜出的渣土车从无人的街道驶过，世界安静得只听到不认输的学生沙沙的翻书声。

寅时·平旦（3:00-5:00）：天空的深黑慢慢淡去，透出深蓝，又转成灰亮。三山两塔的线条在渐渐退散的黑暗里淡淡浮现。万物从叶尖上的露水开始苏醒。婉转的鸟啼声忍不住流进窗来。蓄势待发的榕城静静等着绯红的黎明喷薄而出，另一轮十二时辰的轮回又重新开始，沿着千年历史的长河，以稳定的节奏继续向前滚动，轮转出日新月异的周而复始。



东牙巷萨家往事

萨本敦

一、出身闻雨山房

萨氏作为色目人由明初入闽后，居住在通贤坊，即如今的安泰中心一带。现在入闽萨氏的共同祖先、第8世萨希亮后来迁居北门兜绍因寺废墟上兴建的半野轩。萨希亮之后分为5支，随着人口繁衍，居住地也就分散了，常为人提起的朱紫坊萨家就是第一支中的一户。居住在黄巷尾部的萨家，房子最初也是第一支购置，唯不数载而鬻归陈姓。未几，复由第二支12世萨知麟购回。萨知麟还购得毗邻葛氏宅院之前后花厅，辟为著名书斋闻雨山房。

黄巷尾部萨家是紧邻南后街坐北朝南的一家。萨知麟有三子：长子觐光，次子彬文，三子春光。老大觐光后来又购置了巷子中部一座房子搬了过去，只剩老二彬文和老三春光留在老宅里



萨镇冰

居住。

萨镇冰幼年时投奔的就是居住在黄巷中部萨觐光的孙子萨觉民，萨觉民不但抚育他，还带他拜见挚友沈葆楨，使萨镇冰进入船政学堂读书，成长为一代海军名将。遗憾的是黄巷中部房子在民国时期失火，旧址在已拆的南华剧场隔壁。而黄巷尾部的房子至今尚在，它已列入三坊七巷社区保护范围。



闻雨山房位于黄巷北侧西口新46号

曾祖父萨承钰，字又恒，就诞生于黄巷尾部的祖居。他幼年丧父，是他的祖父萨春光一手培养了他。经在闻雨山房励志苦读，曾祖父终于中了举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于光绪十五年（1889）11月，奉海军大臣张勤果之命，历时一年多测绘中国沿海炮台，留下弥足珍贵的中国海防图。二是任知府衔山东武城知县等地方官员，为民做了许多好事。

曾祖父娶梁章钜的曾孙女梁茂漪为妻。梁章钜曾任江苏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江苏巡抚等职。梁章钜也住在黄巷中段，与黄巷中段的萨家遥遥相对。他家原是唐朝名儒黄璞故居，黄巷便因黄璞而得名。

曾祖父从山东武城卸任回福州后，住在新购置的东牙巷宅院。

东牙巷宅院购建于1900年前后，在曾祖父从山东告老回福州前若干年。曾祖父吩咐长子嘉

曦买房时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房屋不可靠河。二、房屋需他以前在福州时曾见过的。三、房子要有亭台楼阁，与他在山东的知县衙门相似。嘉曦遵照这些意愿，买下东牙巷房子，并照父亲的意思翻建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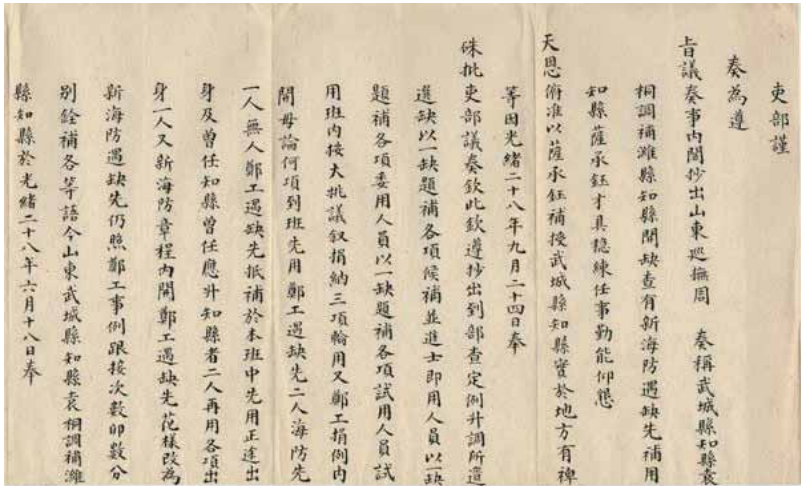
东牙巷宅主建筑是坐南朝北的两进两花厅。加之又买了隔壁的“三乐厅”，及

与“三乐厅”背靠背的坐北朝南、门对妙巷的两进院落，连成一片，使房子显得很深很大。我还记得东牙巷萨家大厅红底黑字的木制柱联：“光阴迅速，便勤紧读书写字能得几何，恐至老无闻，趁早年埋头用力；世事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究非容易，望持躬以俭，免后日仰面求人。”这是曾祖父在教导我们这些子孙。

曾祖父59岁告老回榕，可惜的是他回到福州居住不及一年就病逝了。

曾祖父与梁氏育有二男一女，即大伯公嘉曦，我的爷爷嘉榘，还有一个嫁到邓家的姑婆。在山东任上，曾祖父又娶妾岱氏，名慧，亦育有二男一女，三叔公嘉征，四叔公嘉燮，还有一个嫁到沈家的姑婆。对岱氏，大人们称之为姨太，我的兄弟姐妹们称之为太婆。

曾祖父12个孙子、9个孙女是统一排行的，我父亲兆寅，在孙中居长。



清史馆萨承钰资料



《南北洋炮台图说》，萨承钰著

曾祖父在世时，在福州中轴线南街置有十几家店面分租给商家，其中有同春药房、亨得利钟表店等等。曾祖父去世后，除了留下一家妙巷口叫“天元斋”的作为共有，将房租用于祭祖开销之外，四兄弟各分得三四间店面，房租供各房生活支出。

二、好酒的四叔公

我的四叔公嘉燮，字理臣，是曾祖父最小的儿子。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住在北京。1980年前后，我作为记者常到北京采访，每次都要到灵境胡同看望他，有时也下榻在他家，当年他是我们萨家唯一健在的辈分最高的人。他住的小平房后面有一座四合院，曾是清朝逊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宅院，而四叔公住的小平房则是陈宝琛家的马厩。我曾到帝师故居看一眼，那里已是破烂

凌乱的大杂院，凡是可以搭盖的地方都搭盖成厨房、厕所、房间，倒是四叔公住的由马厩改建的小平房，虽然矮小，却还保留着窄窄的前后院，两个房间也很宽敞明亮，住在那里挺舒适的。

四叔公好酒，沈祖同的女儿有时也会来陪他喝。四叔公的胞姐嘉珩嫁给福州宫巷沈葆楨的嫡曾孙沈觐笏，“觐”字辈之下是“祖”字辈，沈祖同算是四叔公的胞姐、我姑婆的侄儿。因为这层关系，四叔公和住在北京的沈祖同一家便有了走动。

沈祖同曾任中央银行驻台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一直秘密在做迁台的准备，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转移黄金。当时中央银行在台湾没有分行，运往台湾的黄金就是由驻台北代表沈祖同点存于台湾银行金库的。沈祖同原是张学良的秘书，1933年曾陪张学良去意大利考察。

四叔公对我说，他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公，曾对他说，一个家族是否破落只要看他们家的墙头是不是长了茅草。阔别家乡 40 多年的四叔公回忆起他的大哥时问我，我们老家的墙头长草了吗？未等我回答，他伤感地自言自语道，现在难道还有一家旧宅墙头不长草吗？

三、四婶婆的家世

四叔公的婚事是我的父亲撮合的，四婶婆是龚家小姐，大名龚令庄。福州无人不知西湖宾馆，西湖宾馆是在环碧轩基础上扩建的，环碧轩又叫龚家花园，园主就是四婶婆的祖父龚易图。龚易图是清咸丰九年（1859）进士，曾任江苏按察使、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龚礼逸是龚易图孙辈中多才多艺的一个，由于我的父亲和他是挚友，便牵线把朋友的妹妹嫁给了自己的叔叔。

四叔公和四婶婆成婚于 1930 年，据说龚家的陪嫁非常丰厚。后来，四叔公到北京谋生，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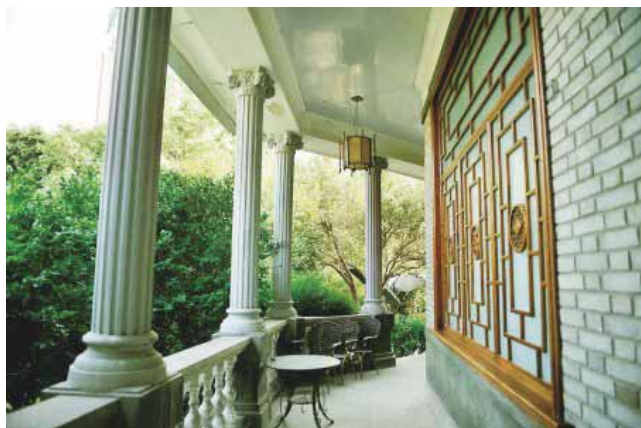
四婶婆也接去。再后来，四婶婆发现陪嫁的几千块光洋被自己的婆婆侵吞了，从此把气全撒在四叔公身上，与四叔公成为生死冤家。四叔公和四婶婆育有二男二女，虽然子女事业有成，有中共高级干部，有火箭专家，但夫妇俩的争吵伴随一生，而且每次吵架都会牵扯出那“几千块光洋”。

由于家庭不够和谐，酒成为四叔公一生的最爱。我第一次见到四叔公的时候，四婶婆已谢世两年了，他的外孙曾问他到底有没有那几千块光洋，四叔公是这样说的：“什么东西是你的呢？只有在手中才算是你的。”

四婶婆的哥哥龚礼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文史馆员。有一次他来我家，特带了一叠龚易图的行书送我，说是给我当字帖，我很高兴地收藏至今。记得那天父亲对我说，日本人认为福州书法最好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沈颢寿，另一个就是龚礼逸。

1965 年龚礼逸身染重病，请来中医吴味雪到家诊病。吴味雪住在安泰河畔桂枝里，他既是名医也是书法家，即儒医是也。吴味雪和许多书香之家均为世交，他号了号老朋友的脉搏，退出房间对龚礼逸的夫人王孝莹说：“还有七天时间，准备一下吧！”不多不少，七天整，龚礼逸走了。

龚老太太王孝莹是王仁堪的后代，王仁堪是福州的最后一个状元。20 世纪 80 年代，她和大女儿龚世润都被聘为福建省文史馆员，连已故的丈夫龚礼逸算上，一家出了三个文史馆员，在福建也许是仅有的。



环碧轩旧址

四、姑婆：沈家的遗孀

我那位嫁给沈葆楨嫡曾孙沈覲笏的姑婆、四叔公的胞姐叫嘉琦，是远近闻名的美人。据说她结婚时，福州南街一带几户原定同日结婚的人家都改了日期，怕看热闹的人私下比较哪家新娘漂亮，把她们比了下去。

这位被称为“南街一”的姑婆，曾有一件令她懊恼的事。初嫁不久，一日游湖遇雨，连忙乘轿回家，恰遇闺蜜，好心的姑婆请她挤进自己的轿中，不料到家门前落轿时，碰见巷中一书生，对走出轿子的两个丽人笑吟道：“哈，铜雀春深锁二乔。”大户闺秀本该一人一轿，两人挤在一轿，且被人取笑，使姑婆许久难以释怀。几年前我对一位作家说起这个故事，他手一拍道：“我明白了，这就是三坊七巷。”

自古红颜多薄命，姑婆公原是海军军官，20多岁就撒手人寰。幸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姑婆子女早已成年，参加了革命工作，姑婆被请出



萨嘉琦

来当上街道妇女主任，整天穿梭在宫巷各家各户之间。

姑婆对我说，一个人幸福与否要看晚年，晚年一定要过得好。她的晚景就很不错。当后辈来看她时，她常煮一小碗点心端上，不过几口的量，但味道极好。

沈家姑婆公沈覲笏的胞兄叫沈覲平，沈覲平之子沈祖牟是我父亲的挚友。

沈祖牟勤于搜集古书。他曾任颐中英美烟草公司中方经理、沈阳面粉厂厂长、中央信托局专员等职，由于财力雄厚，福州林氏“平冶楼”书散出后多为他所得，他收藏有珍稀书籍2万余卷。抗日战争时期，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任福建省政府参议，便经常到沈家切磋交流读书心得与藏书经验；柳亚子也曾写信请他代为收集南明郑成功史料。1947年沈祖牟38岁时因医疗事故逝世于上海。

1955年沈祖牟遗孀张瑞美果断地将丈夫的藏书捐献给福建省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许多图书馆都希望收购她家藏书，她认为将家藏古籍移送福建省图书馆最妥，因为福建省图书馆馆长是我的父亲，是她丈夫的朋友，是靠得住的人。

五、三婶婆床头的照片

我的三叔公叫嘉征，在北洋军阀时期曾任国务院主事，后在福建省代理连江县知事。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大院，但20世纪50年代初他就病

逝了，那时我的年龄尚小，对他几无印象，记住的只是给他办丧事时那些纸糊的房子、人力车、箱子。听长辈说，他与两位穿长衫的兄长不同，多是西装革履。他有一部黄包车，有丰富的夜生活，回家总是很晚，佣人常常要等候他回来再关闭三重大门。至于1963年方才谢世的三婶婆的一颦一笑我却还能记得。

三婶婆叫陈世贞，娘家祖居在文儒坊，即林则徐母亲的家。

东牙巷萨家第二进的花厅是一座小园林，虽然在我懂事时鱼池早已填为庭院，但花木亭台依然如故。太婆和三婶婆各住楼阁的左右厢房。三婶婆房额“一研斋”三字为沈剑知所书；引人注目的是三婶婆的床头挂着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张陈季良身着戎装的照片。

陈季良本名陈世英，是三婶婆陈世贞的兄长。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决定将沙俄侵占的黑龙江航权归还中国。1919年“江亨”舰舰长陈世英指挥4艘军舰组成北上舰队，经停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的庙街，拟往哈尔滨扩建

“吉黑江防舰队”。庙街又称尼古拉耶夫斯克，驻扎着日军和日军支持下的白俄军队。10月，苏联红军攻打庙街，白俄军队溃退，负隅顽抗的日军被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因为缺少重武器，红军难以攻克，于是求助陈世英，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陈世英爽快地答应了，把“江亨”舰的1门边炮、“利川”舰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借”给了苏联红军。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馆，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获130多人。此即轰动世界的“庙街事件”。

次年日军卷土重来，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国军队支持了苏联红军，立刻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最后以中国军事法庭判处陈世英革职“永不叙用”告终，日军无奈地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

“永不叙用”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依然在海军中供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率中国海军第一舰队的4艘战舰与日本300多架战机、70多艘军舰，浴血战斗了两个月零一天，击落敌机20多架。1945年，陈季良因旧伤复发逝世，被迫赠海军上将军衔。

三婶婆将兄长照片在床头一挂就是几十年。抗日战争时福州曾经两度沦陷，日寇踏进三山，冲进了东牙巷萨家，在三婶婆房中发现了这张照片。倘若日寇知道照片中人乃是“庙街事件”的



陈季良将军

陈世英或江阴海空保卫战的陈季良，那后果不堪设想。

2014年11月5日陈季良将军纪念园建成，我再次看到那张被放大的陈季良照片。

六、我的爷爷奶奶

晚清和北洋时爷爷在北京任“京官”，做的都是“闲差”，每一个“闲差”俸禄都有限，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坐着黄包车，到各供职的地方“签到”。“北伐战争”后，爷爷回到福州，从此赋闲在家。1953年爷爷被聘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每月领50元的津贴。

首批被聘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的，都是学者名人，由福建省省主席亲自聘任。馆长陈培锬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其父陈海梅，与之同榜钦点为翰林，有“父子两翰林”的佳话。

从许多长辈那里了解到，爷爷这一辈子生活虽不富有，却很潇洒，这一点和他的哥哥大不一样。他对金钱不大在意，出手大方，乐于助人。

爷爷的毛笔小楷十分漂亮，平日喜欢抄书，所抄的书多为福建地方文献，他还将几百册的抄本命名为“积积室抄本”。他所辑的《林则徐联句类编》收联147副，是研究林则徐的重要史料。我看到中华书局出版的《文献家通考》，此书网罗了清初以来文献家1500多人，该书“卷二十九”收录的文献家就包括爷爷在内。

奶奶是小脚女人，她和爷爷相敬如宾。奶奶为人本分善良，在封建大家庭里，她是一个柔弱的形象。由于爷爷奶奶恩爱且多子多孙，在亲友子女婚庆时，奶奶总被推为“好命人”，替新人铺床。

七、大姑的亲事

爷爷娶的是罗家女罗秀棫。罗家有些新派。罗家联姻的何家，何公敢家也；王家，王世静、王世襄家也。这些家庭的子女都留学，所以我爷爷也叫我父亲到日本读书。兆珂、兆瑜是我的大姑、二姑，爷爷也把她们送到陈宝琛夫人王眉寿办的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们是最早进入女学的萨家女子，是作家冰心的同学。

大姑的婚事颇为奇特，这也和新派的爷爷有关。那时我家住在北京，一天我的爷爷在厕所看到一个小男孩蹲在那里用树枝在泥地上演算几何题，对这男孩大有好感，便决定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他。经打听，这孩子的伯祖父就是大名鼎鼎



大姑萨兆珂

的罗丰禄。

罗丰禄（1850-1903），字稷臣，他与萨镇冰一样，出身于马尾船政学堂。罗丰禄 1896 年“任出使英、比、意大臣”，由于他尽力维护国家权益，广受国人的敬重，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家。罗丰禄任使臣时，一等秘书就是他的侄儿罗忠彤。罗忠彤，字筱荷。在异乡，年轻的筱荷爱上了一位英国姑娘。英国姑娘为筱荷生下一个儿子，但未能母以子贵，罗家留下还在襁褓中的孙子，将肝肠寸断的洋媳妇遣送回国。这名混血婴儿就是我的姑夫，大名罗孝斌。

不出我的祖父所料，罗孝斌成了著名建筑专家，他不但参与建设上海国际饭店，还协助茅以升修建了名闻中外的钱塘江大桥。但大姑和他的婚姻很不和谐，两人的生活方式一中一西，天差地别。大姑早餐喜欢稀粥肉松，姑夫吃的是面包牛奶；大姑只喝茉莉花茶，姑夫却要咖啡可可；大姑日落而息日出即起，姑夫夜间精力格外充沛。我曾看到姑夫的一本相册，每张照片都空无一人。大姑说，姑夫爱好摄影，常要求大姑摆出各种姿态充当模特，对此大姑极不乐意，于是姑夫拍的照片全成了空镜头。他们最终分手，20 世纪 50 年代初，罗孝斌移居马来西亚槟城。

八、大伯公和卢厝亲家

最后说说不能让祖屋墙头长草的大伯公萨嘉曦吧。

大伯公算是清朝的官二代，在清末当过河南候补知县、乡试点名官等，对民国之后新派的东西十分抵制，他的房门贴着“西医不得入内”的字条，曾禁止全家使用电灯。清亡后他不问世事，勤于研读，肆力于文章，著有《寄庐文稿》等。

大伯公娶的是杨家女儿，谁知此女过门不久就病逝了，便续娶了她的妹妹。也许正因为大伯公初娶丧偶，所以我的爷爷已经生了我的父亲，而他还没有儿子。我原以为家族内兄弟排行是一一对应的，第一个儿子为大哥的、第二个儿子为二哥的，如此排列，其实不然。比如，朱紫坊萨子安一妻一妾，妻还未生育而妾先诞下一婴，



朱紫坊萨家大院

结果此婴排行是二而不是一，他的十个儿子从二哥叫到十一哥，根本没有大哥此人。是否爷爷出于对大伯公的尊重而留出两个虚位？这一点至今还是个谜。杨家姐妹是杨维屏的曾孙女。杨维屏别号湘秋居士，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有诗文集《云悦山房偶存稿》6卷传世。

萨嘉曦是个藏书家，尤其可贵的是他好刻书。《云悦山房偶存稿》6卷便经他校对刊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连江县的丹阳乡有一个山村，叫萨家村。之所以叫萨家村，是因为这里大片田地是属于一个叫萨幼雅的地主。萨幼雅抽大烟，渐渐地家道中落，想到了卖地。大伯公是家族荣誉感极强的人，他想，若地卖给外姓，那么萨家村的名字将难以保留，于是决定把这些土地买下来。我爷爷的店铺早都转手到他那儿，他有购地的财力。

大伯公便请连江的卢姓地主为他打理。为了和卢姓地主拉近关系，决定迎娶卢姓地主的女儿为儿媳，于是卢姓地主变成了卢厝亲家，我也有了叫卢振凤的八婶。从此每年秋后，卢厝亲家就把收来的田租谷物，折合成光洋给大伯公送来。

在如此富贵家庭里，八叔成了玩家，全身上下都穿着绸缎锦衣，是东牙巷萨家唯一“一身软”少爷。他好古玩字画，他的书法、篆刻闻名遐迩，隶书不亚于其父，有人向大伯公求字，大伯公常叫他代笔。风流倜傥的他只可惜多才短命，20世纪30年代因病去世，留下一女。

大伯公和卢厝亲家知晓当进则进、当退则



父亲兄弟和东牙巷孩子们

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卢厝亲家卖掉了全部田地，搬到福州城里买下衣锦坊一大座院落，进城住下；大伯公也把土地捐献给人民政府。于是他们都成了开明绅士。八婶嫁过来的时候，卢厝亲家为她买个陪嫁的丫鬟，叫秋菊。秋菊对八婶很亲，也称八婶为妈妈；八婶亲生的女儿对八婶却毫无孝心，与秋菊有天壤之别。大伯公与卢厝亲家相继谢世后，八婶生活非常艰难，秋菊远嫁外县，难得回来，但是每次回来，都给孤独的八婶带来少有的温暖。

大伯公善用罗盘，会看风水，选择的墓地均为上上佳域，无奈山地开发，加之遇到盗墓，群坟荒芜破败。2008年萨承钰诸孙决定，将曾祖父著作《南北洋炮台图说》付梓，同时把他和他的四个儿子遗骨合葬于三山陵园，建成一座祖坟；而东牙巷祖居已于1994年在城市改造中拆迁，后代间物化的联系从此由祖居变为祖坟，上辈的故事留给生者的只能是回想。

从绿筠书屋到双榕书室

文 净

一

福州法海路北侧东端的那片明代民居，当地人亦称叶厝。

这里大部分老厝已拆旧建新，临街的叶厝却被保留下来。由于内部整修，院门关闭，我只能从稍远地方看到它耸立的马头墙与高低起伏的瓦盖。不过，附近的老人都知道，这座坐西北朝东南的老厝，两进主体，四面围墙，建有门头房与花厅。两进大厅地面及天井全用长条大理石铺就，里面的书屋、花圃、假山与凉亭，透出一派书香门第的斯文气象。

叶厝，也称叶翰林府，是清代乾隆朝翰林叶观国的故居。乾隆三十年（1765），因父亲病逝，时年46岁的叶观国返乡丁父忧三年。次年，他把原在通津衢的家迁往这里。

《三山叶氏族谱》载，福建叶氏一脉，唐时随王审知入闽，同安佛岭叶氏为其始祖。后几经辗转，叶观国之曾祖辈于顺治年间从福清迁居省城。其后，叶观国祖、父两辈虽奋力读书，但科考皆不顺，至叶观国一举成名，叶家的居住环境始得改善，叶厝亦令邑人瞩目。

当地传说，初来省城的叶家，默默生存于民间底层。叶观国之父叶茂盛，仅凭一条扁担给人搬运货物谋生养家，人称扁担公。日子难以为继之时，扁担公一度产生轻生念头。临水欲投之际，他先将扁担投水，心中默念：“若异日可望发迹者，则扁担立于水，当留命以待。”出人意料的



是，扁担奇异地从水中立起。扁担公对未来有了盼头，后来娶妻生子，长子便是叶观国。

这样的坊间奇谈，显然是叶观国成名之后编出来的。立于水的扁担，是否隐喻竖起来的笔杆？那是一场由苦力人家到书香门第的美丽蜕变。

叶厝，不知是叶观国请人建造的，还是购买他人的房产，不管怎样，对这座房子的内部设计，叶观国显然是费过心思的。据叶观国后裔介绍，如今的叶厝并不是当年翰林府的全部。当年，花厅西侧墙外还有一进坐南朝北的房子，其东面、北面皆有一片竹园。只是这片地后来被叶氏后人出售了，如今很难确知叶厝的原貌。

那时的叶厝居然有两片竹园，叶观国的爱竹之情，由此可见。

“我性爱苦竹，书斋署绿筠”。叶观国丁父忧服除还京之后，还在诗中深情抒发对旧居竹园的喜爱。“乞得东邻栽，种向北牖亲”，说的便是当年辟园植竹的情景。因为爱竹，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绿筠书屋”。

叶厝的竹子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荡绿扬风。丁忧在家的叶观国，必定频频与竹子对话。即使读书于书屋，窗前的竹影也给他送来清凉与美妙。

“坐我碧纱窗，岸此乌甲巾。都忘六月暑，况识六街尘。”以至于“自从辞故园，倏度四岁春”之后，旧居的那片竹园还“时时入我梦”。

无论在哪里，竹的气骨与精神，都与他密切相伴。

叶观国少时家贫，但他像刚出土的新竹一

样，以顽强不屈的意志，以不断吸纳的虚心，向宽阔天空伸展。5岁诵经书，9岁能属文，20岁已有文名。22岁拔贡生，28岁中举人，32岁中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为宦生涯。翰林院向来被视为清水衙门，被派往各省典试，是一些人借机捞油水的绝好机会。叶观国曾多次外出典试，履职学政，却从不以权谋私。所取之士，“多寒峻宿学”，甚至朝中某权贵为其女婿说情的亲笔信，叶观国也置之不理。叶观国任云南学政时，相国刘统勋到那里视察，看他依然面容清癯，与那些担任学差后便面丰体胖的馆阁之士相比，一派不随流俗的清虚之态，不由得大加赞叹。无论是利益的诱惑，还是权势的威压，叶观国始终像一枝不骄不媚的劲竹，坚守自己作为读书人的那份尊严与气节。

“家有六男子，训课事最急。敢希龙与凤，莫作猪及鸭。”“仕官二十年，未敢蓄黄白。有子不读书，愧此头上幘。”叶观国是靠读书科考进入仕途的，他不敢期望儿孙们个个成龙成凤，但绝不能让他们因为不读书而混同于猪鸭之流。黄金白银他不贪，让儿孙们有书可读，认真读书，这才是事关家族未来的大事。基于这样的认识，叶观国把家从原来的出租屋搬到法海路叶厝后，就专门辟出书房，并起名绿筠书屋，以绿竹的蓬勃向上、劲节虚心自勉，也以此警策后世子孙。

几年后，叶观国的新家迁至文儒坊，那里虽没有叶厝的两片竹园，但书屋仍以“绿筠”称之。今天的游人也许只知道文儒坊的绿筠书屋，

对叶厝的绿筠书屋则知之甚少。

叶厝是一座带花园与凉亭的庭院式建筑，在叶观国的心里，最重要的建筑当是绿筠书屋吧？三山叶氏后来成为福建有名的藏书世家，始自叶观国。他在叶厝为自己也为子孙开辟的绿筠书屋，是叶氏家族成为书香门第、藏书世家的一次庄重的文化奠基。

二

叶观国 53 岁那年，因母亲年事已高，乞假回乡奉母。次年，乾隆下诏开四库修书。应福建巡抚余文仪聘请，叶观国任福建省局总校，其间又因母亲去世丁忧三年。叶观国在家乡住了七年。前几年他住在叶厝，后迁居三坊七巷的文儒坊。

文儒坊的叶观国故居，临巷门楣上挂着“翰

林府”的牌匾。由于前几年三坊七巷实施保护性修复，他的后人已不再居住于此。不过，“文魁”“进士”“魁亚”“六子科甲”“七子科甲”的牌匾，依然高挂在正厅的墙壁上。从叶观国起，三山叶氏一门六世八翰林，十二进士。一面面牌匾，闪耀着家族的荣光。

在文儒坊的故居，我看到一片竹，不过几十棵，细细长长的，在三面是墙的小小空间里向上伸展。叶观国在这里居住时，这片竹荫应该就有了吧？显然，它无法与叶厝的那两片竹园相比，但有了这些竹子的点染，搬到此处的绿筠书屋就有了诗意的映衬。无论在哪里，他的心头都有一片竹，竹的气质与精神，也是他所秉持的家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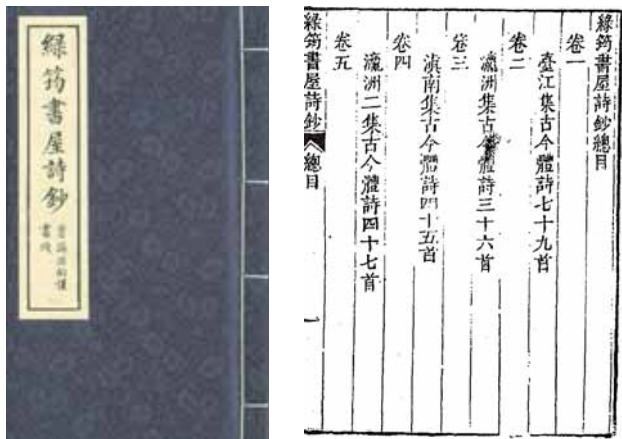
那时候的三坊七巷，名流云集。叶观国择居文儒坊，自然是要让儿孙后代更多地熏染这里的儒雅斯文之气。从叶观国《新居示儿子》诗里，可以读出他对这里的喜爱。“有楼敞可凭，有池清



文儒坊叶观国故居大门



故居正厅悬挂的牌匾



《绿筠书屋诗钞》，叶观国撰



叶观国书法扇面

可掬。轩庭虽不大，颇亦蒔花竹。同志三四人，谈啸慰幽独。喜余还窃叹，住稳转生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叶观国一边主持《四库全书》福建部分的编订事务，一边集闽史闽事著《闽中杂记》。其间，叶观国虽不时赴泉州主讲清源书院，但仍热心参与福州著名文社“读书社”的活动，与文人墨客雅聚唱和。其《绿筠书屋诗钞》共 11 卷，也是在文儒坊居室编就付印的。

家居文儒坊的那几年，无疑是叶观国平生最惬意的时光。刚过 50 岁，阅历丰富且精力旺盛，官俸尚丰，衣食无忧，《四库全书》省局总校的位置，使他得以搜求更多以前未阅的书籍，并予以鉴别考订。一个酷爱读书的文官，从事的是他所喜爱的工作，躲开封建官场的诸多繁文缛节与钩心斗角，沉潜在浩瀚无边的书海之中。丰富学识，让他履职得心应手，显著名望，使他赢得众多文朋诗友的拥戴。这里东连乌山，西接西湖，湖山景色，可亲可近。这里又是省城的中心

地带，水陆道路，四通八达。在这里，叶观国有书可读，有友可交，有文可写，有诗可诵，还可经常出门访古探幽，观风察俗。仅福州一地，叶观国就吟诗百余首，题材涉及湖泊亭台、庙宇寺观、历史遗迹、传闻轶事、民俗风情乃至地方物产，粮食如水稻、番薯，水果如荔枝、青梅，海产如水母、黄瓜鱼，动物如竹鸡、青蛙，花卉如茉莉、栀子花，皆为吟咏对象。百首杂咏，是乾隆年间风土杂咏诗的代表，几可为“榕城文化概览”与“榕城物产志”，为方志学、社会学、民俗学及文史研究增添了许多鲜活资料。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供职翰林院的文官，叶观国关于故乡风物的那些诗作，少有皓首穷经之辈的拘泥与酸腐。“雨歇残星初落后，风疏茅舍未炊前。”清新的乡野之风拂面而来。“两潮水到乌帆集，四序花开翠馆秣。”拥江环山的南国故乡，画一般展现眼前。“棕蓝满贮楼前过，尽上夜台助晚妆。”福州女人喜爱头插茉莉的习俗，被描述得别有情趣。

“贵人总爱田坑好，幽洞曾愁斧凿寻。”对时人为追逐寿山名石盲目开山毁洞的现象，表达深沉的忧虑。这样的诗句，对今天的我们仍有警示意义。

“凡密咏恬吟，隐然皆适于道。历唐宋之精华，写天真之性情，足以抗迹前贤，津梁后学。”“温柔敦厚，为诗学正宗。”“本其生平所得，发为诗歌，故持论迥超流俗。”

叶观国的诗歌以其独特的神采，赢得名流雅士的点赞，他也因此在福州西湖宛在堂拥有一席之地。宛在堂，被视为八闽诗人纪念堂。叶氏一脉入祠宛在堂的，还有他的后裔叶大庄、叶在琦。始自叶观国的文学造诣，绵绵不绝地滋养着他的儿孙，至叶在琦那一代，其后裔历经五代，代代皆有文名。翰林世家，亦成文学世家。

文儒坊原来只是乌山北面的一条小巷，旧名山阴巷。后因曾主持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监祭酒郑穆居此，改为文儒坊。文儒坊的叶观国故居原

为三进，但二三进已被改建。同时，在三坊七巷的南后街有座叶氏民居，那是叶观国五世孙叶在琦所建。这座民居的展厅里，对三山叶氏家族及包括叶观国在内的历代名人都作了专门简介。作为一代翰林及闽派学人诗歌的代表性人物，叶观国在这里留下的印迹，无疑为“谈笑有鸿儒”的文儒坊增添了更多的风雅气象，使这条以斯文气质著称的历史名坊，闪烁出更迷人的光泽。

三

双榕书室是叶观国致仕归乡后购置的一座别墅。

叶观国再度入京后，依旧奉职翰林院，其间曾出典四川乡试，并任安徽学政之职三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叶观国欲回故里省视先莹。时朝中有内阁学士缺位，叶观国资俸班次皆居首列，同朝官员劝他暂缓乞假，他不为所动。一年假满后，年过七十的叶观国因患足疾，又告请病假，不复作出山之想。次年，乾隆帝八十大寿，叶观国扶病赴京祝寿，礼成后即归。此后，乌山东麓天皇岭下的双榕书室，陪伴他度过宁静的晚年时光。

与法海路与文儒坊的故居相比，这里与山贴得更近了。双榕书室，因别墅后面的两棵大榕树而得名。现在，依然可以看到那两棵老树展现出宽厚的枝叶，连成一片带着无尽凉意的绿云，覆盖在别墅的屋顶之上。叶观国当初是不是因为爱



南后街叶氏民居

上这两棵榕树，才决定在这里购置晚年的居所？

“塔铃自语松风送，鸟梦初回竹月沉。惭愧翻浆人海里，清凉容我独披襟。”从叶观国所作《避暑双榕书室》，可以读出他对这里的格外喜爱。曾经的官位已不再留恋，门庭的清冷也无须介怀，只有一项东西他不愿舍弃，那就是陪伴一生的书。清凉与安静，正是读书所需要的环境。绿筠书屋只是他在法海路或文儒坊居所的书斋名，而在这里，他却把整座小楼都称为书室。也许，晚年的叶观国就是要以一座山与两棵老榕，屏蔽世尘的浮躁与喧嚣，以更亲密的态度与书做伴？

那时候，叶观国的藏书已达6万多册。如果说年轻时的叶观国像一棵竹，把深根扎进书山，从中吸纳向上的力量，那么现在的他则更像一棵老榕，绿荫横铺，气根下垂，让书山荡出的阵阵清风，润泽晚年的心境。在这里，他独拥书城，以读书为乐，并整理旧作，著《老学庵随笔》4卷。

要探视叶观国晚年的心灵世界，《老学庵随笔》无疑是一部重要著述，可惜的是，它与此前在文儒坊所著的《闽中杂记》均已遗失。聊可宽慰的是，他的《绿筠书屋诗钞》继生前11卷付印之后，其子辈后又补入7卷，成为汇集1000多首诗歌的18卷本诗集。对叶观国来说，更让他欣慰的是，始自他所营造的浓郁读书家风，如榕树的绿荫

一样延伸开来，也如榕树的气根一样扎地入土，蔚为大观。从清乾隆年代至今，三山叶氏家族在文学、史学、绘画、藏书、教育、翻译、法律、船舶设计诸多领域均有佼佼者，而不论是哪个方面的成就，也不论被世人称誉为什么世家，代代相传的书香，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根本。

叶观国逝后一两百年，江山激荡，世事变迁，双榕书屋数易其主，后来成为邓拓的故居。一代文豪邓拓便是在这里呱呱坠地，后来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历史学家与诗人。叶观国与邓拓，都是一生爱书的人，都是曾经任职京都的文人官员，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集，却以先后住过同一座房子，成为一段佳话。早在南宋时期，这里便是状元黄朴的出生地，被称为“第一山房”，此后，从叶观国到邓拓，萦绕在这里的书香绵延不散，牵引着一代代福州人瞻仰的目光。



“双榕书屋”，现为邓拓故居

碧琳园与蔡氏少年

蔡 林

1

20 世纪 20 年代初，在太古洋行华人老板韦锦川购入瑞荣坊地块后不久，何庆嵩先生也从老乡手里，购入坐落在瑞荣坊北面的地块，修起了私家花圃——碧琳园。兴许这块地本就是一个整体，园子南面与瑞荣坊是用篱笆相隔的；东面是海关巷 14 号园子高高的围墙；北面入户，隔街与围墙内的义和埕仓库对望。来自闽江的浦水，分支流过瑞荣坊南北排屋之间，折向北穿碧琳园流出，又汇入海关浦，顺着碧琳园围墙的墙根，经海关巷 14 号后墙根绕去。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住所的后园紧挨着碧琳园，从后园高高的西墙可见西边邻居墙内出头的树冠，那时并不知墙外是何处。好奇心曾驱使我探险般地打开后园北围墙上的小木门，眼前是三道漂亮的弧线，一沟一路一围墙。我站在

小门石阶上，脚下是宽约 2 米的深沟渠，两块青石板的桥，一头在我的脚下，另一头架在对岸路上。沟渠和路一样由碎石块砌成，湿漉漉地发着幽暗的光，蕨类新绿点缀其中。水从西边紧邻的墙根流出，水流湍急，咕咕作响。北侧围墙外即是海关埕、义和埕，我知道那里有几座义和洋行的仓库排列江畔。每座仓库旁边都植有大榕树，气根参差地骑上围墙，浓密的树冠趁势越过来遮蔽着，这让约 300 米的弧形路显得幽森。



19 世纪的泛船浦

碧是我少女时的玩伴，她比我大些，住在弧线东头的新民街。碧说，当年，东西来往新民街，只有海关埕的碎石路最便捷。早先海关浦有4米多宽，可走不小的船，旁边的路是很窄的。浦水西头连接闽江，浦上架着石桥，桥上石栏杆上刻有石狮子，当地人称这里为“义和后”。

后来填浦扩为“工农街”，海关浦就成了我所看到的1米多宽的深沟渠，石桥也不见了踪影。加宽后的碎石路可走大车，白日里时有卡车进出。那路依然幽森，夜里更瘁得慌。偶尔在某个白天我跟着碧，颤抖着小跑过那里，开启小后门时看到两块青石板。在它的西边10米多处也有大青石板并排架在沟渠上，是4块，这是茶厂工人俱乐部的入口。我们去里面的礼堂看过表演，碧还去那里的职工澡堂洗过澡。那就是曾经的碧琳园。

也住新民街的陈恒先生是我的绘画老师蔡少玉的丈夫，我们都叫他姐夫。20世纪40年代，他在“广东馆”读小学，碧琳园何家姑娘是他同学，他曾去过碧琳园。说是进入碧琳园需经过一座架在浦上的木桥。20世纪60年代初住瑞荣坊的韦，也曾多次到当时改建成为茶厂俱乐部、职工澡堂以及领导宿舍的碧琳园去，与住在那里的茶厂书记儿子下棋，他是从南面的瑞荣坊钻过篱笆去的。韦和我一样，只见过4块青石板卧在水渠上，没有木桥。那木桥或许在20世纪50年代填浦修路时拆除了。

碧琳园的原貌如何？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

的韦和碧都说不清，20世纪30年代来到这世界的陈恒先生说得很模糊，或许他当时注意力不在园子而在那何家姑娘。

我很是关心这位刚对上号，却从未走近的神秘的邻居。峰回路转，姐夫提议去拜访他的大舅子蔡幼华先生。

2

蔡幼华先生是著名画家蔡鹤洲的长子，我们同族，都是“藤山蔡”，这是从宋代蔡襄为一世祖始记族谱，第六世祖蔡伯起从仙游迁到福州“藤山”的一支。按族谱我和他父亲蔡鹤洲同是“学”字辈。但也只是心底暗喜，自打跟从他的妹妹蔡少玉画画，就不敢说规矩了。虽然他后来说，按规矩，无论年龄只讲辈分，但我还是接受不了在他们兄妹面前被称为“姑”。

姐夫说20世纪40年代中期蔡幼华随父到碧琳园，认识了何雪生，十来岁便拜何为师，培植洋兰、杜鹃、睡莲等珍稀花卉品种，一直是全省农科花卉领域的魁首。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驱车与85岁的姐夫，前往五四北某别墅区拜访了蔡幼华先生。

远远就看到他迎在门口的清瘦的身影。86岁的他，是老了，身形和面容却依旧。近半个世纪前，我曾在仓山临江信平路4号“觉庐”，他大伯蔡鹤汀和他父亲蔡鹤洲兄弟的画室“荻芦庵”，也是他老家的洋楼花园里，拔了他种的“紫燕”。



蔡鹤洲原配夫人与二女儿蔡少玉、女婿陈恒及亲家母，在“觉庐”花园合影（蔡小洲供图，林轶南拍摄）

问他曾记否，回答是忘了。

当年他多次挖给我“白燕”“紫燕”，种到我家都不开花。何故？近半个世纪的疑惑，问：是土的问题吧？他点点头，说养花要先养土。“哈，揭秘了！”他笑了，神情比他年轻时的凝神庄重显得和蔼。

他带我下到温室，那里养着各式的洋兰，虽已远不如当年荻芦庵的规模，却依然清幽洁雅，植株与盆的搭配，株与株之间的穿插排列，无不透着主人的艺术修养和园艺技巧。他边介绍稀有品种边说：有看上的，走时连盆子一起带走。我虽点着头，心里却觉得不可以，那花终将是会被我糟蹋的。

刚坐定，蔡幼华先生就拿出一张照片，还有

一张是用铅笔工整写下的碧琳园简介，看来他是有准备的，我不由得心生感激。

照片上，一位老人约莫 50 岁光景，竹清消瘦地端坐在花棚中，头戴深灰毛呢质地暖帽，身穿翻毛领深色紧身厚棉衣，双手拢在窄窄的袖口里。两眼注视着镜头，张着的鼻翼，撮着的嘴，似乎想说什么。有着与同时代大画家齐白石相似的胡子，不凡气度也酷似齐白石。“这就是何老，这时有些落寞了。”蔡幼华轻轻地说。我已经猜到了，这富有个性的气质，这虽败尤贵的艺术范，正合乎我意识深处对碧琳园主人的理解。

自从福州开埠以来，西风东渐，洋人的生活习性慢慢渗透进这不大的城市。洋人爱用盆花装饰居所，有送花的礼节。大户人家洋气相投，争相攀比购买，培养名贵花种，装点门面，馈送亲友。何庆嵩看准了时机，修了园子。这园子里的洋兰、杜鹃、海棠等品种繁多的名贵花种随船从东南西北而来，花品优越，花种丰富。据《福



碧琳园主人何庆嵩（何雪生）（蔡幼华提供，蔡林拍摄）

州市郊区志》记载，何庆嵩通过德国薛林洋行，从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引种许多花，如兜兰、卡特兰、西洋杜鹃等。

但是名花金贵难养，尤其洋兰的培植在当时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这需要足够的农技、花艺以及足够的耐心。他让来自异域的洋花洋草在福州的土壤里、空气中生长茂盛。这在当时的福州乃至全国都是极其罕见的。

“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国内花卉品种相当匮乏，但是，没有哪一个城市或哪一个单位有像碧林园那么多的花卉品种。”这是农科院花卉专家蔡幼华在专著《八闽花卉史略》上的原话。

3

蔡幼华是如何与这园子有缘，又如何与老人有如此深交的？这得从著名画家蔡鹤汀、蔡鹤洲两兄弟说起。

当碧琳园出现时，生于1909年的蔡鹤汀和生于1911年的蔡鹤洲正值少年，自幼酷爱绘画。两兄弟当时家居塔亭的郭厝里，离闽江泛船浦起点舍人庙不远。9岁的弟弟跟着11岁的哥哥，师从泛船浦之东的港头“没手”画师俞鸿冠学画幕景。兄弟两人经常在闽江的沙滩上，以荻芦习画。闽江的沙滩是他们的画布，荻芦是他们手中的画笔，远山、近树、蓝天、碧水、白帆、沙鸥，家乡的灵动山水场景，一幅幅在沙滩上呈



《八闽花卉史略》，柴喜堂、蔡幼华主编

现。基于对荻芦的感情，兄弟俩的画室取名“荻芦庵”。

福州开埠通商，让当地人见识了西洋镜。用声光电打造的机关布景，已是兄弟俩的绝活。到了20世纪30年代，福州闽剧的机关布景誉满全国。两兄弟设计绘制的福州戏曲舞台美术，已名声在外。无论是水漫金山的巨浪江涌滔滔，还是“红莲寺”的火光浓烟滚滚，无不令观者大惊失色，几欲先走。

应上海大舞台之邀，蔡鹤汀19岁时带着弟弟赴上海绘制舞台幕景。“后与黄宾虹、张大千、王一亭、刘海粟、朱屺瞻、唐云、钱瘦铁等人来往甚密，常常外出写生共同切磋艺术，画艺大进，加之先后在上海、广州、南京、杭州、香



蔡鹤汀国画作品

生是结交的好友，碧琳园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两兄弟前去赏英、买花、绘画，蔡幼华常跟随父辈出入碧琳园，成为碧琳园里的常客。何雪生喜欢上了这位透着机灵劲儿的小个子男孩，牵着他的小手走过宽大的厅廊，下到花圃中……

蔡幼华是唯一不拿画笔的蔡家大少爷，他爱上了碧琳园，迷上了园中奇花异草。园子里的洋花名草可谓多呀：卡特兰、蝴蝶兰、拖鞋兰、石斛兰、金鱼的、蜂兰等争奇斗艳；还有百多品种的杜鹃，其中来自日本的杜鹃称为“东鹃”，有80多种，小朵儿繁花似锦，“西鹃”是来自欧洲的，有十多种品种，大花瓣艳色迷离；款款深情秋海棠，仅单瓣叶海棠就有十多种；还有紫色的睡莲、青葱的铁线草。这一切无不牵引着他的目光。他在三一中学读书放学时，就常顺着海关埕斜坡（现在的二桥南边东侧）一路拐入那弧形碎石路的西头，过桥来到园子。10岁出头的他，投入花丛中，开始他终其一生的热爱。

4

港、南洋举办画展，一时名噪江南”。

1935年蔡幼华出生了。此时，正值他大伯和父亲在上海大舞台发展。1940年底，他跟随大伯和父亲回到福州。

蔡鹤洲年表记载：1939年将上海大舞台工作交由学生黄子曦等人打理，开始鬻画生涯。上海归来，蔡氏哥俩潜心绘画。街坊品位不俗的何雪

蔡幼华先生、姐夫、我，围着大客厅的茶几，铺开了白纸。随着我们在纸上游走的笔尖，碧琳园的大门被打开了。

进门来到一座两层的红砖建筑的走廊上，走廊很宽。蔡幼华动情地说：这与我们常规的走廊不同，确切地说是个宽厅。根据他的比画推算，廊宽约4米，在尽头折成L型。长廊边上的柱间

设有石凳，石凳上面摆着各类的花。廊下挂满了珍稀的拖鞋兰、金鱼兰等喜阴的名贵花种。金鱼兰开花了，犹如一条条金鱼游走于长廊，花瓣上还有鱼眼，鼓鼓地盯着。宽廊还是个展厅。何先生最高兴的就是时不时在这里举办花展，琳琅满目的名花布满极简的建筑里。

厅廊的一侧是红砖墙，这是主楼部分，平面呈现凹字形，凹入部分是个天井。天井高约6米，上铺设玻璃雨棚采光。三面墙分别间隔砌了水泥槽，有四道围合。槽中蓄水，种喜水湿的植物。主楼部分供家人居住。建筑一楼的厅廊左侧是一片花圃，花是以盆栽形式，阶梯状成排摆放在砖墩水泥板花台上，空中铁丝拉索上也尽是各类挂盆。

在靠北墙边，有一口4-5平方米的方形水池，池里铺满从日本引进的名贵紫睡莲。这睡莲奇特，根茎与普通睡莲长根不同，是如地雷般大的块茎。从清明节开花，到11月花谢，花期长达200多天。更奇特的是，这花睡在池子里就长阔叶，开大花；睡在小盆子里，就长小叶，开袖珍花。当年这块茎每枚值得1-2个袁大头，足以称奇。听着华哥的叙述，我眼前浮现出印象派大师、法国画家莫奈晚年的睡莲，如梦幻般的意境在20世纪20年代初，真实地在泛船浦海关埕碧琳园里出现，并持续到50年代。

与水池南面相望的是一个全玻璃花棚，玻璃花棚占地略小于水池。那里安置着的是碧琳园主人20世纪20年代初期从国外引进的多种洋兰。

蔡幼华对碧琳园中的花卉品种、珍稀程度如数家珍：20世纪80年代，他在《大众花卉》上刊登了《什么是洋兰》，首次把碧琳园里的洋兰知识介绍给公众。他执笔编写了《八闽花卉史略》，自秦至民国期间，从历史上、专业上、品种上对福建省花卉进行了梳理。其中不乏对碧琳园中的中外名花的介绍。如：花茎长达1米多，开着绿花的兰草“绿墨素”；叶片层层叠叠，紧贴下探延伸，观赏性极强的奇草“铁线草”；还有枝干成四棱状的罗汉松等。

园中盆景也修得别致、艺术，红梅、粉红梅的盆景样式堪比苏州周瘦鹃作品，水培榕树盆景在当时也极为罕见。碧琳园在园艺技术上、观赏艺术上均高出同时代园林。

园子东边“有一面高墙”，蔡幼华回忆道，“墙边种着高大的果木树，遮盖整个园”。他记得有一梨树很高大，吃过那树上的梨子，特脆、特甜，至今还回味。哦，那就是我在隔壁看到的围墙上的树冠结出的美味梨子。

5

福州两度沦陷，碧琳园洋客、富客四散。维持到20世纪40年代末，名花已无人欣赏，往日的红火落了个冷冷清清。主人何雪生不得已把花送到塔亭商铺寄卖，名花流落却无人问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国内花卉品种相当匮乏，建设局园林处陈树华找上门

与何老联系。几经考虑，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碧琳园主人何雪生终于带着女儿，连同园子里的所有花卉一起搬进了西湖开化寺，那些名贵的花草草，走出深闺、走出困境，展示在大庭广众眼前。碧琳园完成了花圃的使命，成为国有茶厂的俱乐部和职工之家。已经学业有成的蔡幼华，依然常应何老之邀前去西湖帮忙。

由此，西湖公园每年举办一届杜鹃花展，持续多年。福州的洋兰、杜鹃、海棠遥遥地站在我国花卉品种的前列，碧琳园无疑为福州带来了骄傲。

碧琳园是泛船浦一带难得的一座清新脱俗的花园，吸引着文人雅士聚集。蔡幼华的伯伯蔡鹤汀和他的父亲蔡鹤洲当年与园子主人何雪生交好，自然留下不少墨宝。蔡幼华清楚地记得，有一巨幅画像，左侧山崖泉水倾出，哗哗流下，何老板身着长衫立于百花丛中，兼工带写的画面上各式洋兰、杜鹃、睡莲盛开在周围，翠绿欲滴的兰叶衬托着卡特兰的雍容娇媚、蝴蝶兰的翩翩风姿、金鱼兰的惟妙惟肖、石斛兰的附树牙茎……

我在画家蔡鹤洲之女、蔡幼华的妹妹蔡少玉家客厅见过署着蔡鹤洲与二夫人林金秀的大名，嵌在客厅玻璃板墙后的百花图。这是一幅约4米的长卷，尽以工笔画满了多样花卉、藤蔓、树杈……那线描得流畅，色填得工整，彩过渡得柔和，花与花之间的排列，花与叶之间的映衬，树藤的穿插布局，无不尽善尽巧，美轮美奂，这无疑也是一幅表现百花的巨作。

出于对碧琳园的向往，以及受仓山地区西式建筑的影响，蔡氏兄弟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购入离海关埕不远的临江信平路“觉庐”火灾后的残地，修建了一栋有着地中海式拱形门廊的两层白色洋楼，作为居所和荻芦庵画室。不忘留出大块的地种植名贵花草，那里成了蔡幼华的乐园。20世纪50年代初，蔡鹤汀、蔡鹤洲应邀前往西安发展，离开了福州。当年种植的十多棵的大茶花，代表福州捐献给北京，用于人民大会堂园林绿化。

20世纪蔡幼华在工作之余继续耕作他的荻芦庵花田，研究探讨奇花异草的培植。

70年代初，“觉庐·荻芦庵”前面的洋楼已被居民瓜分居住，蔡鹤洲夫人、蔡幼华兄弟姐妹们住在后花园里。我常前去看画、观花、拔苗。如今那里已旧貌换新颜了。

搁笔整理时，又被一段资料感动。郭白阳《竹间续话·卷三》载：“杜鹃花，以黄为贵，白次之，红最贱。山中有之。何友雪生碧琳园种植此花百余种，皆中外名品也。花时五色缤纷，惜有色无香。先公有《约匹园老人诸君燕集花间》诗云：‘满屋花光日未曛，延宾园主意殷勤。盆盂犹带沧溟色，隅坐黄鹂独不群。’又句云：‘若向花中论妙品，应从淡绿唤真真。’绿花者，海外异种也。”我不禁低喃道，“绿墨素”也。

碧琳园不仅有品格高雅的兰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睡莲，以及热情的杜鹃，幽隐的海棠……更有一个倔强的，富有艺术个性的老人何庆嵩。

八闽第一垦

吴安钦

1

连江县地处东南沿海，海多田少，有着蜿蜒绵长的海岸线和宽阔平展的滩涂。大官坂是其中最大的一片。千百年来，这片黑褐色的滩涂潮落潮起，生长着缢蛏、泥蚶、弹涂鱼、海蛎、小虾等海产品。但这些自生自长的海产极其有限，一年长一季，够不得周边十多个村岛数千渔家人一个月的采捕，且不能当主食。主食却是由政府供应的定销粮——大米、地瓜米和面食。连江历来就是一个缺粮的大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国家仍处在艰难的起步期，为确保群众有饭

吃，又不向上级伸手，连江县决定开垦种粮保民生。20世纪50年代，选择小官坂进行围垦造地实验，于1964年一举成功。小官坂围成近5000亩的垦区，造田种起了水稻，并获得较好收成。接着，连江县就开始筹划大官坂垦区的围建。计划先在东区围个小官坂那样的垦区。从门边至颜岐村堤坝起步，因财力不足，断断续续抛石填土干了几个月，才刚刚形成堤基，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毫不留情将其摧毁得只剩下几块长短不一的条石。

连江县的决策者们一致认定，要干，就要集中力量，全面上马，一干到底！设计图纸出来了。预算总投资2600万！可是，县财力极其有



连江县大官坂垦区

限，到1976年，全县财政总收入还达不到500万。设计好了的方案被搁置进了资料库。

这一搁就是十多年！

直到1977年春天，以吕居永为首的连江县委一班人，一致认定，就是举债，也要把这个垦区围起来！他们提出了“一切为了大官坂，一切服从大官坂，一切想着大官坂，一切服务大官坂”的“四个一切”口号。县委副书记刘永雄主动请求到围垦一线担任总指挥。同年7月，正是酷暑时节，由县直相关单位抽调的145名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大官坂围垦指挥部，开进了罗源湾南岸的门边自然村，当天便在半山腰上的民房里安营扎寨。

门边，是坑园镇一个小自然村。地理位置险要，门前是一条深不可测的海港，其后有一座巍峨高耸的蛇头山。设计中的大官坂垦区的起点站就在门边。

指挥部进驻的第二天，天朗气清的罗源湾竟然刮起五六级大风。为保证工期，总指挥刘永雄带领班子成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驾着舢板船，带着最原始的竹竿、经纬仪和水准尺，根据图纸设计中堤坝所经过的海域进行现场勘察。风平浪静时，可多测几段，遇上风大雨急，一天很难测上几米。退潮时，他们便下船，穿着雨靴扎进沼泽一般的泥土里。浅滩浅涂还好，稍深一些的海滩，双腿扎进去时，雨靴很难拔出来，只好赤脚上阵。滩涂里不仅有各种各样的贝壳，还有不少玻璃垃圾，因此，参与测量的人员都或多或少地



1977年9月在指挥部召开誓师大会

被刮破皮肤。鲜血流出，没有人停步去擦一把。不管腿脚伤得轻重，第二天没有哪个人为此而落下。

经过近3个月的前期工作，这一年9月的一天，在铿锵的锣鼓声和热烈的欢呼声中，大官坂围垦工程正式动工！

2

9个公社的参建队伍同时入驻大官坂，分别在7个海岛所在地设立了9个工程指挥所。大的公社来的人多，如琯头、浦口、黄岐、马鼻、坑园等公社，参与建设的民工数都在500人以上。小的公社，人数也都在300人左右。民工上工最多的一天，竟达到11000多人。参建民工是精心挑选来的各路人才，不是石匠，就是泥土工。此外就是体力好、有挑功、有驾驶技术的人员，编成多种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真正是拉得出来，冲得上，打得下来。有人也许不会相信，他们是

当义务工来的，而且生活条件差。那时候，每个民工一天只补贴1斤粮食和3角钱，不够的自行负责。随便到哪个指挥所食堂看一看，一大排饭甑里炊和蒸的大部分是地瓜米，下饭的菜多是糟菜虾皮汤，家境条件好一些的人家，多一两条小鱼鲞。他们住的全是临时搭建的低矮石头房，这些工棚式的小屋，不是近山就是临海，临海的潮湿，近山的常有蜈蚣和蛇蝎光顾。但他们没有一句怨言。

工程刚上马，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天夜里凌晨3点多，暴雨突然倾盆而下。堆放在蛇头山仓库里的炸药面临被雨水淋透的危险。整整一个仓库的炸药啊，且不说经济上的损失，一旦淋湿，第二天的工期就会受影响。处理不好，随时都有发生爆炸的危险。这时候，不知是谁大喊一声：“抢救炸药呀！”干部和民工们从四处向仓库蜂拥而来，搬的搬，扛的扛，抱的抱，争先恐后携着炸药包从危险地带奔向安全之处。他们宁可打湿自己，却用雨衣保住了炸药的安全。当炸药全部安全转移时，天已拂晓。

围垦工程的一个特点是，根据潮汐的变化上工，潮退我进，潮涨我退。而真正退潮到海港底心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那时没有挖掘机、推土机、铲机等机械设备，使用的是最原始的钢钎、铁锤和鑿子。运输工具最先进的是手扶拖拉机。为有效使用劳动力资源，各指挥所在指挥部的领导下，对民工进行分工协作。根据民工技能所长和工程之需，很快调整为常规性的三个工

种。一是有开山炸石技术的工人，早晨6点半上工，分别到门边山、红厦山、文山岭或者西线的辋川山敲山开石；二是有拖拉机和船舶驾驶技术的人员，随同石匠出工，既负责搬又负责运，将打出来的石头运到指定工场；三是能扛能挑善在滩涂用工的人员，则配合工程技术人员施工。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多的民工，没有出现一个不服从调配的人，没有一个叫苦喊累，没有一个慵懶惰工。且不说伙食差，仅每天收工时洗澡就难倒了他们。一个指挥所只装一至三个水龙头，工人们同样没有半句怨言，排队冲洗。有的人干脆就到海水里泡一下。

马鼻公社来的多是有打石技术的工人，自带钢钎、铁锤和鑿子。白天上山采石，夜晚三五一伙集中一块，烧火淬炼工具。往往都干到9点甚至10点。筱埕公社来的民工，多是具有船舶技术的人，他们的船如果出现破或漏，就要自行负责维修。来自浦口镇的还有一支女子专业打桩队，这支由几十名武装基干女民兵组成的队伍训练有素，男子汉般拼搏在海滩工地上。还有，当急需时，指挥部一个电话，各地，特别是垦区周



马鼻公社工人在抛石垫层施工

围所在地的共青团组织，就以最快的速度，一个大队一支团员队伍地迅速赶到工地……他们不但没赚一分钱，多数人可能还要贴上不少往返交通费用。他们没有半句不满的话，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大官坂垦区早些围建成功，早些生产出粮食来，造福全县人民！

3

大官坂垦区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指挥部做出了先软基后岩基、先深港后浅滩、先压载后堤身、先水闸后堵口的施工程序设计。经过几场压载石搬填的大会战，于1978年1月进入堤坝建设。指挥部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段段实地勘察滩涂时，发现被命名为“九号堤”的海滩是整个滩涂中最严重的软滩。用大力气，一钢管可以插至50米深度，可见其软的程度。在如此深度的软基段上筑堤建坝，稍有风浪便可摧枯拉朽。怎么办？指挥部请华东水利设计院的专家一同决策。专家的意见是，采用国外最先进的塑料膜排水法来固结淤泥。一番测算，成本高得无法承受。一位技术员提出可学浙江温岭围垦工程打沙桩固淤办法。罗源湾属缺沙区，如此大量的沙子从何而来？熟悉渔区工作的刘永雄率运输科科长陈木金等人前往琯头东升渔业大队和时属浦口的东水渔业大队，两地渔民表示，只要大官坂围垦需要，他们全力支持。两队渔民每天驾驶200多艘渔船，分别奔



九号堤施工现场

赴闽江口和霞浦西洋岛等地采沙运沙。沿途的黄岐、筱埕渔民同时行动，参与运沙。最高峰时，一天上千艘渔船运沙到工地。仅3个月，就完成了37万多立方采运沙任务。千米烂泥滩涂变成了金黄色的沙滩。

如何打沙桩又是一个难题。根据工程师的意见，仅这段就需要打下不少于一万个的沙桩。在滩涂软基地打桩完全不同于在普通的山地里打桩。打完一个桩，沙子必须马上跟灌进去。工程科从温岭运回一台打沙桩的设备，这设备笨重，十几人才能挪得动，试用一个潮水，结果打完三条桩都难。用这个设备，这样速度，仅打桩要用三年时间！

总指挥刘永雄带领班子成员来到九号段，和工程师们现场办公。从县水利局工程科抽调来的工程科科长林品恒大胆提出了改造沙桩设备的设想。会上，大家集思广益，终于想出了办法，即以温岭沙桩机为基础进行技术改造，自行制造简易轻便适用的沙桩机械设备。县农械厂技术人员仅用一周时间，就送来了经过技术改造，仅两人即可抬动、以12匹马力柴油机为动力的打桩设

备。

打桩和灌沙是围垦工程中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程，是直接关系到堤坝是否坚固的百年大计。为此，指挥部调动了很大力量，实施大会战战略。在这次大会战中，浦口镇的女子打桩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这支队员只有二三十岁年龄的队伍，英姿飒爽，敢打敢拼。打桩时，她们围在桩子周围，举着铁锤，喊着号子，轮流一锤一锤举起来打下去；灌沙时，她们排成长队，装满沙子的土箕，从她们手上像击鼓传花一样，飞快地传递着，从船上直传到打好的桩洞里。这个上百万民工上场劳作的场面，十分活跃生动，充满了喜庆欢乐的气氛。这支女子打桩队，因为她们的精神和干劲，曾被人们称作是“铁姑娘战斗班”！更浪漫的是，这支铁姑娘队伍，一闲下来，便有十来个能唱善演的姑娘上阵，现场表演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

原本3年还完成不了的打桩任务，设备改进之后，在万人大会战中由14个队同时施工，仅3



女突击队参加打沙井

个月，就在3050米长的软基地段上完成了18480条桩的打桩工程，征服了史无前例的深度烂泥软基！

工程上马不到9个月，1978年6月，堤坝已经露出水面！

4

正当人们为工程有如此之进度而欢欣鼓舞时，突然传来消息——大官坂工程必须下马！原因是，调整国民经济布局，压缩部分工程。

大官坂工程工地一下子冷清了。

看着一大段一大段艰难围填起来的堤坝，指挥部领导在望海兴叹的同时，又于心不甘。凝聚着多少民工心血和汗水的堤坝，难道就这样付诸东流？

指挥部的领导坐不住了！一向少言寡语的副总指挥曾祥枢，竟然提出：找省领导去！

他们还真的去了省政府。当时分管经济发展项目的许副省长接见了他们。难以想象的是，这几个来自连江县大官坂围垦指挥部的指挥、副指挥，竟然和许副省长唇枪舌剑起来，为保住这个工程据理力争。出人意料的是，这位颇有雅量的许副省长答应：可以到现场看一看再说。

更惊喜的是，就在这个月份，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廖志高，专程来连江视察这个工程，他对大官坂垦区的围建速度和创新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回省里后，他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

上说，视察大官坂，被他们的决心和工程气派所感动。这个工程，不但不能下马，而且要把它列为全省重点围垦工程加以支持。

工程补助资金从 680 万增加到 1600 万！将要下马的工程，这时竟成为福建省重点工程。

大官坂围垦工程工地又火热起来了！

5

各指挥所、各工种队伍，夜以继日，加班加点，要把停工造成的损失给补回来！

不到半年，所有堤段全部露水，为全面堵口截流奠定了良好基础。于是，计划中的 1980 年下半年的堵口截流如期进行。

堵口截流是围海工程最惊险最关键的节点，关系到整个垦区的成败。一旦出现意外，不仅前功尽弃，还有可能发生堤毁人亡的重大事故。因为，罗源湾南岸，即大官坂工程工地所在海域的最高潮差将近 9 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北面的潮水向南面涌动时，将产生 1 亿立方米的动力。仅这点，就可知截流的严峻性。为此，指挥部一班人和专家一道，多次调研，反复论证，做出了尊重科学、每天测量、不快不慢、稳中求进的堵口战略。

根据设计，两个闸门设在三号堤的竹屿岛和八号堤的青屿岛上。工程选择了潮水压力相对小的地方建设闸门。这是因为在岛上建闸，承载力强，安全系数高。

惊心动魄的堵口截流终于来了。

意料中的状况果然发生了。一块一两百斤重的石头从船上入海，一进水便被洪流般的潮水冲得不知所向。同时发现，所有运载石头的木船不仅装载量小，卸载还极不便利。每块 200 斤以上重量的石头都要靠两三个劳力合作才能卸下入水，就此做法一艘船一天只能运载一次，既笨拙费力又影响工效。指挥部领导分头行动。一个组专门请来连江县当年最有名气的造船专家吴金土和卢志忠，就船舶如何改进进行探讨。两位专家根据提供的情况，到海域现场进行考察之后，设计出了船身短肚子大、承载量为 5 吨重的可自动卸载的装置船。即在左右船舷上装置两个可动的板块，开关一按，即自动向舷外倾斜。这船型因状似蝴蝶，因此被称作蝴蝶船。蝴蝶船发明使用之后，效率大为提高，一艘船一天至少可以装运两次。

另一组专攻石头定位难题。近 200 斤重的石头都守不住它们的位置，可见潮差之力有多大？也许是急中生智吧，工程技术人员想，200 斤挺不住，500 斤挺不住，1000 斤总能挺得住吧！于是，他们大胆而果断地做了试验，用最粗的 8 号铁丝线扎成笼子，将石头装进去，然后再将一个一两千斤重的大笼子推向海底。

这一招把咆哮的水流镇住了！

就这样，从这年的 11 月 13 日开始，每天 800 多人上阵，100 多艘蝴蝶船穿梭其间，连续作战八天八夜，终于把两个设闸段的水流牢牢地控



蝴蝶船抛石施工作业

制住了！

1980年11月20日，也就是开始堵口截流的最后一天。两个闸门施工现场人山人海，百余艘蝴蝶船和各类应急备用船只川流不息。劳动号子声震撼海空，但汹涌而起的波涛声比人们的号子声还要大，狂涛巨浪仿佛向人们做最后的呼喊。所有在场的人们，无论是指挥官，还是施工员，甚至连旁观者，都屏住呼吸，心情既亢奋又紧张。这是决战决胜的重要时刻，稍有闪失，就可能在这个海域作业的人们发生极端性事故！

可喜的是，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中午12点30分许，两个闸口相继截流成功！专家说，在围垦工程堵口截流中，一次性成功的很少。大官坂创造了一项令人信服的纪录！

6

如此之大的围垦工程，在截流堵口时没有出现伤亡，这是罕见的。但这个工程在前期付出的代价却不小，前后共有24人在工程工地献出了生命。

林华仁、黄兆太、张宗汉，在开山炸石时，不幸被巨石砸中，当场牺牲。还有多人因为哑炮突然燃爆而被石块击中。陈道莺、陈道江等人，在运载条石时，不慎落水……

其中还有一名领导干部，他叫黄华吉，是筱埕公社副社长，时任筱埕指挥所的指挥。那天中午，他正同指挥部领导和工程师在所里探讨压榨石的开采事宜，突然，一声炮响，一块爆破飞来的石头从瓦顶落下，砸中了他的脑部。黄华吉当场牺牲，年仅39岁！

难能可贵且让人感动的是，所有为大官坂围垦工程献身的英雄的亲属，没有谁向政府提任何要求，连给个烈士称号的要求也没有。他们认为，奉献大官坂是应该的，为大官坂围垦而牺牲是光荣的！

时任连江县委书记吕居永说得好：所有参加大官坂围垦的人，都是这个工程的功臣！因此，在4万多亩的大官坂垦区里，八号堤的小山坡上建有一座可瞭望全垦区的“怀垦亭”，亭下竖立着一块小小的围垦纪念碑。

几十年过去了，这片从门边到虎爪，13个海岛、14个堤段5676米长的4.13万亩大垦区，历经了无数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仍傲然挺立，被称作“八闽第一垦”。而当可门港开发、当港口工业发展、当国家重点项目需要这个大平台时，他们义无反顾地让出了这块黄金宝地，使这片垦区完成了从粮食种植区到渔业养殖区再到工业园区的蜕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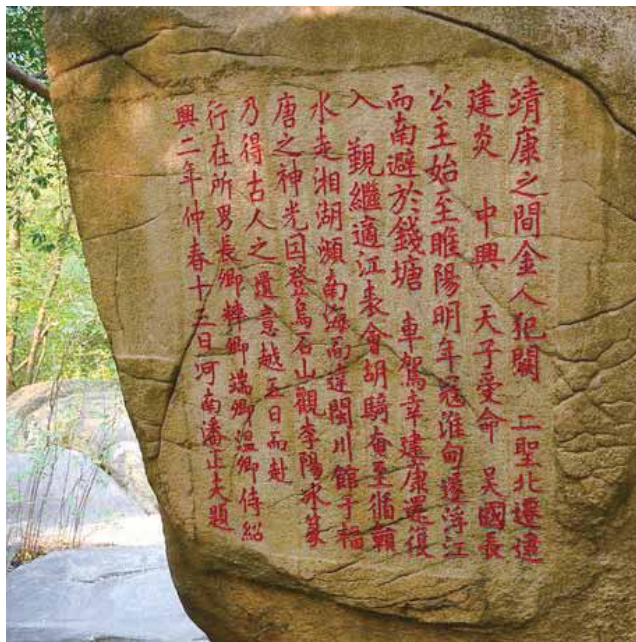
赵宋宗子在闽都

卢美松

据梁克家主修的宋淳熙《三山志》记载，宋室南迁之后，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将原供奉的赵氏王室七殿神御、四殿御容，由浙江温州奉安于福州开元寺大殿。《三山志》还载，绍兴三年（1133），宋朝西外宗正司移置福州，设知宗正司事一员，此外还有丞、簿、主管敦宗院及宗学教授各一员，专司在福州的赵宋宗室事务。按例西外宗正司官员皆授本朝的宗室成员。

宋室南迁，其宗室人员亦经长途奔波而后追随宋高宗赵构。这在福州乌石山霹雳岩下摩崖石刻“潘正夫题记”中有详细的记述：“靖康之间，金人犯阙，二圣北迁。建炎中兴，天子受命，吴国长公主始至睢阳。明年，寇淮甸，遂浮江而南，避于钱塘。车驾幸建康，还复入觐。继适江表，会胡骑奄至，循赣水走湘湖，濒南海而达闽川。馆于福唐之神光。因登乌石山，观李阳冰篆，乃得古人之遗意。越五日而赴行在所。男长卿、粹卿、端卿侍。绍兴二年仲春十三日，河南潘正夫题。”潘正夫，字蒙著，河南人，官至太傅，封和国公，是吴国长公主之夫。公主是

宋哲宗第三女，金兵破开封后，她随夫南奔，携带四男儿。潘氏题记叙述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破宋都东京（开封），次年于大肆搜刮、劫掠之后，俘虏徽宗、钦宗二帝及宗室后妃数千人北去。潘正夫也由此开始了流亡行程：先是随带家小至睢阳（今商丘），翌年因金兵南侵入淮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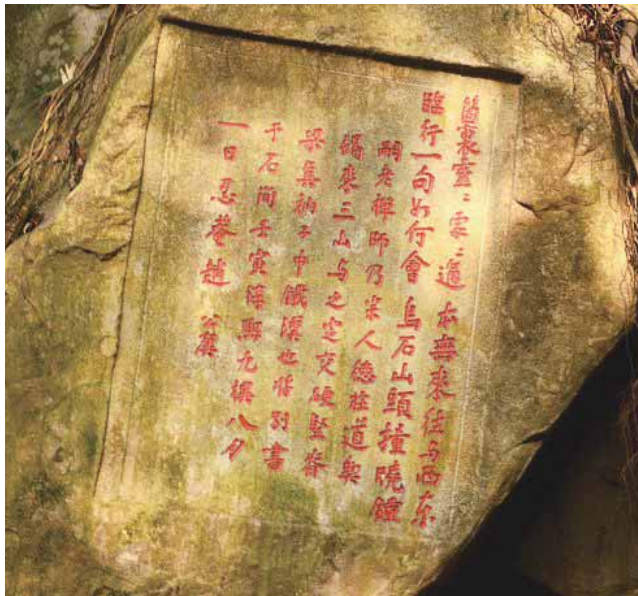


乌石山霹雳岩下的摩崖石刻“潘正夫题记”

（淮河流域），渡江南遁，避难于钱塘（杭州）。高宗车驾抵建康（今南京），并以之为行在（临时首都），潘氏夫妇遂入觐见高宗。继而到江西，因金兵突然来袭，遂循赣水逃往湖南，再到广东海边，最后进入闽江之滨的福州，下榻于乌石山神光寺。因而登上乌石山，观赏李阳冰留下的墨迹石刻。过了五天，又匆匆北返去钱塘皇帝行在所。这一流亡过程镌刻于乌山崖壁，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赵宋宗室人员的活动轨迹，因而弥足珍贵。

《三山志》对赵宋宗室成员在福州的活动情况记载甚少，只有朱貔孙（福州州学教授）补录的进士名单中，记载了宗人参加科举考试的中选结果。时间从绍熙元年（1190）余复榜到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的66年时间，共列福州所辖（西外宗正司所属）“宗子正奏”进士322名。其中嘉定四年（1211）和嘉定七年（1214），每榜各有12人；宝庆二年（1226），宗子中进士者多达91人。可知福州地区西外宗正司所辖赵氏宗子中进士者也不在少数。

赵氏宗人随宗正司入闽后，分为两支：一支在福州，归西外宗正司管理；另一支居泉州，归南外宗正司管理，这支于宋末因蒲寿庚降元而遭杀戮，死亡3000多人。宗正司和宗子们的活动，正史鲜有记载，唯在福州宗子的某些活动，如登临游观、会友吟咏、节庆聚会及宴饮等见于摩崖题刻者，后人可知一二。如宋淳熙九年（1182），赵公虞（号忍庵）在福州（三山），



宋淳熙九年（1182），赵公虞题刻

当时“嗣老禅师乃宗人德庄道契，揭来三山，与之定交”。临别时作七绝诗一首，刻于乌石山霹雳岩下，诗曰：“个里灵灵处处通，本无来往与西东。临行一句如何会？乌石山头撞晓钟。”此诗“书于石简”，实即摩崖题刻，至今尚存。赵公虞乃宋颍川郡王赵德彝六世孙，淳熙六年（1179），以朝奉大夫任福州西外宗正司知事。

霹雳岩旁另一石上，还有宗人赵希道的石刻，文曰：“赵成己、克一、唯伯、颖叔，淳祐甲辰（1244）日南至（即冬至）之九日同来。”还题有五绝诗一首，落款为“呈和尚禅师。汴赵希道唯伯书”。由此可知：赵希道字唯伯，与成己、克一、颖叔四人均为赵氏宗室，同游乌石山，因此称“石中题岁月，聊记此时游。寄语岩头老，能令不朽不”。人道金石不磨，看来题石果然至

今未朽。还有一处霹雳岩下字数颇多的石刻，是作于绍兴二年壬子（1132）正月的，记得是“参知政事孟庾，宣抚闽部、按视城守回，邀嗣濮王（赵）仲湜、资政殿大学士李纲、龙图阁直学士许份”等11人，“会于乌石山之长乐台瑞云庵。”可知，这是一次高官贵朋的盛会。值得注意的是，嗣濮王赵仲湜名列受邀者首位，可见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聚会。

还有一处霹雳岩下的题名是向彦绩等人的。他们于绍兴乙丑（1145）冬季，“来游神光（寺），登乌石山，访三十三奇。”同游的六人中，有两人身份特殊，即“王嗣（赵）廉石、（赵）伯元”二人。叶大庄在《闽中金石记》中道：“王嗣者，盖宋之天演（潢）也。题名中亦有称玉牒者，是其用例。”说明他们是赵氏宗室成员，是宗子，籍入皇家之玉牒者。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宗子活动，都与佛教禅师有关，有的宗子本身就是禅师（如赵德庄），有的是在庵中（如瑞云庵）活动。向彦绩题刻还注明“觉师同至”，盖指偕某禅师同来。潘正夫一行到福州，也下榻于乌石山神光寺，可见那个时代崇禅向佛的社会风气很盛。无怪乎宋诗人尝有诗咏曰：“路逢行人半是僧”，“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极言向佛之风盛行。

另外，在乌石山天章台侧南向面，也有一段摩崖，系嘉定五年（1212）正月，沈如愚等“庚戌（1190）同年仕三山者”11人，睽隔20多年后再聚首，“序拜于道山，举酒相属，从容欢洽。”



天章台侧南向面，沈如愚等十一人聚会题刻

他们感慨于时光流逝，“自期集迄今，岁月飘忽如许，各天一涯，无由合并”，因而重会倍感兴奋，一致认为“是可识也”，故刻石以为欢聚的纪念。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1人中有两人乃赵氏宗子：“玉牒赵崇志安伯、崇复仕翁。”他们二人的籍贯可能不是闽籍，因《三山志》“人物·科名”绍熙元年庚戌（1190）榜无上述二人之名，而后续石文又有“偕是邦陈子坚”等六人字样。玉牒专指皇族谱牒，《宋史》载，真宗“诏宗正寺，以帝籍为玉牒”。（“真宗纪三”）《宗室传序》又曰：“降至疏属，宗正有籍，玉牒有名。”说明赵氏皇族成员，即使“降至疏属”，也仍在宗正掌管的皇族谱牒中列名。此次时隔22年的11名同科进士聚会，说明宗子与异姓同年友情深厚。

乌石山霹雳岩下题刻：咸淳三年（1267）正月，赵若遂、赵必昱等七人，“会拜于道山堂，序

列以齿”。二赵应皆宗子，赵必岵乃宋简王九世孙。

在鼓山碑林之石门处，有再度任福州知州之宗室名宦赵汝愚（字子直），于绍熙二年辛亥（1191）九月，与林择之、姚宏甫同游鼓山之石刻，石文载明“崇宪、崇范、崇度侍”，说明其三个儿子皆陪同游观。赵汝愚亲自题诗并书刻于石门，其句曰：“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表达

他对闽中友人的深情，其诗脍炙人口，朱熹曾摘“天风海涛”四字，镌刻于鼓山劣巔峰上。赵崇宪进士出身，官终广西经略安抚使；赵崇度于嘉定间（1208-1224）曾官提举市舶司，历知邵武军，均在闽中任职。鼓山灵源洞石刻，有宋淳祐四年甲辰（1244）腊月，会稽赵与鏐（齐贤）偕其弟赵与鏐（德载）“重游鼓山灵源洞”的记载。与鏐、与鏐均为宋燕王赵德昭的九世孙，亦为宗子，可能也居福州。

在众多摩崖题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宋代题名涉及宗子的人物名字，如“与”字、“希”字、“彦”字等辈分的宗人。马尾闽安镇村的“龙门”石刻，有宋代闽安镇官赵与滂诗刻，文曰：“凿出想经神禹手，先登岂待苍鹰知。粘天三级桃源浪，平地一声雷震时。骄阳化霖泽环海，青云得路到天池。闽江作砚□椽笔，□□□卢群书此。”落款为“淳祐辛亥（1251）三月□□，四明赵蔗境与滂题于龙门之右”。诗意借龙门开凿想象神禹霖雨泽民之功，祝颂文人科举高中，仕途得意。值得注意的是，诗中首见“闽江”之名，此前直到明清各代，多泛称闽江为“长江”“大江”，此为首见，故亦足珍贵。

南宋状元黄朴（1192-1245），于端平年间（1234-1236）任泉州知州兼市舶提举司提举，与同在泉州做官过的赵宋宗室赵师恕相熟。两家结为秦晋之好。

黄朴的次女黄昇，卒葬新店浮仓山（今福州七中），1975年出土的《宋故黄氏墓铭》，记载其



鼓山碑林之石门处，赵汝愚题刻

生平经历稍详，世人也由此得窥其家庭生活的一些细节。

为黄昇作“墓铭”者乃黄昇之夫赵与骏的祖父赵师恕，亦即黄昇的祖翁。赵师恕（生卒年不详），字季仁，“怀安县八座乡观风里人”，是赵匡胤的第九世孙，理学家黄榦的学生，黄榦曾称赵“宦不达而忘其贫，今不合而志于古”。他历任浙江余杭县令、江西袁州知州、广西经略安抚使，均有政绩，政声颇佳。嘉熙元年（1237）改帅湖南。淳祐初（1241），以朝请大夫、知徽猷阁身份，任南外宗正司知事，主管赵宋宗室之居泉州宗子的属籍等事宜。淳祐三年（1243）辞官归里。

据民国《福建通志》载：“勉斋书院，在鳌峰麓，旧为勉斋先生黄榦宅，门人学士赵师恕即其故居拓为精舍。元至正十九年（1359）建为书院。”黄朴与赵师恕先后都在泉州任官，两人交谊甚深，所以赵师恕在“墓铭”中追怀说：自己与黄朴“旧同学于勉斋先生门，又夙慕（黄昇）乃祖乃父长者贤名，为季孙择妇，宜莫如史君（按指黄朴）女。史君重朋友之谊，一言而许。”

赵师恕深爱他的小孙赵与骏。如他所说，“余季孙赵与骏，少失怙，余抱而鞠之，甚于子焉。”他因与骏少年丧父，自己有丧子之痛，所以移爱于幼孙，故当其成年以后，即为之择偶，而且看中自己同窗老友同样的掌上明珠黄昇。淳祐二年壬寅（1242），黄昇由其父黄朴主持出嫁婚礼，于归赵氏。黄昇进入赵家门后，恪守祖母训



新店浮仓山出土的《宋故黄氏墓铭》

诫与妇人范则，表现出大家闺秀的淑女风范。可惜寿命不永，于次年（1243）逝世，年仅17岁。其夫赵与骏史志无传，无科名，以宗子荫补将仕郎衔。据载，淳祐间曾知连江县，后转任连城县尉，至淳祐九年（1249）也去世，享年27岁，年长黄昇4岁，同样不寿。

墓铭中赵师恕详述自己致仕后归休林下的生活，表达对孙媳夭殇之哀痛。他说：“越明年（1243），余自泉返里。”“以二孙皆授室，宾祭之政，得所相矣。”认为两孙都已娶妻成家，家务有了帮手，故想“便当弃置家事，命伯子撰杖

屨，从长沮、荷蓁辈，结偶于漆桥之间。一卮山酒，曳屣而歌，可以佚余年矣，故喜见于色”。他命长子准备手杖与麻鞋（便鞋），开始与农民为伍的生活，悠游于乡村山水之间。“漆桥”即今福州北郊新店赤桥村。果然，我们也在今北郊森林公园内找到赵师恕与朋友们游乐后留下的一段石刻：“岩溪翁赵师恕，邀清溪郑性之、中山李遇、三溪林元晋同游。时淳祐丁未初秋上浣。”淳祐丁未（1247），其时离赵师恕退休不过4年。赵自称“岩溪翁”，可知他退休后仍住故居岩溪之畔。其所偕友朋乃朱熹弟子、出身状元、曾任宰执的清溪（今闽清）人郑性之，同游时已致仕，76岁；李遇，字用之，长乐三溪乡人，嘉定七年（1214）进士，官御史秘书监；林元晋，字德父，长乐县三溪村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淳祐二年（1242）为庆元知府兼沿海制置使陈垵幕僚。四人皆有功名或宦迹，同游时年龄应当相去不远。据记载，郑性之祖亦长乐人，后迁闽清，其妻潘即长乐三溪村人。赵师恕所邀三老，均长乐三溪人，恐不仅是巧合吧。

赵师恕在郊外常与朋友们一起，放浪形骸，以山酒村醪为饮，称觴买醉，曳杖跋履，啸吟狂歌，其乐融融。他满以为如此佚乐，可以安度余年了。然而喜极生哀，孰料黄昇于归赵家“期月而亡”。赵氏遭意外打击，“岂谓昨日之喜变为今日之伤耶！”所以他动情地写道：“几年方十七，笄而事人，愿与夫共甘苦，同生死。岂谓千里之程，方出门行，未一日而止耶！余非特为尔伤

也，抑伤吾孙薄祐而失此如宾之俦也。”老人的悲伤在于自己暮年的理想落空，入门孙媳期月而殇，为孙媳妇伤亦为己孙伤。他的哀痛之情都落笔在墓铭之中。黄昇卒于淳祐三年（1243）秋七月，葬于十一月，墓在“浮仓山之阴”。

黄昇的随葬品中包括服饰和大量的丝织品，如绫、罗、绸、缎、纱、绢、绮等，不但精美绝伦，而且数量繁多，品位极高，充分表明当时福建（福州）地区高超的丝绸织造技术。以如此丰厚的随葬品为少妇黄昇陪葬，除了表达赵家人的悲痛心情与爱媳情感外，还向人们透露了一些与赵、黄两姓家庭背景相关的信息。赵师恕是皇亲宗族，而且曾任宗正司知事，主管泉州皇族，可谓位高权重。黄昇众多的随葬品中，有两匹丝织料子的两端均有墨书题记，曰“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表明这些随葬丝织品，是作为宗正司知事的赵师恕所拥有的，是否还有作为泉州市舶司提举的黄朴所拥有的，不得而知。赵老出于痛惜孙媳亡故而罄其所有，将任职所得来的珍贵丝织品作为陪葬品，也在情理之中。黄朴身兼泉州市舶司提举，掌管海外贸易大权，对那些可能用于出口的各种高级丝织品，拥有支配权。如果这些数量众多的丝织品又是黄昇生前所拥有或喜爱之物的话，赵黄两家对这位少妇自然会刻意予以满足的。两年后（1245），黄朴也魂归道山，而为其墓志铭篆额者亦为亲家翁赵师恕。

注：本文摩崖题刻引自黄荣春《福州十邑摩崖题刻》，谨此致谢。

郑思肖与谢翱

林思翔

近读《郑思肖集》，其中附有一篇明代文人洪士恭的《合刻郑所南谢皋羽二先生铁函经晞发集跋》。该文在阐述郑思肖（号所南）的铁函经与谢翱（字皋羽，号晞发子）合刻文集的意义时指出：“二先生皆闽产也……敬梓以传，俾夫世之读二先生之文者，廉顽立懦，激高风于无穷；即敦左懋修、山林自好之士，亦将有感于斯文。”

两位南宋福建才子（两人祖籍均为闽东古温麻之地）辞世多年后，将他们的作品合集出版，古人自有其道理（民国时期亦有再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查找了有关史料后，我觉得两人有以下几方面共同之处。

两人生活地域基本相同。郑、谢二人均长期生活在宋末元初的杭州、苏州一带。祖籍连江的郑思肖幼年随父母迁居临安（今杭州），14岁时迁居吴门（今苏州），随后几十年，因时局动荡，7次搬迁，但都在吴门生活。原籍长溪（福安、霞浦旧称）的谢翱，17岁后随父由浦城往临安应试，在临安住了2年。37岁后在浙江生活并讲学，还在临安娶妻，直至47岁因病辞世。由于郑、谢



郑思肖像

二人长期生活在南宋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目睹元兵入侵，了解朝野反应，因此对外族入侵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亡国灾难感受尤深。

两人皆爱国思想浓烈。郑思肖一生作诗画数百篇（幅），可以说篇篇充满爱国情愫，爱得深，恨得切，文笔犀利，入木三分。德祐二年（1276）三月，元军攻下临安，帝昀和全、谢二太后被俘。这年元旦（岁旦），郑思肖在元军占领下的苏州，一方面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形势，一方面又不甘心大好河山之断送，于是满怀郁愤，写下了人们所熟悉的《德祐二年岁旦二

首》：

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
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
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
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
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大势已去，无力回天，徒有报国之志，也只能见人垂泪。仰面问天，天高难问。作者对南宋政权念之切切，对元军占领苏州表示轻蔑，并表达自己忠贞宋朝的坚定态度。全诗写亡国前的痛楚，感情极为深沉，从中可见作者对宋朝眷恋之深。因此，这首诗成了郑思肖爱国诗的代表作之一，被收入《宋诗鉴赏辞典》。特别是“一心中

国梦，万古下泉诗”，被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两会”结束时记者见面会上引用后，更为人们所熟知。

郑思肖“画兰不画土”更是他爱国心志的表达。“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宋亡后，兰画高手郑思肖所画之兰均无土和根，意即土地已沦丧于异族，愤懑之心由此可见一斑，数百年来传为佳话。故郭沫若先生称其为“民族意识浓烈的人”。

谢翱也有许多爱国诗篇。元兵进入杭州后，南宋故居许多建筑成为佛寺，而且多为番僧所居。谢翱托物寄慨，触景兴悲，写下了《过杭州故宫二首》，凭吊杭州故宫遗址，抒发故国情思。

禾黍何人为守阍？落花台殿黯销魂。
朝元阁下归来燕，不见前头鹦鹉言！

紫云楼阁燕流霞，今日凄凉佛子家。



郑思肖《无根墨兰图》

残照下山花雾散，万年枝上挂袈裟。

作者借“禾黍”的典故，暗喻自己对南宋国都沦亡、宫殿荒废的深沉感叹，表达亡国之恨，发出黯然销魂、死别吞声之哭。这首诗沉痛而含蓄，情感浓烈，是南宋遗民诗中的重要篇章，也被收入《宋诗鉴赏辞典》，成为谢翱爱国诗篇代表作之一。从诗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与郑思肖一样浓烈的“民族意识”。

两人均才华横溢，诗文（画）奇绝。郑思肖能诗擅画，会论说文，著作颇丰，文字风格独特，可谓宋元之际文坛杰出人才。著有《心史》《一百二十图诗集》《锦钱余笑》等诗文画400余篇（幅）。长达16000言的《大义略叙》，详细记载了蒙古灭金、灭宋的过程，记录了南宋爱国者的英勇斗争和卖国者的种种丑行，并分析南宋灭亡的原因，还介绍了蒙元历史，成为一篇宋末元初的野史，极有史料价值。鲁迅先生十分喜欢郑思肖诗文，曾书写《锦钱余笑》诗句条幅赠送日本友人。郑思肖之画作特别是兰竹画，更是当年的难得珍品。清“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对郑思肖画作十分赞赏，说“兰竹之妙始于所南翁”，并刻印章“所南翁后”，表达仰慕之情。

谢翱诗文亦丰，著有《晞发集》，明初尚有28卷，如今尚存10卷，收入诗歌217首。其诗古朴苍劲，沉郁悲愤，富于爱国情调。“野风吹空巢，波涛在孤树。”“感此毕宇宙，涕零无所之。”谢翱善于以景托情，抒发亡国之痛，慨叹家国之深愁。清纪昀评价说：“南宋之末，文体卑弱，独



谢翱《晞发集》

谢翱诗桀骜有奇气，而节概亦卓然可观。”

两人皆节操高尚，誓不仕元。郑思肖忠贞爱国，一身正气，宋亡后，他改名思肖，号所南，意即思赵姓故国。他隐于吴下，坐卧必向南。扁其堂曰“本穴世界”，影射“大宋”之义。宋亡后郑思肖又生活了30多年，迈向晚年“甘与草木同朽尽”，过着隐居生活，以此坦露心迹：“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谢翱亦然。他刚成年时，元兵就大举南下，南宋半壁江山即将沦亡。他尽捐家财募集乡兵，投入文天祥部队，署咨事参军，随军转战闽、粤、赣各地。“及文相死，遂彷徨山泽，长往不返，怀贤愤世，遍历名山大川，所至辄长歌恸哭”（万历版《福安县志》语）。入元不仕，过着流亡和隐居生活。浙中才子郁达夫曾在诗文中7次写到谢翱，“国亡何处堪埋骨，痛哭西台吊谢翱。”认为谢翱是集闽中风雅节概之盛，极其仰慕与推崇。

谢翱对英雄文天祥感情尤深，极为崇敬。每逢文天祥就义的日子，总要找处隐秘之处哭祭。

“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这首来自《西台哭所思》的悲痛诗句，表达了他对文天祥的深切怀念。史书上曾有谢翱九哭文天祥记载，读之感人肺腑：“一哭于姑苏夫差之台，再哭于越台；乘舟至鄞，登候潮山，感孔子浮桴之叹，则又哭；过临安故宫则又哭……”谢翱对文天祥的仰慕之情和对亡国的锥心之痛由此可见一斑。

郑思肖对文天祥也景仰有加。如今我们能看到的他怀念文天祥的诗文就有《和文丞相六歌》《文丞相叙》《文丞相赞并序》等篇章。“呜呼一歌兮哀以伤，白日无光天荒荒”，“我所思兮文丞相，英风凛凛照穷壤。”句句泣血，声声由衷，表达了郑思肖对这位英雄至高无上的崇敬！

两人皆有奇事。郑思肖的《心史》一书沉井后300多年重见天日，可谓一大奇事。当年寓居南京的福建籍诗人林古度写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心史序》称：“天下有奇人，始有奇事。宋德祐间，吾闽连江郑所南先生隐于吴门，愤宋亡国，恨己无名位，不能灭胡，每有忿懣辄见诸诗文……不婚不宦，年已垂老，虑身没而心不见知于后世，取其诗文，名曰心史。用蜡封固，而函以锡，锡复函铁，沉于承天寺狼山中房古井中，以待千载后人得见其生平，此其立志，不亦奇欤！果今三百五十六年，一旦为予友君慧上人浚井而得之，其事尤奇……”这部由250多

首诗歌和十多篇文章组成的《铁函心史》，是郑思肖泣血锥心写成的奇文，是他渴望为朝廷出力，誓死恢复大宋江山，完成中兴大业的心路写照。重见天日，朝野轰动。明清两代及近现代官员、学者竞相阅读，序跋、题咏、品评者竟逾百人。国学大师梁启超大为称奇，说：“呜呼，启超读古人诗文辞多矣，未尝有振荡余心若此书之甚者！”并深有感慨地说：“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

谢翱身上亦有奇事。据《福建省志·谢翱传》记载：至元十一年（1284），江南元僧杨珙真伽挖掘宋会稽皇陵，以遗骨修建镇南塔，将所得金银宝器用于修建天衣寺。谢翱协助会稽的山阴人唐珏、温州平阳人林景熙，装成采药者，用他人骸骨暗中换取宋高宗、孝宗遗骨，又以重金请渔人网获被元兵抛到湖中的宋理宗颅骨，并将这些遗骨转至绍兴兰亭山安葬。葬毕，他们移来宋故宫的冬青树种于墓上作为标志。谢翱作《冬青树引》云：“愿君此心无所移，此树终有开花时！”这件奇事，说明谢翱一本初衷，忠心不改。

郑思肖和谢翱的爱国思想，数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他们的诗文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广为传播。早在明万历年间，福安城就建起三贤祠，供奉着谢翱等3位名贤。郑思肖在连江透堡的祖祠及与其父辈有关的古寺、古井等也得到保护，供人们追思先贤。这两位闽籍才子可贵的爱国思想和高尚的节操品行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凤出丹山熠生辉

应嘉仁

古镇丹阳，位于连江县和罗源县的交界处，自古是福州的北大门和北上闽东及浙江的要津。丹阳得名，一说是镇旁一列大山巍然耸立，当山峰浸染阳光时，发出灿灿红光；一说是山上多枫树，晚秋季节，枫红恰似漫天彩霞。

丹阳优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山水景致以及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文人，在这里流连驻足，留下动情的吟唱。

根据有关记载，朱熹曾几次到过连江，与丹

阳渊源犹深。其中一次在宋淳熙十五年（1188）。一年前，58岁的朱熹因为接到好友陈俊卿的噩耗，在门人王迈等的陪同下前往莆田吊唁并为之送葬。陈俊卿为一代名相，对朱熹十分器重，朱熹对此感念于心。由是，朱熹买舟南下，至福州登岸后即匆匆赶赴莆田。朱熹患有足疾，行走不便，好在身边始终有一班门生跟随，一路搀扶。送别故人，朱熹返回，经福州，特地上鼓山看望涌泉寺僧嗣公和尚，并在灵源洞石壁上留下题



连江丹阳镇三落厝

刻，怀念已到四川成都赴任的好友赵汝愚。接着，他又乘舟到古田探望高足林择之。

这时，朝政发生了一些变化，周必大进职为右丞相，他和杨万里等人一再举荐朱熹，于是，朝廷任命朱熹为江西提刑。但朱熹仍对朝政心存顾忌，不想贸然出山，因此，一面以足疾未愈上状请辞，一面继续在各地讲学。同时，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封长达 12000 字的奏折，史称《戊申封事》。这道奏折，是朱熹生平对南宋腐败社会的一次全方位剖析，也是他试图用正心诚意学术对大病沉疴的南宋社会开出一帖济世药方。有说，正是这道奏折，促使年迈的孝宗皇帝下了禅位的决心。

朱熹到连江，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在门人刘砥、刘砺的陪同下他来到连江。先在丹阳镇祠庙讲学，后因兵乱又退往东平宝林禅寺避居。宝林寺又名宝林庵，坐落于东平村，背靠五凤山，始建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大中六年（852）重建，迄今已有 1180 多年的历史。《三

山志》称之为福建四大丛林之一。鼎盛时，殿堂十多座，僧众最多时逾千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皇帝御笔亲题“大中宝林禅寺”匾额。这座寺庙紧邻山林，景色清幽。“山随溪水转，岭向寺门分。”而寺前院场开阔，视野很好。被权力场搅得身心疲惫的朱熹十分喜欢这一份清幽安静。

连江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张莹的墓就在寺院后山之麓。张莹（857-933），字昭文，连江丹阳人。他自小志向高远，曾赋诗：“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时来鳞羽化，平地上云衢。”此诗后被《全唐诗》收入。公元 890 年，张莹只身赴长安应试，一举高中，官至礼部尚书。他为官刚正不阿，遭奸佞陷害，被流放江州。唐亡后，张莹返回故乡丹阳，捐资扩建宝林寺，从此深居简出，潜心学问。张莹博学多才，他的史学著作考订严谨，所作诗赋高雅清丽，时人争相传诵。

朱熹素来钦佩张莹的人品学问，他沿着盘山小径漫步低吟，仿佛与 200 多年前的先贤隔空畅



丹阳镇宝林禅寺

谈，一诉报国衷情。朱熹在这里读书、写作，流连山水，住了一个多月，才动身返回建阳。

宝林寺里现在还留有一句柱联，相传为朱熹所作：“建自唐朝，虎跑雷移肇始皈入法界。”但只有上联，未见下联。寺后崖壁上，朱熹手书的“降虎”“雷移”摩崖石刻至今尚存。寺中还留有他的一首七律诗：“踏破千林黄叶堆，林间台殿郁崔嵬。谷泉喷薄秋逾响，岩翠空濛昼不开。一壑祇今藏胜概，三生畴昔记曾来。解衣正作连宵计，未许仙灵便却回。”

大概是出于对朱熹的热爱，丹阳的乡亲们甚至演绎了一个传奇故事，说是某钦差奉命安葬连江籍刘姓皇妃，率堪輿家四处选择墓地，看中宝林寺风水，要在大雄宝殿中央建坟莹，并插立标记“穴在寺中”，要当地官府限时将大殿拆除。钦差随后返京。朱熹此时恰住在寺院里，他愤然挥笔改为“穴在寺东”，并将标记移插寺院东面，宝林寺得以保全。

根据《连江县志》记载，朱熹最后一次到连江，则是在庆元年间。由于遭受当政的韩侂胄迫害，朱熹的道学被定为“伪学”，要在全国范围内剿灭。各地官员奉命到处搜查理学著作，告发“伪徒”。甚至连肆坊间也受到了严格审查，“二程”、刘子翬、李元纲、潘浩然和朱熹的著作都被劈版烧毁。一大批“伪徒”如叶适、留正、彭龟年等有的被罢职，有的遭流放。而朱熹本人更是被冠以六大罪：一“不孝其亲”，二“不敬于君”，三“不忠于国”，四“玩侮朝廷”，五“诗含

怨望”，六“害于风教”。朝廷以此罢去他的秘阁修撰和提举南京鸿庆宫的官职，取消了俸禄。这就是庆元年间的“籍伪学”事件。

为避祸，朱熹回到福建，先后流寓邵武、建宁、泰宁等地。尽管各地官府秉承朝廷意志对朱熹的学说予以抵制，但朱熹却仍然受到福建学人的普遍爱戴，他们争相邀约朱熹前往自己家乡著书讲学。

这年8月，由于女婿黄幹的母亲去世，朱熹在几位门人的陪伴下前往福州吊唁。之后，他再度来到连江，在鳌江上游小沧七里村养病，并开始了《楚辞集注》的撰写。此间，他几度到贵安、朱步、仁山等地讲学，仁山七里岭路旁留下他题写的“陟岵”二字的摩崖石刻。

感谢连江的好山水，让晚年多病而又饱受磨难的朱熹，有了一处安身之地，有了一道心灵慰藉，同时，也有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仁山七里岭路旁的朱熹“陟岵”摩崖石刻

谢泌的宽与严

——宋代福州知州系列谭

汪征鲁

可以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研究历史人物，层次与角度的转换每每导致研究成果的新颖甚至深刻。当然这也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而定。这里以政治行事方法的宽大与严峻来述评谢泌的仕宦人生。

谢泌（950-1012），字宗源，籍贯歙州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他生于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自许为东晋名臣谢安的二十七世孙，然已不可考。其年少时就好学不倦，有志操。那时，贾黄中为宣州知州，一见称奇。谢泌二十三岁时，登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第，解褐大理评事。又先后外放任清川县（今四川省平武县）、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市）两县县令，迁著作佐郎。端拱（988-989）初，为殿中丞。这一最初任官经历，与马亮相仿佛，当是当时的一种仕途

起步模式。在殿中丞任上，他向政府有关部门呈献所著文二十篇、《古今类要》三十卷，由此参与了中书省的考试，得以本官直史馆，赐给绯色的官服。宋朝置史馆，掌修国史，为三馆之一，多以宰相兼领修史，以史馆修撰官高者一人判馆事。其下有史馆检讨、直史馆等员。

谢泌直史馆后，还建议史馆遵唐代旧制，设经、史、子、集四库，被采纳后，管理集库。旋以左正言出使岭南采访。事罢归，拜左司谏。不久，判三司盐铁勾院。后授谢泌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转金部员外郎，充盐铁副使。顷之，谢泌舅舅魏羽任三司盐铁使，为避亲嫌，改任度支副使。俄知三班、通进银台司。淳化五年（994），出知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咸平元年（998），迁主客郎中，知虢州（今河南省灵

宝市)。咸平二年(999),徙知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咸平四年(1001)十二月,代还,知登闻院。咸平五年(1002),与陈恕同知贡举。复知通进银台司、加刑部。外放为两浙转运使。景德元年(1004)四月,又以刑部郎中自两浙转运使徙知福州,景德三年(1006)末,代还京师,其知福州似仅一年半左右。后转兵部郎中,复知审官院,直昭文馆。复外放,知荆南府(辖境约当今湖北省枝江市以东,潜江市以西,荆门、当阳二市以南地区),徙知襄州(其辖区约今湖北省襄樊、谷城、丹江口、南漳、宜城等市县地)。大中祥符四年(1011)夏四月,迁太常少卿、判吏部铨。谢泌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卒,得年六十三。

谢泌一生行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严于官而宽于民。先论前者。

严于选官考试、考核。

如前所述,在太宗淳化年间(990-994),谢泌在京判三司盐铁勾院时,曾奉诏主持国学考试,由于要求严格,落第者甚众。于是有些学子聚众喧骂,甚至有人怀砖石,以待谢泌路过,行不轨。谢泌知道后,偷偷从别的路避入史馆,几天不敢出来,要求陛见说明。太宗了解情况后,笑谓左右说:“谢泌的职责是选拔人才,岂敢滥收?小人不自量力,反抱怨主考官,当然也必须避防。”又问:“什么官的出行护卫威严,京城的人畏避?”左右奏曰:“只有台省知杂官,众多人员呵护,难以靠近。”当下任命谢泌以虞部员外郎

兼侍御史知杂事,以防掷砖石之患。

淳化三年(992)十月壬寅,太宗鉴于中外官员清浊混淆,不能甄别的状况,命户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谢泌、秘书丞王仲华一同负责京朝官的考课;另吏部侍郎张宏、户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员外郎范正辞一同负责幕职州县官考课,号曰磨勘院。幕职,为地方长官的属吏。又命左赞善大夫魏廷式与枢密都承旨赵镒、李著一同负责考核三班院殿直以上官员的功过。王沔、谢泌负责的京朝官部分,有御史弋子元、郎吏张绅等以考核劣等而被罢黜。

又前述,咸平五年(1002),谢泌与陈恕同知贡举。陈恕(945-1004),字仲言,洪州南昌(今江西南昌市)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历官澧州通判、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户部副使,以右谏议大夫知澧州、河北路营田制置使、河北路盐铁使、参知政事。陈恕知贡举,精选文行之士,黜落极众,省榜才放七十二人。《宋史》赞其为能吏之首。亦见其二人同道。

宋代,官员的选拔、升迁,举荐亦为一途。谢泌号称知人,然少许认可。生平举荐不过数人,后来都官至卿相。每欲发荐书,必焚香朝对宫阙,说:“老臣又为陛下得一人才。”然后再上奏,宰相王文正公旦、知开封府的张逸也是他举荐。还有举荐岭南名儒冯元。一次谢泌主持选拔国子监讲员的考试,见冯元一身儒者打扮,笑着对他说:“吾闻古人治一经至皓首,你能尽善群经?”冯对曰:“通达的人一以贯之可矣。”谢奇

其对，于是选经义中疑难晦涩的问题诘问。冯元的回答，条陈翔实，言简气昂。谢泌抵掌叹服。即日上报，授冯元国子监直讲。由是名震京师，公卿大夫家争着请冯元为家教。于此可见谢泌荐举之精严。

谢泌的最后任官为判吏部铨，即主持吏部选举、考核官吏。其职位重要、清显，居者荣焉。

严于对官员的司法监督、处理。

咸平五年（1002）二月戊辰，京师有后被称为“凶人”的刘晔、僧澄雅控告当时执政大臣与许州民阴谋勾结西夏进行叛乱。执政大臣的姓名于史无载，已不可考。于是，真宗诏开封知府温仲舒，主客郎中、知闻登院谢泌鞫问二人，以右侍禁、阁门祇候谢德权监督。后来，也没审问出什么结果。第二日，在便殿向真宗汇报，温仲舒说这两个人妄想胡说。谢泌则提出：“只有讯问大臣，才能得到法定的口供。”谢德权斥责谢泌：“一定要陷害大臣吗！？若大臣无罪而受辱，则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也进言：“德权所奏是对的。”真宗于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虽然结局如此，但从中不难看出谢泌审案，坚持程序正义，不畏权贵，从严执法。

又一例。咸平四年（1001），王仲华在以太常少卿知苏州任上时，本道转运使任中正在考核后，上报其治状，王仲华随即加右谏议大夫，知杭州。接着，谢泌为转运使，继续考核王仲华，奏劾王仲华在调任之日还冒请苏州所颁发的补贴，属于违法。于是朝廷下诏，课王仲华罚金。

王仲华二度与谢泌共事，且是北宋有名的直臣，但谢泌还是对之严加监督与处罚。

以上可见，谢泌在司法监督与处制上对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严峻与铁面无私。

最重要的严是对皇帝的严。在中国中古社会，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对皇帝的制约或批评只能是谏。谢泌是敢谏之臣。

北宋太宗励精图治，欲闻谏论，以致太平。遂于端拱元年（988）三月甲子，申警下诏曰：“四聪八达，方能了解社会；百职优化，就有利于帝王的事业。而为官之人，沉溺于安乐，将进献善言之责化作拱手沉默，期望达到大治，不亦难乎？两省谏官的职责在于劝诫规谏，任务是献可替否，于是政教的窒塞晦暗、典章的阙漏、国家的蛀虫、人民的疾苦，悉当上言，无所隐瞒；还必须反馈至有关职能部门，实施整改；而有关部门必须雷厉风行，如果仅因循备员，无所事事，则与行尸走肉何异！务必严名职责，申明纪律，强化监察谏举功能，以警惕奸邪。凡是京都之官，都要履行职责，做出应有的贡献，对得起所离的俸禄，以符合朕的期许。”如此言路一开，向政府上封事的人蜂拥而起，良莠不分。太宗皇帝又担心起来，下诏有关部门只有那些不是侥幸谋私利的封事才能接受。当时的殿中丞、直史馆谢泌直言上疏，以为此诏书不可行。其曰：“外患方炽，民政未理，就是狂夫之言，圣人取焉。如果这样苛求而拒之，四聪之明，将有所蔽，愿普纳众言，采其可者行之，不可者止之，庶几下情得

以上达。”这是要太宗皇帝在内忧外患之际，广开言路，不拘一格，甚至从反面的意见中汲取有益的借鉴。至淳化四年（993）闰十月丙午，太宗还重复了四年多前谢泌的话，曰：“朕不欲塞人言，狂夫之言，贤者择之，古之道也。”足见其对谏言感受之深。

当时积习，群臣升殿奏事获皇上批准后，就不经主管部门，马上交付具体部门实施，架空了主管官僚机构，强化了皇权独裁，易生弊端。淳化元年（990）十二月，左正言、直史馆谢泌以为不可，“请自今以后，凡政治事宜送中书省，机要事宜送枢密院，由他们考量后，覆奏而后行。”太宗下诏：“同意谢泌所请。”遂成为定制。中外上书以如之处理。此一建言，最终促进形成中央机构政、兵、财三权分立的局面，约束了皇权与相权，使中央政府更具开明性与灵活性。

谢泌力谏君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淳化二年（991），大旱，百官又上言政治得失。己丑，左司谏、知制造王禹偁上言：“请今后，群官拜见宰相及枢密使，一律须罢朝后在政事堂请见，不得在自己衙门的厅堂延接宾客，用以杜绝私人请托。”太宗下诏批准此建议，又令御史台宣布中外。左正言、直史馆谢泌上言以为不可：“这是怀疑大臣有私心也。《书经》说：‘任贤不二，去邪不疑。’”又说：“今天下至广，万事至繁，陛下以耳目寄于辅臣，如果他们不接近群官，如何尽知外面的情况？若令都堂候见，则群官请见咨事又不定时，那么大臣就要随时准备接见群官于

政事堂，连更衣的时间都没有。古人有言曰：‘疑则勿用，用则勿疑。’如果政在大夫，禄去公室，国势衰弱，强臣擅权，当此之时，可以以大臣不轨为虑。而现在陛下鞭挞宇宙，总揽豪杰，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是今天的写照。奈何疑执政大臣，为衰世之事！古时候，孔光不言皇家温室之树；顾雍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谢安石对客围棋，捷书至而客不觉，大臣当谨密如此，虽妻子亦不与闻，况他人乎！假若杜绝了公堂的请谒之事，难道不会还有私室？封塞了相府请求之门，难道不会还有其他途径？这不是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体以报陛下下之道也。王禹偁识量庸浅，不识大体，妄凭臆想来遮蔽聪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太宗览奏嘉叹，当即命令追还前诏，还将谢泌所上的表送史馆馆藏。显然，这是伸张大臣之权。

淳化二年（991）二月丁未，正在修正殿，颇施彩绘。谢泌以为过于奢华，上疏劝谏。太宗纳谏，命悉去彩绘，涂以赭垩，一种红、白土制成的建筑涂料。随后，因举谏重奖谢泌。

真宗即位之初，谢泌上《乞用宿旧大臣以小人为戒疏》。其中有云：“《易》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侯莫陈利用、陈廷山、郑昌嗣、赵赞之徒，喋喋利口，居心险恶，赖先帝圣聪，随后各处诛剪。然危害已深。这些都是陛下熟知的。自陛下临御已来，尽去此辈。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诗》云：‘靡不有初，鲜克

的终。’希望陛下，行之久而常新。唐明皇早年用姚崇、宋则国家治，晚年用杨国忠则国家乱。亦望陛下深加圣虑。臣闻，工欲善其事，必欲利其器。古者辅圣帝、佐明王，建万世之基，立不拔之业者，必倚老成之人。至于西周成、康王时，刑罚束之高阁，是因为听从了周公、召公之谋。西汉文帝、景帝天下清静，也是用了萧何、曹参的规划。精练国政，斟酌王法，未闻市井之徒，尘中奔走的小吏可当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则乱，用大臣则治，然后小人不敢有非分之想而大贤可以竭尽心力也。”儒家贯讲“君子小人”之论，这里更进一步，讲“小人大臣”之论，而主张“老成谋国”。这在中国古代官本位社会里是更具意义的。在皇权至上，官本位，法治不全的社会里，只有经社会实践检验的清官、循吏，也就是老成之臣，才是促进社会趋于治平的中坚力量。

再论谢泌的宽。

其在外交，特别邻国关系上的宽，主张“屈己以宁天下”。真宗咸平二年（999）夏四月丙子，知虢州的谢泌上疏皇帝曰：“臣窃以为圣心最关心的，欲天下朝夕太平耳。唐朝姚崇献明皇李隆基《启太平凡十事》。雍熙（984-987）末，赵普尝录此书以献。俄赵普复入相。当时天下之人，都以为致太平之策无过于此。不久，赵普生病，加之又北戎骚扰边境，所以因循苟且未能施行。臣以为先帝太宗之所以没有全部施行，是留陛下为之耳。陛下登基以来，不加兵于戎敌，使西北

边境外肃然，加之风调雨顺，民安其土，太平景象还远吗？至于省略不急事情，削减烦琐、草率的政事，抑止奔走、竞争之风，开直言之路，都是致太平的方略，已看到实现其八九矣，又岂输唐开元之治也。议者或谓方今西戎用兵与开元时不同，且开元时戎敌亦盛炽。唐明皇最终还是与之议和。至如汉高祖岂是弱主，及在平城之日，亦与之和。此皆屈己以宁天下，岂能大国不自重而与戎敌竞小忿。愚臣请以近事言之，往岁讨伐交趾，王师一动，南方几乎地动山摇。先皇以为得之无用，弃之实便，于是授之官职，使之成为屏卫中国的藩邦，则至今如鼠伏在那里。石晋朝末季，听信景延广之言，耻与契丹和议，遂至失去天下，此岂是逞强哉！臣本州监军室种者是幽州人，曾说，他们种族吃禽兽，贪利财，此外无他智计。先朝平晋之后，若不举兵相向，但与之财帛，则幽、蓟二州不日归顺矣。察此，乃知这种情况古今相同，汉高祖、唐明皇所用之计，正可控其心也。”疏上后，上颇嘉叹。

显然，这种“屈己以宁天下”的思想深深影响了真宗，也就在同一时间，雄州知州何承矩上报契丹企图寇边，真宗以此问枢密使曹彬，曹对曰：“宋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与契丹经营和好。陛下初登基时，承矩尝发书道此意，臣料北方边境终成和好。”真宗曰：“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处理上须执纲纪，存大体，即为久远之利也。”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圣宗和辽太后

率二十余万大军南侵，真宗亦亲征至澶州，战事一度胶着，但后期在宋军获得优势的情况下，真宗实践了“屈己以宁天下”的思想，签订了“澶渊之盟”。“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但又有积极意义的条约。其不平等处，主要在于宋朝每岁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其积极意义在于，在双方都不具备吞并对方的相对均势下，避免了周期性的战争。澶渊之盟后双方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保持了近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共处的局面。其实，在当时宋与北方邻邦的关系上，“和”“战”是必不可少的交替使用的方法。谢泌的“屈己以宁天下的思想”丰富了“和”的理论和价值，但其过于强调“和”亦有消极的意义。

对民宽。这在谢泌为福州知州时表现尤其突出。景德元年（1004）四月，谢泌以刑部郎中，自两浙转运使移知福州，至景德三年（1006）十一月，代还，转兵部郎中，复知审官院、直昭文阁。其在福州知州任上两年七个月。在知州任上的具体事迹史志上记载寥寥，似仅有三件：一为当时，郡城澳桥重要部分的木梁容易腐朽，谢泌筹划用石梁取代，当地百姓陈佑等衔命奔走此事。谢泌去任后，民不忘其愿，历经三年，最终把石桥修成。二为福州下辖的侯官县桂枝乡延福里，有乡贤刘若虚者，咸平间登进士第，授大理评事，知永嘉县。后归乡，父母均无恙，郡守谢泌改里名为荣亲里。三为侯官县有南报恩寺，唐大中十一年（857），在隙游亭之地创寺并建塔七

级。乾符五年（878），寺、塔为黄巢起义军所焚。其后，王审知父子又相继创建，凡七塔。谢泌诗云：“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

之后的一些情况说明其深得民心。当谢泌代还赴京，福州民怀其爱，刻石以记去思。大中祥符五年（1012），谢泌卒，消息传到福州，民相率缟素，说：“谢侯，吾民天地也，不擅权，不仗势。兄弟争者，他喻之；凶顽者，责之，诉讼几乎平息。”当时，继任的知州严辟疆，治理尚严，听到谢泌的事迹，行政亦为之宽。再后的知州元积中，为纪念谢泌，书“去思”易桥梁名。州民为谢泌立祠，陈烈为记。

北宋仁宗天圣（1023-1031）中，郑载知福州，号称贤良。先是，知州谢泌、王臻、章频皆贤，民为之歌曰：“前有谢王，后有郑章。”以上均可见谢泌宽以待民的特点。

谢泌的严于官而宽于民，看似二致，实为一途，那就是以民为本。宽于民是为民，严于官也是为民，他在吏治中实践了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

当然，谢泌还笃信道教。在其故乡的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其年轻时与术士交往的记载，虽每不经，但亦可看出道教对其人生的浸染。后好此不辍，一生深慕玄虚，朴素恬简。病危之际，盥沐，衣道士羽服，端坐而逝，头不少倾。道教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倡导“清静无为”。这在谢泌“屈己以宁天下”的思想、“不擅权、不仗势”的吏治中是有迹可寻的。

福州茶港话兴衰

丰 日

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在亚洲生活近20年，深谙东方文化。他撰写的《中国志》中提到：“比较体面的人接待客人时，会奉上家里最好的瓷器，斟上一种叫作茶的中国饮品，这种饮品味道略苦，颜色暗红，能够治病。”颜色暗红，这里说的是红茶。

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便酷爱中国茶。1662年，她与查理二世结婚，将饮茶习惯带到英国皇室，成为社交时尚。起初，从中国几经辗转、漂洋过海来的茶叶因价格高昂，只在贵族间流行。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建立贸易站，直接进口茶叶，进口量骤增，价格断崖式下跌，茶叶才由贵族走向普通民众。“夏日里，经常在里奇蒙的某个胡同看到乞丐端着杯子在喝茶，修路工人在喝茶，赶灰渣车的车夫在喝茶，还可以看到晒干草的工人在买茶。”茶像水

一样，已然成为英国人的日常需求。

据悉，当时英国每天大约要喝掉1.65亿杯茶，茶叶进口占到东印度公司贸易总额的60%，茶税占政府收入的10%左右。而中国仍处在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状态，进口英国的商品寥寥无几，购买茶叶只认白银。白银作为硬通货，升值



1868年《伦敦时报》刊登的版画《来自中国的茶船在海上》

大、储量少，英方不愿出手。一边倒的贸易逆差，让他们焦灼难安，开始四处寻求可以取代白银置换茶叶的物品。鸦片，让他们看到了曙光。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享有特权，就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印度农民用小刀划破漫山遍野的罌粟蒴果，搜集白色乳汁，再晒成黑褐色成品。成本低廉，流程简易，鸦片源源不断。1828年，英方通过各种渠道输入中国的鸦片便超过进口茶叶价值，扭转了贸易逆差。到1830年，鸦片贸易更是成倍增长，高达1500吨。鸦片席卷中国，民不聊生，国脉根基受到毒品啃噬，几近坍塌。“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生死存亡之际，清政府频颁禁烟令，改革弊政。1838年，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重灾区广东清剿鸦片。林则徐立誓：“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

抵达广东后，林则徐勒令外国烟贩交出所有鸦片，在虎门集中烧毁，共销毁鸦片2376000多斤，史称“虎门销烟”。并责令外商“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禁烟运动彻底激怒英国，英国以保护贸易自由为借口，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双方实力悬殊，清政府战败，被迫签署《中英南京条约》，“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其中，福州因邻近武夷山茶区，水脉相通，被英方视为茶叶贸易的重要港口，备受期待。“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



茶。”“以洋货易红茶似乎是在这个港口建立永久性的英国贸易的唯一可靠基础。”

一切因茶叶而起，兜兜转转，最终又回归到原初。

1844年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福州茶港的停滞期

虽然《中英南京条约》在1842年签订，但一直到1844年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委派李太国为福州第一任领事来福州主持通商事宜，福州才正式开埠。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1844年至19世纪50年代初期，开埠近10年，福州茶港贸易却异常惨淡。其间，广州茶叶出口量占全国比重一直维持在50%-90%之间，高时达到76393000磅，而福州茶叶出口量基本为零。零星的外国商船“停泊月余，民间并无前向贸易之人”，“临去之时，有此后断不再来之语”。某些外国商行与当地民众频发互斗殴伤，订购的茶叶运不出去，亏损严重，只能倒闭回国。

英国对福州港失去信心，驻福州领事降低至副领事一级，并把仅剩的一名助理也辞退了。英国领事若逊说道：“这个港口进行的贸易目前还看不到任何有希望的前途……和福州建立直接商业关系的企图，从头到尾是极不幸运和极使人灰心的。”

其实，英国要求开放福州港口时，清政府便极为反对。福州战略地位重要，开放后华夷杂处，恐动摇掌控和统治。道光皇帝曾谕令耆英

“其前请之通商贸易五处，除福州地方万不可予，或另以他处相易处”。但是，英方绝不退让。中央和地方政府虽勉为其难让福州通商，但对福州港的对外贸易依然千方百计加以钳制。

1845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奏请：“在茶商应行经由及可以绕越各处，节节设卡稽查，使内地贩茶之人先多阻碍，则人情不以为便，必仍贩往粤东等省行销，不复来福……向省城内外之巨商大贾密加晓谕，以夷人在省会通商，非有益于地方之事，总宜令其废然而返，方为长策。劝令各该商等勿得即与互市，俾免该夷在此勾留……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殊为万幸。”清廷表面仍做足功夫，恪守条约，却多设关卡阻碍内地茶贩来福州，并暗中禁止省城内外巨商大贾与英商互市贸易，鼓动民众对侵略者进行抵制和攻击。英方有苦难言，也只能认栽。

虽然福州港地理位置优越，但港内却险滩、暗礁众多，航道凶险。英国曾派海军中将巴围览率船队测量中国沿海各港口，大船在闽江口触礁，船只受损严重。开放的五个港口中，福州港水道条件最差，且海盗肆虐。权衡利弊后，外商多转向更为安全的广州、上海等处。

此外，受茶叶生长周期影响，武夷茶贸易多实行预购。开埠之初，外商无法短时满足庞大货源的需求，折损了对后期贸易的期待；同时，以前销往广州的茶路，利益链条盘根错节，无法轻易割断等，也是福州茶港发挥不了作用的原因。



英国领事馆旧址



五口通商时期的福州港口

福州茶港名存实亡，如果没有后来的转机，也许会淹没在历史尘烟里，被彻底地遗忘。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至 80 年代后期，福州茶港的兴盛期

19 世纪 50 年代初，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却阴差阳错地为福州茶港带来转机。

1851 年，由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 年，起义军发展到华南、华中大片地区，切断武夷红茶输往广州的旧通道。“广省土匪围绕，盗贼蜂起，华夷各商，难以贸易。”同时，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小刀会起义在上海轰轰烈烈地爆发，掐断武夷红茶运往上海的新通道。广州和上海的新旧茶路断裂，茶货壅积、滞销，迫使外商再一次把目光转向福州

港。董书城在《中国商品经济史》中写道：“直到 1853 年，由于战争阻隔，洋商不易在上海和广东买到茶叶，美商旗昌洋行乃派遣中国代理人携款前往武夷茶区收购茶叶，经闽江下福州。他们的尝试获得成功。此后，其他洋行也照样仿形，福州于是也逐渐成为我国茶叶输出的重要口岸。”

外商进口的茶叶，红茶一直占重头戏，是至要之货。红茶的主要来源是福建武夷山区。福州距离武夷山仅 150 公里。如茶叶直接由武夷山星村镇装运，顺闽江而下，仅用 4 天便可运抵福州。“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这也是当初英国迫切开辟福州港的初衷。地理优势的得天独厚，无可取代，是福州茶港崛起的最大资本。

福州港长期的贸易停滞，也让福建财政濒临溃塌，闽浙总督王懿德只得奏请朝廷暂弛海禁，允准武夷茶叶由福州港贩运出口。清政府为了安定局势，“茶贩不前，深恐借茶糊口之人，失业生事，奏准暂弛海禁……”“海禁既开，茶业日盛，洋商采买，聚集福州。”官方钳制变为公开鼓励，与外商意愿不谋而合，局势逆变。

航运技术随着时代发展，福州港水路安全问题也迎刃而解。“英国海军部详细探测河道后，把引港系统建立起来，设置浮标和航标灯在江上做记号”，大大减少闽江航运所面临的危险，为福州茶港的兴盛扫清了航道障碍。

1856 年，英法俄美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扩大在华侵略利益。特

别是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条约，允许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南、琼州七口通商。福州茶港被迫进一步开放。

福州茶叶贸易兴盛与开放导致洋人大量涌入。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官兵、水手、冒险家等各类人等，在福州经常举办宗教仪式、聚会、音乐会、舞会等社交活动，茶是他们用来交往、调剂、娱乐的必需品。除了自我消费或带回本土，有些人眼红于茶市高额利润的诱惑，转身成了茶商，从中分一杯羹。如火如荼的茶市贸易，又填了一把柴。

1856年，福州茶叶出口量增至1800多万公斤，外贸船只增至近150艘。到了1864年，茶叶出口量又升至2700万公斤左右。1865年，卢公明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里记述：“当时从福州出口的茶叶，比广州和上海两地的总和，还要多上一百万磅。”短短几年时间，福州港红茶出口总

量便超过广州和上海，居全国首位。《东亚各港口岸志》指出，福州“为南洋之第一要冲”，是“中国东南之财源”。

据统计，1871-1873年，福州港出口的茶叶价值占全国茶叶的35%-44%。1880年，更是达到顶峰，茶叶出口量高达4000万公斤。福州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茶叶港口”。

福州茶叶市场扩大到英国、美国、新西兰、俄国，欧洲各国甚至非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福州设立商业机构。各国茶船在闽江竞渡，抢购新茶，场面激烈、壮观。一位茶船船长曾感叹：“闽江上如此美丽壮观的船队集合，在全世界其他任何港口实在不能看到。”

19世纪80年代后期，福州茶港的衰落期

福州茶港的繁盛如抛物线般到达顶峰，但内外隐含的危机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注定无法长久。19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快速膨胀的势头，逐步萎缩，进入衰落期。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方面。

茶叶制作在高额利润诱惑下，掺假、粗制滥造成为常态，品质和口感严重下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茶经过多年改良，种植、生产制作器械工业化，并有专业技师监督，品质和数量有根本保障，逐渐进入并占据国际市场。《万国公报》记载：“印度自得中国植茶之法，垦荒种植，日益繁滋，又延请茶师讲求制造，年中贩运西国



19世纪末的福州茶评室

获利无涯，其夺中国之利。”福州出口的茶叶味淡质差，英国人转而嗜好新鲜味浓的印度茶，福州茶甚至冒充印度茶才能卖上好价钱。“福州茶日益丧失其市场——英国及其殖民地”。后来，日本茶、锡兰茶也逐步崛起，进一步打破茶叶的垄断地位。

福州茶叶贸易没有形成自主产业，大多依赖洋商购置、运输出口。洋商抓住这一漏洞实行投机交易，故意宣扬高价收购，待大量茶船纷纷集结，又临时杀价。茶商考虑折返亏损，也只能任洋商摆布，价格被压得很低。“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适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大半减价出售，商情艰窘”。茶商、茶农无法盈利，纷纷改谋他业营生。“山头种茶者因见茶市日坏，无利可获，遂将茶树焚去，改种山芋”。

茶叶税卡密集、厘税重、流通环节多，也双

向减弱人的购买欲和种植欲。武夷山茶依然采用预购制，采购的数量与实际种植交货的数量时有出入，这个问题也一直未予解决。

再加上外有印度茶、日本茶、锡兰茶的竞争，内有茶叶生产经营、销售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其他通商港口的分流，福州港的茶叶贸易在近代国际市场，由此逐渐处于被动地位，交易额滑坡式下降。

1888年，闽海关贸易报告称“市场对福州茶的需求，每年减少10万担即1000万磅以上”。1898年，茶叶售价惨跌至原来的30%左右。1919-1921年，茶叶出口只占国内出口总量的2.5%。“开茶庄及采茶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

外商见无利可图，纷纷从福州撤资，7家银行只剩下2家。昔日繁荣的货运码头，泥沙淤塞，一片萧条。闽江泛着清冷波光，潮起潮落声似也在感叹人间兴衰、枯荣无常。



克洛岱尔笔下的福州

黄 伟

福州市仓山区前外国驻榕领事馆建筑群曾吸引好几批比利时、法国学者和友人来此进行“沿着保尔·克洛岱尔的足迹”的探访。

有法国寻迹者指引法国驻福州领事馆旧址：“从市中心出发，穿过一座以巨大拱形金属钢管点缀造型的、辨识度很高的现代化桥梁，此时闽江就在你的脚下流淌。来到桥端往右百来米，靠左侧顺着一条直达丘陵顶端的小路蜿蜒而上，在丘陵上方、小路尽头就是领事馆的主路。然后，继续沿着这条主路一家一家寻觅而去，你会找到一座面向街区的房子，这就是当年的法国领事馆

旧址。若要进一步证实，你可以进去观察一番，正门后面就是长廊。”

游人循着这个“引路指南”的导引，就能看到有一个挂有“法国领事保罗·克洛岱尔旧居”指示牌的老旧门洞。该寻迹者特别提到一个关键词：“长廊。”这个长廊对本文故事的主人公具有“窗口”的内涵。而常在长廊上极目远眺闽江的主人公正是晚清时期曾经担任法国驻福州领事7年之久的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 1868-1955）。《福州船政志》记载，这位法国领事的汉名为“高乐待”。今天的中外学者更乐于解读此汉名的题中之义：克洛岱尔“乐于待在”东方古老的中国，“乐于待在”他的“第二故乡”福州的“家”。

故事得从1896年说起。这一年的3月15日，星期天，下午2点30分，一艘从上海驶往福州的轮船于闽江码头靠岸，从船上走下一名相貌敦厚、身着西装的法国年轻外交官。这就是当



法国驻福州领事馆旧址

年名不见经传的克洛岱尔。此番福州之行，法国官方给予他的委任是“代理领事”，临时替代回法国休假的副领事方栋（Frandon）。实际上他肩负法国公使施阿兰（Auguste Gérard）交付的一个重要使命：参与法国与中国政府合作重建福州船政的谈判。这对于年轻的克洛岱尔来说尤为重要。这是他来华任职数月以来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也是展示其外交才干的大好时机。这一使命的成败关系到他今后的仕途晋升，他喜不自胜，跃跃欲试。这时候，谁都想不到福州在他今后的职业发展和文学创作中将占据重要位置。

这次谈判意义重大。中国希冀延续福州船政创始人左宗棠和法国人日意格的中法合作事业，两国再次联手，重振福州船政这项晚清洋务运动最早的著名成果。法国意图从中国手中重新得到管理并控制福州船政的特权，扩大法国政治影响，获得其在远东更大的经济利益。接下来的几天，与副领事方栋进行简单交接之后，克洛岱尔马不停蹄，在此后几个月内他频繁造访位于马尾的福州船政局和位于福州城内的各朝廷要员办公地点，与时任兼管船政大臣裕禄、闽浙总督边宝泉、船政各级行政官员、道台等密切接触，多方协商，随时以电报或领事报告的形式向法国驻华



福州船政局全景

公使施阿兰汇报合作进展。1896年9月10日，中法合作重建福州船政的谈判正式开始。至10月7日，近一个月内，中法双方在福州马尾进行了三次重要会谈。最终，兼管船政大臣裕禄、克洛岱尔、法国特命全权代表卜玳于10月11日分别代表中法两国政府签署了福州船政第二次合作协议。克洛岱尔为谈判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福州和北京之间架起了一座中法沟通的桥梁。

第一次福州之行，克洛岱尔在此待了9个月。这9个月对克洛岱尔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职业层面。他于谈判间隙游览了福州及其周边的名胜古迹。至副领事方栋回国休假归来，克洛岱尔于12月20日启程返回上海。随后几天，在他的《中国日志》上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搬家”“流泪”“在海上”“暴风雨”“途径群山”“寒冷刺骨的冬天”。这些字眼如实反映了这位旅居异乡的年轻人的心

境：他喜欢这个心中视为“家”的城市，留恋其风光秀丽的山川河流，离开福州时十分不舍。在这期间，自1898年9月24日至11月12日，他曾第二次到福州调查处理马尾船厂的争端。此时，正式任职福州领事的序幕正朝着他所期盼的目标徐徐拉开。

马可·波罗于13世纪末游历中国各地时曾途经福州，赞叹这是“一个具备了所有优点的美妙奇特的城市”。法国人对福建有“中华帝国自然资源保护最好的、最美丽的省份”的描述。而对于克洛岱尔来说，对福州如此眷恋的原因，除了这座城市对他具有外交生涯的里程碑意义之外，还必须追溯到他来华前在法国的成长经历。

克洛岱尔出生于法国埃纳省（Aisne）一个偏远乡村，那里地势起伏，森林密布，耕地广袤，草场肥沃，他在乡野自由自在地度过了少年时代。直到1881年来到巴黎，进入路易勒格朗中学就读，他才从一个“外省人”变成“巴黎人”，从“乡巴佬”变成“城里人”。他的穿戴和言谈受到那些活跃于巴黎沙龙的贵族子弟的嘲笑。尽管此后直至被派往国外任外交官，一直在巴黎这个时尚之都居住，但出身于法国外省乡村的他却对故土有着挥之不去的眷恋，他厌恶巴黎的虚荣喧哗，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1895年7月，法国外交部以“候补领事”职务调任他到上海领事馆。但他却对纸醉金迷的上海社交界的繁文缛节不胜其烦，工作并不顺心愉快。正因如此，克洛岱尔对福州一见钟情，相见

恨晚。1898年10月31日，历经周折，他终于等到了翘首以盼的法国外交部委任书，如愿以偿开始了一心向往的福州“田园生活”。他越是在此居住，越是喜爱这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多年后他对自己的女儿说，福州是他的“第二故乡”。

1899年1月21日，克洛岱尔乘船经福州船政局所在地马尾前往位于福州烟台山上的法国领事馆。他在山下的码头下船，顺着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条“直达丘陵顶端的小路蜿蜒而上”，来到法国领事馆官邸。从今往后，他就是这个居高临下望得见远山和闽江的大宅邸的主人了。克洛岱尔这样记载他的内心感受：

乘坐蓝色小船回到福州。凄迷孤寂的冬日景色，大自然好似身着灰黄色丧服的寡妇，零星点缀着些微绿色。我在家里吃午饭。

尽管冬日景色“凄迷孤寂”，我们却可以从“回到福州”“在家里”窥见他对福州“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此前作为外交官的克洛岱尔到过纽约、波士顿、上海、汉口，他一直感觉自己只是短暂过客，从未像今天这样把一个城市认定为自己的“家”。从此他停止了漂泊，有了一所可以自由支配的宽敞房屋、齐全的物质生活设施、一名勤勉贴心的中国文书、几个忠厚老实的当地佣人、一份不菲的薪酬。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通过几年来不懈的努力终于为自己赢得了一方自由的土地、一个宁静的家园，可以在领事工作之余，从事喜爱的文学创作。



福州乐群路 23 号，法国领事馆官邸旧址

最早的法国驻福州领事馆建于 1861 年，克洛岱尔到任时它还只是副领事级，直至 1899 年 7 月 6 日才得到正式批准升格为领事馆，到他上任时领事人选已经有过 16 次更替。从建馆之初直到 1912 年 12 月最终从福州撤销，法国领事馆始终设在这里。

克洛岱尔在福州领事馆的工作很有规律。他隔三岔五地往返于烟台山和马尾两处。每当需要前往福州船政时，他便起个大早，沿着蜿蜒下山

的小径来到闽江岸边，乘船前往马尾。当结束一天或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他蛰居在领事馆内，或撰写领事报告，或埋头读书写作，笔耕不辍。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充满好奇和探究的热情。

法国领事馆建在烟台山上幽静隐蔽的丘陵一侧。作为福州居民埋葬死者的风水宝地，山上蔓草遍地，坟冢密布，夜间鬼火粼粼。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说：“我自己就与一座坟墓毗邻而居，这些死者从未打搅过我的睡眠。”他经常独自伫立在领事馆的长廊上眺望行驶在闽江上的过往船只，观察着榕树庇荫下两岸居民的生活起居：

城区就在下面，在宽广的、浑黄的闽江对岸。闽江，那深沉的急湍，就在万寿桥的桥墩之间，汹涌地流过。

一簇簇凌乱的木排和尾间藻饰得宛如绘画的帆船，顺流淌去。

他不懂中文，却把“谛听”当地居民的“嘈杂声”当作乐趣：

这里每至傍晚在各种叫卖的市声寂静下来之后，唯一可以听见的嘈杂声就是人们说话的声音。我谛听的就是这个，因为一个人，当他不再去探求别人对他所说的话的意义的时候，就能更加精细地听见这种语言了。这里居住着近百万人：我在一片嘈嘈切切中谛听着人们谈话……这时正是晚间，人们正在互相谈说着一天里的种种新闻。每个人好像都以为就他一个人在说话：谈到打架、食物、家庭琐事、职业、商业、政治等

等趣闻……我这个死者的客人，久久地谛听着远方那片嘈杂声，发自生命的喧哗。

对克洛岱尔而言，在福州的独处是其人生的美好体验，虽然他间或感到寂寞，但他的精神是充实的，独处为他的心灵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他在访谈中谈到福州生活时说：“外交邮件每一周或每两周才来一次，这给了我极大的自由。我用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出游。大家可以从《认识东方》中看到我对大自然的许多思考。”远离了大都市的喧嚣，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他得以从繁杂的琐事中抽身。现在，他不出门就可以面对苍茫的群山和浩瀚的江河，可以“谛听”市井百姓的生活絮语，可以面壁而思，可以自由写作，可以与自己的心灵、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对话。



鼓岭风光

在福州的7年间，克洛岱尔足迹遍布城内外各个角落。他去广东会馆欣赏中国戏剧，往跑马场观看赛马，进城游览乌塔和白塔，到孔庙拜谒孔夫子。多次远足至永泰方广岩，对那里的悬空寺很感兴趣。有时他一连好几天乘坐船屋在闽江及其支流游览。他游鼓山，登鼓岭，每年夏季到鼓岭欧洲人避暑山庄度夏。在此期间只有当邮船送信的日子到来或有急事要事、必须与中国政府官员见面的时候才下山。

在福州任领事时期，他于工作之余着手当年风靡法国的散文诗集《认识东方》的写作。诗集一共有61篇，其中33篇描写的是福州的自然风物，倾诉着他对福州人情世故的思考。福州及其周边的山川河流、陵墓宝塔、戏剧舞台、园林寺庙、节庆民风，中国百姓众生相，无一不唤起他的

创作激情，他的观察细致入微，思考别有见地，描写生动细腻，一幅幅生活场景、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真实可感。

他描写福州乡野的农耕生活：

夕阳西下，映照平静
的劳作的一天。男人、妇女和
孩子们还在干活……这边在割
稻，那边拾穗……人们面对面
拿起一把把稻穗在槽斗内壁上
摔打脱谷；铁犁已经开始在翻
耕地里的泥土了。这里飘扬着

一片谷粒的气味，庄稼的芳香。

他为朴实的福州农民画像：

有个男子从我身边走过，手里抓着一只火红火红的母鸡，另一只手扶在扁担上，扁担前面挂着一把偌大的锡壶，后面是一扎绿莹莹葱姜之类的东西，一块肉和一沓准备烧给亡灵的银色纸箔镲儿，下面草把子上还挂着一条鱼。这人青布衣裳，紫色短裤，在刚刚收割过的金黄色稻茬儿上十分耀眼。

他描绘福州的金秋：

时令披着一身金色衣裳来临了……在长满青草的两岸之间，平原像一片望不到边的火焰，纯粹是这个季节的颜色……水变成了酒，柑橘在寂静的枝头闪光，一切都成熟了，谷子和干草，还有那带着绿叶的果实，全是金色……

他发表对中国文化的感想：

在中国，人们把死看得与生同样重要……人们往往在山腰那结实而从未开垦过的土地上为死者挖掘坟墓，而活着的人呢，反倒大群大群地给挤在涧谷下面，生活在低凹多沼泽的平原，而墓冢总是处在宽敞的地方，向阳佳境，极为开朗。

除了对景物的描写外，人们还会看到一些人物侧影，麻风病人、僧人、“乞丐王”、拂晓前福州街道旁熟睡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他在中国特别是在福州的生活经历，源于他对市井百姓日常活动的关注。

从1896年3月15日首次在福州登岸至1906年福州任职期满调往天津，他在福州驻留的时间前后一共7年。1927年6月，在离开福州18年后，克洛岱尔仍然满怀深情地写道：

啊，让我最后一次跟我身后这充满欢乐和苦难的国度再见一面吧！让我再看一眼福州，再作一次回顾和怀旧的访问吧！我觉得有一大堆事物在招呼我，而过去我多曾忽略！让我再看一看遗忘了的伟大眼泪的源泉吧！很晚了，天已断黑，但我知道我一定会找到我的家园。

在离开中国近40年之后的1948年，克洛岱尔在题为“赞美中国人”的回忆录中对自己发问：“我内心深怀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甚至于偏爱，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为何他们“总是在我的记忆深处徜徉”？他深情地讲述在心灵归隐之地——福州的生活，怀念起他的中国“兄弟”。他对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内心的对生命、对生活的“那份热忱，那份迷恋，那份内敛却永不消退的热情，那份虔诚，那样一种永不满足的欲望”深怀敬佩。“他们对生活怀抱着多么巨大的热忱啊。啊，我的兄弟们！”与他同时代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欧洲人不同，克洛岱尔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能够捕捉到他们因偏见和麻木而看不见的东西；他有一颗总是能从生活中汲取生命激情和能量的心。他在福州“家”里找到了他的中国“兄弟”，发自内心地赞赏他们的品性德行，与他们达成了默契与共鸣。

白马桥忆旧

方炎炎

我家住在义洲北兴境，与白马桥近在咫尺。

当年，白马桥是白马河上极为重要的交通要道，是义洲及毗邻的乡村通往城区的必由之路。在我的印象中，白马桥长有上百米长，桥面和栏杆由青石板筑成，桥的东西两头都是喧闹的集市。20 世纪 50 年代末，桥东一场大火把房屋烧成灰

烬，从此桥东的理发店、白铁店、锡铂店离开了白马桥，在废墟建起街心公园，并成为白马小学扩建、教工礼堂建设的场地。桥的西头，就是人们泛称的白马桥，虽历经时代变迁，繁华依旧。据老一辈人讲，白马桥上原有马口铁的桥盖，类似廊桥，让行人遮风、避雨、防晒。在一次台风

中桥盖被吹翻，从此变成裸桥。记得白马桥的桥墩上建有一座字纸炉，用来焚烧有字的废纸。过去人们对文字怀有敬畏感，留有文字的废纸不能随意丢弃，更不能当作手纸。因为这是涉及对孔圣人态度的大是大非问题，所以必须集中于字纸炉焚化。字纸炉像座小高炉，上部是直筒烟囱，炉膛黝黑。当然，能在白马桥字纸炉焚



白马桥

烧的，在义洲地区已是凤毛麟角。

白马桥一带的河边及滩涂是排坞，即木材的集散地，从闽江上游漂流而下的原木，多数顺着白马河潮水到达白马桥排坞。木材商和山主的木材在这里交割出售，福州的木材商人再把木材出售到福州以及长乐、连江、福清、莆田等地，最远的出售到厦漳泉地区。义洲因木材而繁华，所以，义洲“吃柴饭”的人特别多。尤其是“扛搭钩”的工人非常辛苦，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日当头，总是身穿蓑衣头戴竹笠，手持一种既能钩原木，又能撑木排的长柄工具“搭钩”，在白马河上给木排拆、编、起、放。我家房东一家三代扛搭钩，秋冬季节，双脚裂成一道道血口，晚上抹上凡士林，第二天照旧上木排劳作。20世纪五六十

年代，白马河水质清澈，鱼虾成群，是钓鱼、游泳的好地方。当然，也因此发生了几起儿童因潜水钻入木排底下不幸溺亡的事故。

白马河是福州市区水上交通要道。涨潮时，一艘艘木帆船从白马桥下鱼贯而入驶进市区，这些船以粪船为主，是闽侯、长乐一带农民进城买粪的主要运输工具。其次是运输薪炭柴草、砖瓦灰泥、海鲜、河鲜等的船。过去，城里的粪便是抢手货，“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后来化肥工业发展起来了，人粪尿没人要了，白马河的这一运输功能渐渐消失了。

白马桥是个综合市场，桥头南侧第一家是个小杂货铺，过去称为苏纺店，卖些针头线脑、涂头油、美人柴（美人柴类似于一种刨花，浸

在水里，使水变黏稠，用来抹头发，让头发更服帖。我奶奶曾用过，所以印象深）。再往前是回元药店，是义洲地区唯一的药店，店内设有老药工坐堂问诊。在这里问诊抓药既便宜又方便。店外排列着卖鱼、肉、菜的摊位。每天早上，挑肥拣瘦，讨价还价，问候招呼之声此起彼伏。摊位后侧是义洲地区唯一的阅报栏，每天中午以后《福建日报》四版在此张贴，是义洲人民了解国内外新闻的信息站。但阅报栏对广



白马河

大民众来说作用有限，因为五六十年代老百姓文盲占 80% 以上。对我们就读的孩童来说，当时最关心报上两件事。一是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军舰侵犯我领空领海，提出第几次严重警告；二是报尾刊登各影院电影动态，特别是假期学生场电影消息，因为学生场电影每张票只卖 5 分钱。阅报栏对面是家大开间的酱园店，有盐醋糟酱、豉油虾油、咸菜笋丝、菜脯酱月。买酱菜时店里常用笋壳来盛，笋壳就是从新笋上剥下的外壳，这东西比现在的塑料袋环保卫生多了。

再往里走，是北兴粮店，那年月粮店是维系百姓生存之所在。除了定量供应粮油外，有时还搭配供应面粉、番薯。“文革”前，曾有一段时间福州居民定量的粮食中面粉占比 40%，从此，福州人学会了吃面食。番薯含水量大，一斤定量可换购 7 斤番薯，或 1 斤 3 两番薯米。有时也供应馒头、粉干、白粿、面条。最不合算的是买粉干，一斤定量只能买 9 两或 8 两半。本来粮食定量就少，再短斤少两，因而，非不得已极少买粉干。再往里走是条白马河的小河岔，有座叫“新桥仔”的便桥连接两岸。桥头有一家小杂货店，出售的多是小孩的玩具，如三角形纸袋装的爆米花，内配一只造型小铁片；有黏土烧制的水鸟，灌上水，吹起来像水鸟的叫唤；有竹蜻蜓，只要用力拉绳子，竹蜻蜓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而上；有三色六瓣薄纸糊的纸球，干瘪时像西瓜帽，吹上气，就成圆圆的纸球，小孩手朝上拍着玩，瘪了，再吹口气，球又鼓起来，那时真皮球难以见

着，能买只纸球玩上一两天算是很惬意的事了。

过了新桥仔，左边是新泰福酱园店，卖的酱菜质优价贵，生意一般。右边就是“索面埕”，即台江粮食复制品厂晒制线面的场地。场地上摆满线面木架子，拉面工把缠着面筋的竹竿一头插在架子上，另一头用两手十指使劲地抻拉面筋，直至把面筋抻到缝衣线粗细，再把这头的竹竿也插到架子上。这么细的线面，在太阳底下晒 20 至 30 分钟，达八九成干燥，不脆不潮，有弹性，即可收拢了。晒好的线面送进厂里，捆扎打包，再送到粮店出售。福州线面可是福州著名的美食之一！

白马桥北侧桥头第一家商铺就是白马桥馆店，卖炸芋粿、麻球、红白年糕、草包饭、锅边、扁肉、面点，品种挺多。过了馆店右拐就是一家小开间酒店。当年的酒店与今天的酒店含义不一样，那是真正的卖酒和喝酒的店铺。卖酒计量容器叫“购”，当年大人叫小孩拿上牙缸或碗，上酒店买酒，吩咐买一购或半购。一购大约半斤重，确切重量我还未考据。过了酒店就是烟纸店，出售各种烟丝、草纸。烟纸店旁边就是义洲最大的地方国营食杂店——“六家店”，店里商品琳琅满目，有糖烟酒茶、糕点饼干、果脯蜜饯、南北京果等。绝大多数商品凭票供应。

六家店侧后是道头，即白马河边上的小码头，居民下河边挑水、洗菜、洗衣服。河边有一处叫泰山庙茶摊，临河榕荫遮盖，在高脚屋下摆上几十张竹躺椅，是当地老年人最爱之所在。一



白马桥旁的泰山庙

个位子5分钱，加上3分钱茶水，人们就可以在这里躺上一天，有时还有说书先生在此表演。喜欢听书的往台前凑，不喜欢的找离讲台远些的位置落座。茶摊从上午8点开到晚上8点，春夏秋冬似乎都不打烊。

六家店正对面是义洲诊所，是义洲最大的医院。诊所旁边是泰山庙，此庙甚大，可以想象曾经的盛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泰山庙改作义洲救火会，里面摆放着几部手压泵浦水龙（灭火车），以及救火时拆屋用的斧头、钢钎、头盔等。福州被誉为“纸褙福州城”，而义洲更是木屋比邻，一旦失火，必酿大灾。所以义洲一带对防火极为重视，居委会组织专人，固定在每天傍晚时分手持铁皮话筒穿街入巷喊话：“各位同志，请

你注意，火烛小心，不可麻痹，麻痹大意，火烧没蒂……”

泰山庙北面是太和埕，一条石板路直通义洲小学。太和埕更是繁华街市，路面宽敞整洁，房屋整齐有序，设有制衣店、糖酒店、烟纸店、刀剪店、食杂店、理发店等。对我们儿童来说最具吸引力的是两家人仔书店，亦称小人书店、连环画书店。店内有上千本连环画书让人租看，书价1角8分以内看一本1分钱，书价1角8分钱以上看一本2分钱，观看的人数不限。所以我们小孩看

小人书总是两三个同往，一人翻阅，左右两人蹭看，这样不仅省钱，看的过程还能相互议论，太惬意了。

白马桥一带能如此兴盛，与白马桥为福州木材集散地密切相关。闽江上游尤溪、沙溪、富屯溪、建溪的木材商和山主、梢排工，把山区的原木沿着闽江运到福州来卖，多数就在白马桥排坞进行，木材商人卖木材获利，顺便就在当地消费。据老一辈人说，太和埕一带不仅有酒店、烟店、布店，还有旅店、烟馆、妓院，其繁华可见一斑。

上山下乡时，我离开故乡白马桥，但依恋白马桥的情愫时常油然而生，随着年岁增加，怀念更甚。

东莒岛上的大埔石刻

胡映泉

在马祖的东莒岛上，除了那个著名的灯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景点就是大埔石刻。东莒岛是一个很小的岛，在古代是一个少有人烟之处，只有出海的渔民才会在那里暂时栖身。它扼守在闽江口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台湾海峡过往的船只都要从那里经过。明朝时期，日本的倭寇经常侵犯和骚扰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小小的东莒岛上就曾发生过多起福建沿海军民奋起保家卫国，

勇敢地抗击倭寇的事件，大埔石刻就记载着这段重要的历史。

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末，日本国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歼灭太阁丰臣秀吉，平定内乱之后，开始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凡出洋船舶都颁给“御朱印状”（即一种许可凭证）。万历四十四年（1616），日本肥前州（今长崎）代官村山等安集合战船3艘、帆船10艘，士兵2000



多人，组成了一支舰队，获得德川幕府颁发的前往“高砂国”（即台湾）的许可，以其次子村山秋安为舰队总司令官，于五月四日从长崎扬帆启航，浩浩荡荡地开往台湾。

当舰队抵达琉球一带海面时，遭遇台风，有的船只沉没了，有的船只漂

散了。其中村山秋安率领的2艘兵船远漂到交趾（今越南），3年之后才返回日本。部将桃烟门率领的7艘兵船流窜到闽浙海面，在沿海一带抢劫财物、焚烧田舍、蹂躏百姓。部将明石道友则率3艘兵船来到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兵船的倭卒仓促登陆，遭到当地人的围攻，被迫全体自杀。明石道友则带领剩下的2艘仓皇逃离，来到东沙岛（今马祖东莒岛），准备在此等候失散的其他兵船。

与此同时，琉球国王派遣使臣到中国报警，说日本正准备以500艘兵船攻取台湾。于是，明朝政府下诏命令沿海一带实行戒备。当明石道友率领的兵船占据东沙岛的消息传到福州后，福建当局误以为倭寇要大举入侵，省城附近的居民竞相逃入城中避难，一时间人心惶惶，甚至白天都



不敢打开城门，负责海防的各地游寨船队龟缩在营地里，也不敢出海。探子们道听途说，把敌情渲染得越发严重，激化人的恐慌情绪。

要击退倭寇，首先必须探明敌情。福建巡抚黄承玄遂以重赏征募勇士出海侦探。告假在籍的吏部主事董应举向黄承玄上书，推荐起用沈有容，谓：“闽海事，非参将沈有容不能了！”黄承玄采纳了，亲笔修书一封，派人到浙江邀请沈有容。沈有容认为黄承玄知人善任，就再次入闽（万历二十五年即1588年，被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赶出中国大陆的倭寇，一直占据着台湾一带的岛屿，经常侵扰福建沿海地区。沈有容接受福建巡抚金学曾的邀请，出任海坛把总，不久又出任定海守御千户所千总，率军驱走了倭寇势力，从此“海上息肩者十年”），被任命为福州参将。



情的，劝他们立即回航，否则明朝大军将来剿灭。倭寇首领明石道友称自己只是奉命前往台湾从事贸易活动，因为遇到台风而暂时泊在这里，等候失散的其他船只。并说不能无功而返，必须将他们中的首领一人带回向代官复命。董伯起称自己就是首领。

黄承玄还特设水师委他统领，全权负责驱除倭寇的军事行动。同时，董应举还动员其族侄董伯起前往应募。董伯起自幼受到董应举的熏陶，深明大义，素怀报国之志，便毅然应募出海侦探敌情。

五月十六日夜晚，董伯起与4名舵手驾船从琯头出发，经竿塘、横山，于十八日凌晨抵达东沙。由于倭船都停泊在各澳口内，所以一路上看不见兵船的踪影。待他们登上东沙山头后，才发现有一艘倭船停泊在山后的南风澳，另有一艘停泊在布袋澳，两艘船的篷帆都已卸下，各载有倭卒一百三四十人。还有一艘是被倭寇劫夺走的定海卫所的白舫船，也藏在南风澳的一个隐秘处。

倭寇发现了他们一行，上前讯问，威胁董伯起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董伯起自知无法蒙混过关，便孤注一掷，表明自己就是奉命前来侦探敌

十九日中午，董伯起见倭船仍然没有启航之意，心想现在只来两艘倭船，省城就搞得如此惊慌不已，待其他倭船都到齐，全省岂不是乱成一团？他就机智地叫明石道友在大石上写下几句留言，让经过的其他倭船见到后跟着返回。明石道友觉得有道理，就按此写下留言，然后率队返回。船队抵达浙江的台山列岛海面时，他放回了董伯起的随行人员以及所劫夺的船只，只将董伯起一人带回。董伯起遂写信详述这次侦探经过，让随行人员带回。二十二日，福建官府接到信后，对倭船才有了第一手情报，方知是虚惊一场，于是省城解严，人心安定。

万历四十五年（1617）三月，明石道友以送回董伯起等人为由，驾船进入黄岐海湾，被筱埕水寨的守军拦住。沈有容亲自审讯明石道友后，

知道该倭船并无前来侵扰之意，只是护送董伯起归国和要求恢复通商。明石道友呈上表文恳请转奏朝廷，沈有容看后说道：“天朝法度严明，来表文文理不通，字迹又非正韵，本纸亦非体式，有难转奏。”于是就颁一面写着“福建发送日本夷目”的布旗，令明石道友悬挂在船桅上，将他们遣送回国。倭寇是13-16世纪侵扰中国沿海各地的日本海盗集团，除劫掠外主要从事走私贸易。初期仅为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以及失业的下层人民加入倭寇，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前往中国的沿海地区进行劫掠。明朝时期倭寇的盛行，也与明朝政府长期实行的海禁政策是分不开的。同时，沈有容因为明石道友上呈的表文文理不通、字非正韵、不合体式就拒绝转奏，可见在他们心中，自认为天朝上国，视外人为落后蛮夷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而正是这严重阻碍了中外之间的正常交往。

五月，倭寇桃烟门率200多人乘3艘战船进犯浙江，击毁明军兵船1艘，杀害十多名官兵，然后又流窜至福建沿海。当他们来到马祖东沙岛时，船只触礁搁浅，就“搭寮楼驻扎”，劫夺闽江口海面的渔船。沈有容得到消息后，立即率领水师冒风出海，兵分三路将倭寇围困在东沙岛上，先命水师以炮环攻，击毁倭寇的寮舍和工事，然后派人前去劝降。不意又有3艘倭船前来接应，沈有容遂“麾率官兵奋力总攻，戈船飙集、火器震震”，击沉了这3艘倭船。岛上的倭寇走投无



大埔石刻碑文

路，一部分投海自杀。沈有容生擒桃烟门等69人，斩杀了其中2名汉奸，而自己未伤一人。捷报传回福州，军民大喜过望，董应举兴奋地赞颂道：“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如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即使俞（大猷）、戚（继光）再生，亦当首肯矣。”他还亲笔写下了这一段文字：“万历疆梧，大荒落地，腊后挟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不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后来它被刻在东沙岛大埔的一处山崖上。

马祖当地十分重视大埔石刻这一历史遗迹，精心保护。大埔石刻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文物。它见证了历史上福建沿海军民反抗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有力地证明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

古碑重光 乌石盛事

方 杰 / 林 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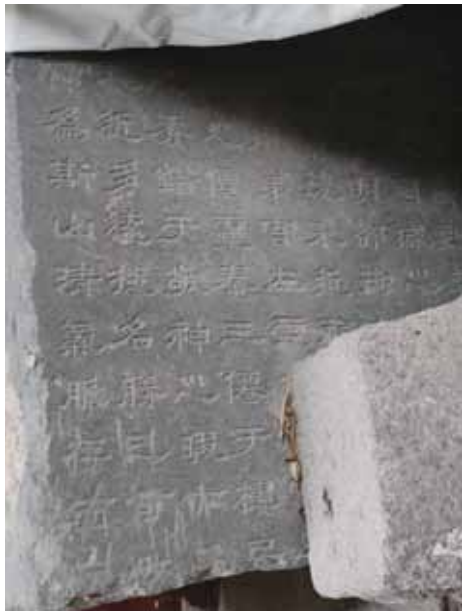
福州向有“三山”之称。三山海拔均不足百米，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祀汉何氏九仙、梁仙人王霸、唐诗人周朴”的乌石山众多的名胜古迹、文物遗存更是居三山之冠。坐落于乌山的闽都乡学讲习所是福建省首创的闽都乡学公益讲堂，并据此成立了闽都文化志愿者团队。

郭震先生是郭柏苍的来孙，对先祖的有关文物十分关注。2020年4月2日，他告知闽都文化志愿者团队，在乌山道山观内发现清代郭柏苍《福州乌石山新建三仙楼碑记》的残碑。郭柏苍（1815-1890），是三坊七巷名人郭阶三之子，其五个儿子成就了福州郭氏“五子登科”的传奇。郭柏苍虽得科名，但无心仕途，好学不倦遂成博物学家。他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著作便是《乌石山志》，该书系统介绍了乌石山的自然风貌、历史遗迹、神话传说等。据《乌石山志》记载，乌山上曾有祀莆田妈祖的天后宫，位于邻霄台下方。郭柏苍于光绪三年（1877）在重建的天后宫里腾出空地，新建了三仙楼，祀汉代何氏九仙、南朝梁仙人王霸、唐诗人周朴。于是他写就《福州乌石



闽都乡学讲习所

山新建三仙楼碑记》，勒于《重建福州乌石山天后宫碑记》碑阴。光阴荏苒，人事更革，乌山也几经变迁，天后宫原址现已荡然无存，所祀之神也与道教乌山白猴洞合为一庙，于2018年被拆。2020年4月发现的郭柏苍的残碑，是乌山上曾经



残碑置于道山观廊道



位于福建都城隍庙中的三仙楼石鼎



闽都文化志愿者团队核对志书上的文字



洗碑



拓碑

也有妈祖天后宫的实证。

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于4月11日先行上山察看，果然在道山观走廊内侧不起眼处卧着一块残碑（80厘米×80厘米），碑身蒙着泥土与灰尘。经了解，此残碑是20多年前在乌山附近的

某工地发现的。石碑的材质系密实的上好青石，前后均有碑文，正面为《重建福州乌石山天后宫碑记》，碑阴为《福州乌石山新建三仙楼碑记》，均以隶体书写，字体工整、漂亮，历经百多年保存尚好。经核对《乌石山志》，确认是郭柏苍所



残碑拓片正背面合影

撰，但因残碑只留上半段，缺了下半段的落款，无法确切判断碑文为何人所写。我们认为：残碑一可以用来学习拓碑技艺，二满足郭震先生保存先人作品的愿望，可谓一举两得。于是，我们联系了福州鼓山风景区的拓碑专家赵可梁老师，择天气晴好时上山拓碑。令人称奇的是，就在我们准备拓碑期间，与乌石山三仙楼相关的文物——三仙楼石鼎，被团队成员林杉发现于福建都城隍庙中。石鼎上有篆书镌“光绪壬午（1882）二月乙丑，郭柏苍造乌石山三仙楼、石鼎，百一十二日成”，与志书记载相符。

4月19日，周日。气温回升，艳阳高照，我们与黄剑波、蔡林、林杉、陈供、陈洁等人，在赵可梁老师指导下学习拓碑。首先必须清除障碍，搬开堵在残碑边的石块。其次用牙刷、螺丝刀等工具清洗碑文上的泥土，边抠边用水冲，七

手八脚忙活了个把钟头，才把石碑的双面清理干净。再次便是细致活。用特制的中药白芨水涂抹碑面，覆以宣纸并均匀喷水，再用毛刷敲打纸面，使其与石碑表面相熨帖，接着均匀涂上朱砂泥敲打。拓碑过程中，大家认真听讲，轮番上阵，小心敲拓。

在拓碑文之时，有的队员想爬到高处拍照。当拨开葱茏野草，在道山观后面（乌山志记载为“金鱼池”，现已废）石壁上意外发现了另一处摩崖石刻（南向，岩宽254厘米×岩高180厘米，字径10厘米×10厘米），但字迹已十分模糊。事后，经过队员黄剑波确认，这是清代学者朱筠（1729—1781）在1780年游乌石山时的摩崖题记。朱筠，字美叔，号竹君，又号笥河，顺天大兴（今北京）人，清代著名学者、文献学家、藏书家，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翰林学士，著



清代学者朱筠的乌山摩崖题刻



志愿者对摩崖石刻进行描红

有《笥河文集》。据记载，清乾隆间，顺天府大兴县名士朱筠来闽主持科试，得岁、科两考通省前列秀士 333 名。他只收一块刻有学生名字的石头，作为答谢礼。因是北方人，不胜福州酷暑，就将这些石头砌成假山，建成“三百三十有三士亭”，以供纳凉，一时传为佳话。其后，历代闽中士人及宦闽官员均对此作诗颂赞。后来有部分假山石被搬至西湖，成了西湖动物园猴山的一部分。这段摩崖石刻则记载了朱筠一次受邀游乌山的情形，落款“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即 1780 年，而今年正好也是农历庚子年，大家都觉得特别有缘分！朱筠题刻的发现，也是继三百三十有三士亭石之后，朱学士在福州期间留下的实物见证，十分珍贵。但经过 240 年的风吹日晒，摩崖石刻字迹剥落漫漶比较严重，如不加以保护，再

过若干年将被毁没。队员黄剑波当即建议要进行描红。于是，大家相约五一节放假期间再上乌山。

5 月 1 日上午 9 点。我们带着自费的刷漆材料与工具再次来到乌山，为几尽毁坏的朱学士摩崖题刻描红。大家去除地上的杂草，清理石壁上青苔，不一会儿，青苔覆盖下的 200 多年的摩崖石刻慢慢现出真容。我们对照《乌石山志》的内容，用画笔上漆。经现场统计，完整的摩崖题刻只剩 56 字。为了保留文物真实状态，我们决定仅对保留完整的石刻上漆，对已蚀失文字的部分仍保留原样。

古迹、文物传承文化，是历史的见证。我们希望通过志愿者团队的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民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并希望更多的历史古迹被发现。

有大乌石和八角井的地方

张兆浩

我们来到黄家湾的泃头自然村。

“泃头”，意为小河流的源头，多好听的一个名字，可是它至今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

可有谁知道它是畬族蓝氏入罗源而又出罗源的中转站啊，它本该在福建畬族发展史中崭露头

角的。

唐光启二年（886），畬家儿女随王潮、王审知经略闽南。而后却功成身退，360多人从漳浦赤岭，扬帆鼓棹，北上去寻找更理想的栖息地。风狂浪涌，四姓中的盘姓，不幸随风漂没。到连江马鼻，钟姓淹留。唯有蓝氏和雷氏继续北进。

最终落脚泃头。

泃头，初始是黄家的地盘，畬民们只能在山陬地角搭寮为屋，刀耕火种。外来人每每遭到原住民的白眼。可山哈那清亮得像泃水一样的歌声是那么迷人。一天，黄姓人家大厝上梁，不用说那是黄道吉日。很不凑巧，那天蓝家老叟骑鹤西去，



黄家湾泃头自然村

丧歌四起。而木匠师傅以为山哈又在引吭高歌，一边斫木，一边和着，好不热闹。东家看苗头不对，败兴之余，把房子卖给了畲民。房子就成了畲家蓝氏的祖厝。后来东家连山林和田地都一起全盘出让给畲民。畲民不信邪，蓝家居上泮头，雷氏居下泮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衍子孙，逐渐根深叶茂，而黄家湾的名儿却未改，官府也不让改，遂沿袭至今。

这不是很奇特的事情。奇特的是村后的大乌石和村前的八角井。

话说，树大分枝，族大分流，这是历史的必然。黄家湾毕竟是小地方，蓝雷两支脉，互通婚姻，眼看畲民东家生了个麒麟儿，西厝产了个小碧玉，四代同堂已不少见，甚至有五世其昌的。到了明朝中期，黄家湾这个器皿已经容不下将要

满溢的人丁了。族长与各房开了一个十分隆重的联席会议，会上各抒己见。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要有几房迁居到其他地方去。罗源的平洋历来为汉族所据，而其他的山边边，也有不少的畲民。一个共识产生了，不要在碗里争，放眼北边吧，距离黄家湾5公里的地方，就是潮格。潮格，就是海水上涨，到此河床，便与淡水相隔（“格”与“隔”谐音），那里有码头。几房愿意另辟家园的畲民，就从那里下船，逐潮而行，沿路而去，且行且散，在闽东的宁德、霞浦、福安、柘荣、古田、福鼎，都撒下了“种子”，还有的突破闽浙交界进入浙江南部苍南、平阳、瑞安、文成。

现在该说说那块大乌石了。

在几千年乃至几万年前，大乌石处肯定水源丰沛，大水从其顶端流下，长年累月，以其恒



潮格大桥

心和耐力，硬生生地在巨石上磨出了深沟浅槽。笔者曾站在这块大乌石前，有如站在武夷山天游峰的晒布岩前一样，肃然起敬，感叹自身的渺小和大自然的伟力。就是这儿的水成了“泚”的起源，因此大泚头，才有“此水一支分龟山，仰合子孙永远使用，癸丑年口立”的镌刻，这是立石划界。

而大乌石，就成了闽东、浙南蓝氏寻宗问祖的标志。在这政通人和的时代，往往来的人，开口就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小泚头分出去的。村里的人就会问：“哪里的大泚头？”他们说：“罗源的大泚头。”“罗源霍口畲族乡也有一个大泚头啊！”此时他们就会愣了一愣，说：“是村后有一块大乌石的大泚头。”“大乌石有几条水痕？”如果能正确报出36条水痕，村民就会与他们相拥，或是拍拍肩膀：“我们确实是一家人哦。”这好像是地下党接头对暗语，充满了戏剧性。原来他们的族谱都有这样的记载，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先辈这精到的文字后来就成了畲家蓝氏文化的符号。

可有时候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迁徙在外的大泚头蓝氏，有的族谱并未记载大乌石，记载的是八角井。这样的蓝氏寻祖在很长的时间里就遇到了无法“接头”的尴尬。大泚头现在没有八角井啊。当这样的蓝氏山哈乘兴而来、失望而归的时候，大泚头的族人也疑惑不已，难道他们找错了根脉？现任村主任蓝坤银，小时候曾经听前辈说过，好像以前水渠还在哗哗流淌的时候，有那么一口井。他跟几个年轻山哈，立志以银锄叩问

土地。老人还说，我们村哪，前面一座是龟山，一座是蛇山，龟蛇相峙，曾有堪舆家说，要挖一口八角井镇住汹汹之蛇。那么，即使前面原野开阔，在龟蛇相对的地方，也可能有希望拨开浮土，找到此井。他们在寒冬溽暑里挖，终于挖到这口八角井，井为圆形，而其护栏则是八角。他们喜不自胜，立刻通知远方的兄弟快来认祖。

就这样，以大乌石和八角井为地标，来寻找祖籍地的畲族蓝氏，来往于途，络绎不绝。

现在每到中元节祭祖之日，闽东浙南的从小泚头分出去的蓝氏兄弟姐妹甚至叔公伯公都不顾天气炎热，从四面八方聚拢大泚头，焚香九叩，膜拜他们的远祖。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要疑惑，那雷氏一族到哪里去了？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雷氏在历史的流程中逐渐式微了。所以现在的黄家湾3个自然村，都住着蓝氏一脉。

最后要记上一笔，在罗源大泚头开基的是蓝氏第106世蓝传仁。

更正

本刊2020年第4期《扑朔迷离南少林》一文第59页第二段“《三山志》《八闽通志》等史料明确记载，建于陈永定元年（557）的林泉院在福清县清源里”，此处应为“清远里”；“……以上凡九十院俱废”，“以上”文献作“通上”。

金光笼罩的前洋

张良远

在我的印象里，前洋一直被巨大的金光笼罩。

金秋时节，前后三次去往前洋，都是碧空万里，阳光浩荡，天地间无风也无云。走进被群山四面围起的这个静谧古村，遽然失去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余家大院、风水池、五鲤山、九龟石、千年苦楮树、老鹳石，这些前洋人朝夕相伴的景物，都一一浸润在金色波光里，山峦、田野、村庄、老屋，全披上一层太阳织就的金光闪烁的袈裟。

这里有世所罕见的70多栋连片古民居群，构成极具地方特色的古建筑活态博物馆，占地

多达300多亩。建筑年代分别是元、明、清、民国。还有宋朝建筑遗址。

这片体量巨大的古民居群，几百年来静默在这一方与世无争的土地上，用土木结构的阵势，凭着质朴的生命力，顽强对抗着时间的漫长消



前洋古村



余家大院

蚀。春去秋来，寒至暑往，默然撑起一片足以让今人崇仰的天空。

徜徉在王者霸气的余家大院，进出于高大宽敞的门洞，真叫人惊讶和赞叹。所谓“三落大厝四落厅”，不过就是这副模样。巨大条石铺就的厅廊，高耸的木柱，精美绝伦的木雕门窗、斗拱和雕刻石础，屋顶上方飞檐翘角，正厅中间的长条几案，层层递进的院落，无不显示主人的殷实和财气。据说，建成一栋工艺如此繁复的大厝，光是石构件的制作就要18个石匠花上3年工夫才能完成。

我用想象与前洋先人进行无声的对话，也以想象还原他们当初生活的样貌。他们神采飞扬，鲜活着一段段流光溢彩的历史。他们一些人即使纡朱曳紫，服冕乘轩，依然没有沉溺于简单的物质享受，而是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规划家园和教育子孙上。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后人，同时，也把勤劳智慧传承于后人。他们开良田、建祠堂、办

私塾，终其一生信奉的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他们把这个理念看成是人生至高事物予以致敬。一代又一代，乐此不疲，以此传承着祖先的荣光。他们以肉体之躯的坚韧与刚强，延续着一幅漫长历史的动人画卷。神龛、佛像、木柱、横梁，以及门廊、床牖，上到屋顶瓦片，下到廊前石板，每一件传世的物件，都散发着从时光深处先人们投射而来的炯炯目光，宛如一盏时代遥远的长信宫灯，映照出后人心中美好的憧憬，照耀着开枝散叶的子子孙孙绵延之途。

时令从不失信，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春播，夏长，秋收，冬藏。农人最期盼的秋收季节即将来临，前洋人都在做着秋收前的准备。金黄的稻穗沉甸甸地弯向大地，番薯叶开始逐渐干枯，意味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意味着劳动将获得满意的收成。

我们在一扇又一扇窗棂前，驻足不前，静静地用目光抚摩老物件的凸出和凹陷处的细小纹



路，每一件木雕、石雕作品，都寄托着主人的美好愿望。诸如：“福禄寿喜”“独占鳌头”“蟾宫折桂”。美好的寓意，是先人殷切的期望，仿佛弥散着先人的体温。缠枝花朵，飞翔鸟儿，栩栩如生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情景，热爱生活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兴趣盎然。

沐浴在如此金光灿烂下，流连在别有洞天的家园美景里，恍惚进入武陵胜境，顿有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挺立在村庄四周的山峰，仿佛破空而来，它们是鹞峰山脉的延伸，紧紧地拥抱着太阳之下的村庄。两条溪流，从山间流出的金水溪、佛殿溪，情意绵绵地在村前绕过，像是阴溪和阳溪，阴阳互补，叙说着无尽的情话。水源永远不会枯竭，不舍昼夜地流淌。它们就像前洋人过日子一般细水长流，结果它们把涓涓细流流成了下游奔腾的鳌江。

余作铭烈士故居留有刘禹锡诗句：清光门外

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诗句高度概括了这栋古民居周围的诗情画意。水光和山影互为交错，日照和炊烟重叠纠缠。依着土墙，照着渠水，默数山峰，手不释卷，一边耕田，一边读书，那是一幅怎样的精神富足、安然恬静的生活图景？

那一夜，我们留宿在村委会招待所，借助满天星光，我们在前洋古村里进入了梦乡，一夜无话。

我起了个大早，发现前洋的天亮比其他地方要提早至少半个小时。远处的秋野飘忽着朦胧的银雾，幽远深邃的天幕上悬挂着没有来得及沉落的月牙。一垄垄番薯，一丘丘田畴……一切都开始苏醒起来。泥土的潮气，野草、蔬菜、庄稼散发出的气味，汇聚成秋野独有的芬芳。

没多久，村里就有人影走动，炊烟也渐渐升起。这时，一轮通红的太阳从东山上冉冉升起，整个村庄又一次被金光笼罩。

青山着意化为云

黄河清

汽车穿行在曲折而险峻的盘山公路上，蜿蜒地向云顶进发。前面的山峰，如一团团绿色的云彩，迎面扑来。那最高大的便是“青云山”，至于青云山名字的由来，据说是因山上的云顶村在宋朝时出了个状元叫萧国梁，他是永泰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当地百姓为纪念他少年时曾在此山中苦读，便将此山命名为青云山，意为“青云直

上”。

大雨刚歇，一缕缕乳白色的水雾，像轻纱般在一个个山腰间飘动，青绿的山峰浮在水雾里，若隐若现。山谷间的水雾更浓，一团抱着一团地滚动。那条隐藏在云雾里的小溪，在奔跳着前行，有时从石缝间蹿出，有时从高崖上跃下，哼唱着一首美妙无比的歌……那山谷间的回声，有





青云山云顶天池

如一个乐师在拨动着琴弦。这时候，你总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一种仙境。

汽车在山顶一处宽阔的停车场停下。我们下车前行。一场雨，把山路上的沙石洗得干干净净。山路的两旁是一望无际的草场，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顶上，草不敢长得太高。山风拂过，浅浅绿海中便潮起潮落，轻轻柔柔的绿波从你脚下漫过，各种各样的波纹起起伏浮，淡绿、墨绿、深绿夹杂其中，形成了炫目的底蕴。

草甸上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株株杜鹃，有的枝叶扶疏，有的俊秀挺拔，有的曲若虬龙。朵朵花儿如红色的玛瑙，一团团一簇簇，迎风玉立，开得那么热烈，那么绚丽。花瓣儿密密匝匝，蕊靠着蕊，瓣贴着瓣，相互依偎着。形形色色的小

花散落在四周，像烛光一闪一闪的。这一切绘成了一幅意象饱满的水墨画，把我的目光一直送到那辽阔的天际。

草海的极目处，有一口呈椭圆形的天池，如一块剔透的水晶镶嵌在绿毯之中。沿湖边的木栈道漫步，柔美的湖水，清澈明亮，白云倒映在淡蓝色的湖面上，随风摇曳。一阵阵微风拂来，吹皱一湖春水，那粼粼的波纹，如轻漾着的笑靥，在湖光里微微颤动。俯视白云倒映下的清澈湖底，在色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鳞片闪闪，似天空掉下的颗颗星星，仿佛白云已被这波光荡漾的天池所渗透了。时而有几朵薄雾，缭绕飘动在湖面上，使湖水显得静谧，显得空灵，显得缥缈。

一只只五彩斑斓的蝴蝶在翻飞起舞，把我从



云顶栈道

天池引到了花海梯田。梯田占地 200 多亩，由一块块火山石垒成，一层紧扣一层从谷中的山脚下盘旋而上，一直延伸到白云缭绕的山头，仿佛一条条迤逦行进的长龙，与周围连绵起伏的群山峻岭一起形成一幅展开的画卷。

此时正是人间四月天，虞美人、疏华菊、蛇目菊、金盏菊，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竞相绽放。沿着花田小径漫步，一片暗香涌动，沁入肺腑。那花，白的，洁白如玉；粉的，犹如娇羞少女；红的，风情万种，在微风中展现它们绝美的身姿。它们或一枝独秀地孤傲，或成双成对地缠绵，或三五成群地轻语。花朵上聚满了大大小小的水珠，水珠沿着花瓣聚成更大的水珠在花边黏附着，晶莹剔透。那些还没开放的花蕾被水珠压

弯了花枝。经过雨水洗涤，花儿更加姣美可爱，花色更加鲜亮艳丽，这大概就是娇艳欲滴吧。

蜂蝶在花间嬉闹着，一会儿躲在花下，一会儿钻入花蕊，一会儿又在花瓣上轻挪舞步。它们不正是花的精灵吗？花依着叶的体温和心跳，尽情地做着旖旎的春梦。一幅幅灵动的画面，不经意间幻化成温馨点点，飘落在这片洋洋洒洒的花瓣烟雨中。我想，生长在高山峡谷里的野花要比温室里的花艰难得多，生存的过程也丰富得多。有时，它要忍受烈日烘烤；有时，它要挺住暴雨冲刷；有时，它要惨遭霜雪践踏；有时，它要经历浴火重生。但它依然生生不息，依然快乐成长。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精彩，要向人间绽放一丝春色，要向大地回报一缕芬芳。



云顶峡谷静卧在青云山脉，是由千万年前海滨火山地质运动造就的。整条峡谷可以说是“树在石上生，石在水中长，瀑在岩上飞，泉在山间唱”。沿峡谷一侧镶嵌在悬崖峭壁上的仿生栈道前行，溯流而下，一路巧石嶙峋，溪流潺潺，枝叶扶疏。杜鹃花零星点缀在树木丛中，分外妖娆，红得鲜亮、透光。

顺着隆隆水声望去，眼前是一个数十丈高的宽大瀑布，那瀑布不停地从山上飞奔下来，毫无顾忌地宣泄腾器，张扬着个性，狠狠地撞击在岩石上，溅起无数晶莹剔透的水花。于是峡谷里水汽、雾气交织升腾，彩珠晶体相互碰撞，俨然一部雄浑跌宕而又充满野性的交响曲。峡谷中有7条大小不一、造型迥异的瀑布。有彩虹瀑布的华

丽、五曲瀑布的曲折、山神瀑布的伟岸、神书瀑布的神奇、知音瀑布的雅趣、一柱擎天瀑布的壮观、双妹瀑布的温情。每一条瀑布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情、景致和内涵。无怪乎有人说，七彩瀑谷归来不看瀑。

一泓清水流淌在平缓的谷底，岩石是红色的，有像木板一样的纹路，清晰地记载着火山岩浆掠过的痕迹。有几处被水石旋转出的大水潭，水潭圆圆的，蓄满了水，水很深，上面漂浮着枝叶和花瓣。水潭一个连着一个环环相扣，在阳光照射下，有的碧绿如蓝，有的翠如松柏，水动石变，相映成趣。

潭边的几处树木也很特别，树木的根系发达，裸露在地面，树根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苔



癖，苍劲古朴，就像是大地把经脉呈现在人们面前。不远处的石包上，有棵青松挺立着，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它的根系深深地扎进峭壁之中。这是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

越往前行，两边的峡谷越窄，相距不过2米左右，从树荫和石缝中漏进天光一线，宛如跨空碧虹。天光忽明忽暗，幽深诡秘，徒增些许惊悚和神秘气氛。传说这里是远古的野人山寨，于是，我悄悄地问斑斑山洞，这是凿石取火的痕迹吗？问暗红岩壁，这是茹毛饮血的遗迹吗？问奇异石头，这是青石器的幻化吗？然而，峡谷并不回答，只有从峡谷里冒出来的一股股凉凉爽爽的清风，袅袅地从我耳旁掠过……

这时有朋友赞叹道，云顶简直就是青云山的

“香格里拉”。这个褒奖真绝妙，我很欣赏，也很赞同。其实，爱山乐水的永泰人早就把云顶峰当作一个精神高标来推崇了。如果说，嵩口万安堡门上的石匾题刻“智水仁山”还只是含蓄地传达出百姓的意趣指向，那么弃官不就的宋代永泰人黄非熊的诗“寂寞云山非我宅，九霄高处是吾门”带给我们的便是那心如止水却又大气磅礴的心境，足以沉淀人世间的喧嚣。

夕阳在山，倦鸟归林，我肃穆地站在峡口外，让远处传来的清越钟声穿透我的身体，荡涤我的心灵；让脚下飘逸的云抚慰心中的宁静，氤氲成禅定的心境，让我身轻如羽，心思空灵。

荡胸唯云顶，这里才能找到心中的本真。

家有红糟

萧石子

红糟，美丽青红酒的母亲。当一坛新酒开封，酒汁滤干后，红糟便纷纷登场，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这应该算是闽人祖先的智慧发明，是成功的“废物”利用，是“所有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这一现代环保理念的验证。

红糟的原料红曲系天然菌种，味美色香益健康。“闽菜”属中国八大驰名菜系，而红糟菜在闽菜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文化传承中，一向讲究“传承有序”。比

如，一幅古画，如果上面有留言有序有跋有题画诗，展示某某朝代某人题咏过，某人观赏过，那么，这幅画的价值更高。福州的红糟菜便是这么一种“传承有序”的菜系。红糟菜自成系列，有“家谱”，且类别丰富，不容混淆。如炒糟、闷糟、炊糟、炆糟、爆糟、拉糟、醉糟等。

红糟菜是福州美食中重要的一个系列。由于制作复杂，工序多，家常的灶头已经少有它的身影。它又是不可缺失的。因此，我们将之列为“升级版的家常菜”。

在民间，约定俗成的规矩是，母亲教女儿或婆母教媳妇，先从家常菜的制作教起，应付一日三餐。之后，要看各方条件是否具备，比如晚辈愿意学，长辈有一手或有兴趣教，才传授红糟菜。这符合福州人的味蕾：我们虽然不怕鱼腥，但怕肉膻，讲究原味。家常菜中，主妇们只要掌握蒸煎闷的基本功就可以对付鱼鲜；其他肉类嘛，简单，讲究鸡有鸡味，鸭有鸭味，猪牛各有





红糟鳗

各味即可。但是，我们福州“土著”的味蕾又十分古灵精怪，需要时不时地用一些“似幻似实”“非甜非咸”的“无间道”来调剂。那么，红糟菜就非要不可。

比如，福州过年的传统美食中，“糟瓮”即用红糟煮的“肉鸡蛋鱼蟹”等是必需的。其中，用红糟煮海鳗最为隆重。因为，海鳗春季味道最佳。烹饪方法分“红糟醉油鳗”“红糟炊鳗”等。做红糟鳗鱼用海鳗，不用河鳗。因为，河鳗更加肉肥味美，要保持食材的天然原味。而海鳗味腥刺多，通过红糟的调和能改善气质，香气四溢且上桌有仪式感，故成为节日经典美食。红糟鳗又能久放，正月亲友拜年时，取数块，上锅一蒸就可上桌，是非常得体的待客佳肴。

冬日进补食疗，对于产妇或胃病患者，红糟羊肉是首选。福州人觉得羊吃百草，是天然滋补。《本草纲目》早就记载过：红曲具有活血的功效，可健脾、益气、温中。现代医学研究还发现

红曲具有降低血脂和血糖的功效。

今天的很多饭店并不提供红糟菜。即便提供，也并非糟鱼、糟羊、糟鸡全包。因此，我们到某店去时，一旦发现有“糟羊肉”“糟鱼”，会带来胃口大开的惊奇。

古诗《新嫁娘词》颇有启迪性：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这尤其适用于做红糟菜。

而且福州的习惯是，大年三十的团圆饭桌上，必须有红彤彤的红糟菜和香喷喷的青红酒，才够喜庆；香气和美味相得益彰，那才有龙凤呈祥、花好月圆的大气象。

这种风俗的保留和延续，成为福州人对时节的“条件反射”，即随着天气转冷，他们立刻就会想起老酒和红糟。

红糟美食有它独有的学问：红糟的准备、添加、数量、状态、时刻。哪些菜炒前加？哪些菜炒后加？是加在调料中，还是直接入锅？菜加红糟后翻炒多少下？这些都还是只是“葵花宝典”的上半部。能做海鲜红糟菜的大师傅才算怀有“九阴真经”。

福州菜时兴加酒，当只加入酒时，有行话叫“喷”。老师傅会说，用酒“喷”一下，指的是酒香喷射而出，瞬间弥漫，第一时间俘虏食客的嗅觉。

红糟鱼或肉则正好相反，那香味不是猛然射出，而是通过一套严密的程序渐渐产生的，比如

红糟要如何拍散，如何与糖配合，才能让糟香完全渗透食材的每一个细胞，严丝合缝，口齿留香。

福州有一句谚语“大店食雅，小店食饱”。红糟海鲜，由于其制法的高难度，自然属于“雅”菜。大饭店里的名厨常用各类糟鲜来炫技。食客们只有到这样的饭店里才能体验到糟海鲜的风采。

海中珍品中，“蚌螺蚶”极受器重，是酒宴名厨的重头戏。诸如淡糟海蚌、生炒糟蚌、红糟浓油炆螺、红糟炒朱蚶、炆糟黄螺片，均为海鲜菜谱中的上品菜。

浓糟黄螺，是用浓油猛火炒出的。首先是十指刀工秘籍，黄螺肉不但要切成薄片，且要连绵

不断，这样炒出来的成品才能如一碟的鲜花。其次是火候的控制，不足则不易熟，太过则老而不脆，香味骤减。

另有一种红白拼盘用在隆重宴会上。即黄螺做成“白蜜”，用葱蒜白糖做调料，再与“炆糟”搭成拼盘，翻卷的红白螺肉，仿佛变色芙蓉花。红糟似红色飘带蜿蜒其上，美轮美奂。

珠蚶也是大海恩赐的珍品。若用红糟炒食，那赤色肥香，可令人荡气回肠。

红糟海鲜的要点在于：让珍贵的海鲜做主角，红糟充当配角，不能压过主角，但是配角的影子在主角之中若即若离，如影相随。这就是“浓处味短，淡中趣长”的哲学意境。美食里有哲学的启迪，也有诗意的灵感。

1672年，诗人查慎行、朱彝尊等联袂进闽，游历鼓山和滨海，为福州的海鲜——醉鲜糟鲜深深倾倒，留下大量诗篇，分别被收藏在朱彝尊的《曝书亭集》第18卷，查慎行的《敬业堂诗集》第24卷、《宾云集》、《炎天冰雪集》第25卷和《垂橐集》第26卷中。他们对于福州醉或糟海鲜的热忱令人惊讶。他们相信美食中有诗情画意。

除了美食，我们的红糟原料中的红曲有降低胆固醇和血压的功能。现红糟已经被制造成药，比如，“血脂康”。

这些只是果腹的食材，华丽转身变成我们对“美”的体验。这体验滋润着一代又一代闽人，无论喜悦或悲伤，无论重逢或离别，统统浓缩沉淀成为集体的记忆与乡愁。



淡糟螺片

飞鱼和草

半 夏

“每逢佳节倍思亲”，而每个乡村在佳节来临前，都有一套慰藉乡愁的诀窍。它们似一串形态各异、玲珑精巧的铜制钥匙，有心的人总能用不同的手法，解开愁肠百结的心锁。其中最精美动人的那一把，非地方美食莫属。当那些融了乡情乡恋的各色美食，经由至亲的手烹制而成，让即将远行的家人带走，或给羁旅未归的游子寄出，亲人的牵挂与叮咛，便随着那缕家乡味抵达舌尖、直到心底，足以温暖整个漂泊旅途，抚慰难解的心绪。

在罗源的中房古镇，就有这样一道菜，走过四季、穿越百年，定格成中房人心中最神奇的消愁妙方。那年端午，我在中房镇度过，第一次品到这道菜，因为见证了它的独特制法而记住了那个滋味别样的节日。

那天早晨，我们应朋友邀约，从城关来到中房，一下车便看到家家户户在门上挂着艾草、菖蒲，不时从窗台飘出的粽子香，让端午节的气息弥散在缕缕空气中。不少人家门前摆着一垛垛稻草，令我心生好奇。打听一位小童，得到的回答是“有用”！我迫不及待地顺藤摸瓜，找到稻草堆得最高的那一户，竟然是中房知名大厨杜立铃

的家。

杜大厨刚从城里采购回来，一脸的踌躇满志，果然正要打造一桌子硬菜。我见到了要用到稻草的食材——跳跳鱼。不由得想起有一首名为《飞鸟与鱼》的歌，说的是无望之恋。那么眼前的飞鱼和稻草，它们将有怎样的交集？主人为了保留神秘感，故意对我秘而不宣，我只能暂且按捺满心的疑惑，等待。

杜妈妈出场了，她取出一根1米来长的铁签，如同穿针引线般，开始串跳跳鱼。铁签由鱼鳃经鱼嘴迅速插过，手法行云流水。不一会儿，黑灰色的跳跳鱼便齐整整串成一溜，如同一列身着黑衣的芭蕾舞女，只待乐声响起便要滑入舞



池。杜妈妈完成了十来串，接着给排好队的鱼们迅速挤去内脏、清洗利落。我的疑惑加深了，继续等待！

杜立铃进门说“可以了”。这表示跳跳鱼就要和稻草相会了吗？会是电光石火的碰撞，还是杨柳依依的携手？我急不可耐跟上前去。来到杜立铃家门口的空埕上，只见离地半米的石缝里横插着三截钢筋，俨然搭起一个烧烤架，一大摞稻草候在下方。我隐约看出端倪，继续拭目以待。

只见杜立铃将串满鱼的几串铁签摆上架，娴熟地用火钳夹起一大束稻草点燃，在一字形列队的跳跳鱼身下游走。几番瞬间的炙热过后，渐渐减少稻草数量，任草灰的热气熅成一团团烟雾，上升、跳跃、笼罩住跳跳鱼；在火星将尽未尽时，再引燃一小把……

这时，一位梳着发髻、精神奕奕的白发老婆婆拄着拐杖从屋里出来，杜立铃赶忙迎上前去。原来她是杜立铃的奶奶，据说是熏跳跳鱼的行家，虽说孙儿已经尽得真传，还是忍不住出来帮忙，嘱咐注意火候。

近一个小时工夫，烟雾中弥漫阵阵鲜美鱼香，宣告熏鱼制作成功。

熏好的跳跳鱼通体乌黑，倔强地挺立着。杜奶奶仔细清理鱼身上黏附的草木灰，缓缓地说起这道菜的由来：从前交通不便，也没有冰箱，身处高海拔山间的中房人难得吃到海鲜，即便吃上一回，因为海鲜难以保存，也很难再次享用，于是祖辈才想出燃烧田间稻草熏制跳跳鱼的办法，

并一直沿袭至今。原来是祖先的某一次就地取材的灵感，造就了这场“鱼草之恋”。

杜奶奶说完，把篮筐凑近闻闻，笑皱一脸时光：“和奶奶做的一个味道！”受表扬的杜立铃乐呵得像个孩子，接过熏鱼，开始另一道魔法：调味。只见杜师傅对调料架上的油、盐、酱、醋、姜、葱、蒜来了一通点兵点将，看得我眼花缭乱。终于，一盘酸爽可口的稻草熏鱼腌制成功。

我那早已躁动不安的味蕾，在熏鱼入口的瞬间得到了最温柔贴切的安抚，顿时变得俯首帖耳、醺然欲醉。“翅膀如飞”的跳跳鱼，历经烈火的考验、酸甜苦辣的洗礼，实现了“飞鱼和草”的绝恋！眼前通体乌黑的鱼儿，虽然被烤去了翅膀、褪去了裙摆，却终于可以和稻香融为一体、难舍难离。食界搭配和人间情爱竟是如此相同！

杜立铃说，也有人尝试过用其他干草来熏，结果全无香味，他们选的稻草的确是熏制跳跳鱼的绝配，“如今家里都有冰箱，再偏远的山区储存各种海鲜都不是问题，但我们就爱这种酸酸的熏味儿混着稻草香，这才是特别的家乡味。”

从杜家出来，放眼邻里门前，已然相继青烟升腾。都说越是远离城市的乡村，越能把“传统”护在怀中、视若珍宝。中房就是这样的所在。它敝帚自珍、历久弥爱，“稻草熏跳跳鱼”就年复一年积蓄着美味和情感，升腾在家家户户门前的青烟中，渗透在丛丛稻草燃烧的灰烬里，缠绕在阿婆们穿鱼成串的铁签上，更浸泡在百味杂陈的岁月中。

趣忆“猪姆奶”

李善旺

那天是农历七月三十，是民间比较重视的“地藏王菩萨诞”。民众为感念地藏王菩萨功德，当天忌动土，家家做糯供奉。福州话中，“糯”念“zhie”。母亲一早就在厨房忙着做糯，做着做着，突然笑叹道：“哎呀，好想吃猪姆奶！”正在吃早饭的我惊讶地笑问：“什么，你吃过母猪奶？”母亲说：“不是的，是一种跟糯类似的东西，里面包着红糖，咬下去，糖汁满口甜滋滋的。”“以前厝里有养母猪的，一般都会做……”听着听着，就勾起了我对小时候好奇地追着猪笼车，一边看着笼里庞然大公猪的回忆；也想起曾经专业课上老师在介绍福建特有家畜家禽品种时，对福州黑猪品种未能及时得到保护而感到惋惜。

福州原有本地猪种福州黑猪，老百姓习惯称之为“乌猪”，主要分布在闽江中下游地区。福州乌猪全身乌黑，体型肥大，面部微凹，额头有较深的菱形皱纹，繁殖能力强。说起来，这样一个地方品种的产生和性状的稳定遗传，往往需要长

久的岁月洗练与地域环境的滋养。

五代末至宋，福州地区率先开始水稻两熟制的耕作及冬季油菜的广泛种植。明代，福州丘陵坡地等大都种植番薯，加之近郊地区大量种植蔬菜，为培育福州地方品种乌猪提供了丰富的青绿饲料。充足的食物使得福州乌猪脂肪率较高，繁殖能力较强。过去，由于生产技术落后，食用油相对匮乏，穷苦人家平时用不起食用油。福州乌猪肥、大、好养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对肉、油的需求。

古有“一猪抵九债”之说，说的是一头繁殖能力较强的母猪所产生的价值，相当于一个劳动力。特别是福州市郊鼓山、横屿一带的乡民，自古就有饲养母猪的习惯。母猪生猪崽成了乡间常有的事，有时母猪生多了猪崽，母猪奶头不够，多出的猪崽还要提早出售，农户便找写字的先生写好告示，贴在集市上。家里母猪生得少的农户看到，就会将墙上的告示撕下，按上面的地址上门购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原有的福州本地乌猪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为了提高瘦肉品质，就与其他优质猪种杂交，导致福州纯种乌猪的消失。万头猪场的出现，使得与之相伴相生的职业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起早贪黑，衣衫褴褛，背着竹筐，手拿夹子的拣猪屎；走在牛乡马里，用猪笼车拉着大公猪配种的牵猪哥；肩抗长凳，吹着小箫，走街串巷阉割家畜的手艺人；还有给母猪坐“月内”、做“猪姆奶”的习俗也随之淡出人们的生活。据西汉《礼记内则》中所述，西汉时称坐月子为坐“月内”，福州人至今仍旧沿用此称呼。

在漫长的时光中，福州乌猪早已烙印在了闽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今福州的一些地名、习俗等依旧能照见它的身影。

福州地名中有乌猪寨、乌猪洲、乌猪港等。俚语就更丰富有趣。有指读书很重要的“养囤无读书，不如一头猪”，有指享受很高的待遇，但只能做很少事的“食猪姆料，叫猪仔声”等；熟语中的“猪姆肉，卖乡里”“庙里猪头都有主”“无猪犬也刨”等；传奇故事“好是好，可惜没糟养猪姆”；儿童游戏中的猪姆猪崽棋；童谣中的《砦砦粟》：“砦砦谷，谷砦砦，糠养猪，米养人，有谷养鸭姆，鸭姆生卵还主人。”这些都形象地反映了福州乌猪对闽都百姓生活的影响，富有趣味，具有十分突出的闽都区域特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含一方风情。

三山闽水的福州百姓对家畜给予了特别的人文关怀，有六月六、犬洗汤，还有给生崽的母猪做“月内”，俗称“猪姆奶”。

母亲说，在母猪生崽的一周后，猪崽眼睛渐渐“开目”了。农人再忙都会给母猪做“猪姆奶”，大人小孩一起参与制作，其乐融融。

做“猪姆奶”是将糯米磨成米浆，装进布袋压成米粉团，再揉捏成糯粿皮，用红糖做馅。底衬以豆蔻叶，一片叶子摆置三个，一次要做30个“猪姆奶”。当然，若家里小孩多则会加倍制作。

有趣的是，“猪姆奶”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扁圆奶头形；另一种则更像饺子，酷似惠安传统美食“猪崽粿”。猪崽粿因其外形像小猪而得名，相传这是古代中原移民迁徙闽地，因思念故土乡味，就地取材做成这种形似饺子的食物以慰相思。刚出笼的猪崽粿，嫩滑而不腻，香甜适口，其独特的番薯外皮加香味十足的花生馅，十分好吃。一段历史就这样凝成了一道闽南人们喜爱的传统美食，流传至今。

做好“猪姆奶”，还要准备豆腐、切面、肉燕各一碗，供在猪栏厝前，供者对着猪栏里的猪，口中念念有词。念的都是祝福词，如：“保佑猪姆奶水多，猪崽健健康康。”念毕，扔五个“猪姆奶”给母猪吃。留下的“猪姆奶”不但给自家孩子食用，还送给厝边邻居的孩子们共享，希望他们也健健康康，胖胖壮壮。小孩子们吃到甜滋滋的“猪姆奶”，嘴里吧唧着，甜美自然流进心里，成了甜味的童年记忆。